

#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习近平

学习和总结历史文化，借鉴和运用历史经验，是我们党一贯重视并倡导的做好领导工作一个重要的思想和方法。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从中汲取有益于加强修养、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不断提高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不断提升领导工作水平。

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其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前人各种知识、经验和智慧的总汇。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这是我们党90年来之所以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

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学习中国历史，了解和懂得自古以来中国人民创造的灿烂历史文化，继承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从中汲取思想精华，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发扬光大。中国历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坚持不懈的创业史和发展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要善于借鉴历史上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各种有益经验，学习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高尚的精神追求，从中获得精神鼓舞，升华思想境界，陶冶道德情操，完善优良品格，培养浩然正气，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认真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经受住“四个考验”，防止“四个危险”，为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领导干部学习历史，要注重学习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现代历史，深入了解我们伟大祖国经历的刻骨铭心磨难、我们伟大民族进行的感天动地奋斗、我们伟大人民创造的彪炳史册伟业，深刻认识近现代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社会主义道路、选择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性，增强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继承和发扬前辈共产党人建树的优良革命传统，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持续奋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学习中国近现代史要特别注意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是党带领人民不断把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事业推向前进的历史，所取得的成就与进步伟大辉煌，所经历的困难与风险也世所罕见。认识党的光荣伟大，不仅要充分认识我们党带领人民取得了光荣伟大的业绩，而且要充分认识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考验中披荆斩棘、不断开辟胜利道路所展示出来的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进一步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信心。

（摘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党校校长习近平出席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2012·05,3

主 办：临沂市地方志办公室  
协 办：临沂市地方志学会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  
临沂大学沂蒙文化研究院

编委主任：赵爱华

编委委员：徐福田 李克彬 秦鸿伟  
何相军 尹云川 王长利  
赵宗远 康德忠 刘兆东  
李凤军 王泽远 孙建中  
李延杰 曲文军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胡拙安  
王傢玉 尹传贵 王士岭  
顾怀亮 杨沂成 卢廷运  
李忠山 董保东 韦瑞芳  
朱海涛 王瑞柱 伊永航  
杨兴文

主 编：朱海涛

副 主 编：曲文军 刘兆东 王纪明  
呼国英 高 雷

本期执行主编：呼国英

责任编辑：杜 帅 贾 梦

美术编辑：胡拙安 宋夏娟 周轩正

编辑出版：《沂蒙史志》编辑部

刊 号：鲁连内资（2011）第Q1023号

地 址：临沂市北城新区  
天元商务大厦634室

邮 编：276000

电 话：0539-8727560

邮 箱：yimengshizhi@163.com  
szbyw2010@126.com

博 客：yimengshizhi.blog.163.com  
blog.sina.com.cn/u/1914056311

网 址：http://www.linyisq.gov.cn  
《沂蒙史志》栏目

印 刷：临沂玉峰印刷有限公司

# 目 录

## 【卷 首】

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 习近平 01

## 【本期特载】

英雄孟良崮 粟 裕 04

## 【峥嵘岁月】

叫一声母亲泪花流  
——追忆沂蒙母亲王换于 薛 杰 李顺利 13

战斗在沂蒙山  
——记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王彬 gherry 511 19

## 【名人素描】

崎瀨山下访陈明烈士家乡 王有瑞 24

先贤原宪 王庆全 26

## 【蒙山沂水】

大河东去——导洩整沂工程 时 麟 29

## 【文化掇英】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声古韵 雅正婉丽  
——“郯城五大调”声腔源流、艺术特色初探之三 张铁民 35

## 【古城旧事】

老城夜话（连载） 刘家骥 38

## 【诗画赏析】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一） 李兴河 42

## 【探索发现】

孝悌临沂——《二十四孝》探源之三 大荒堂主 46

## 【沂蒙名医】

一束玫瑰一支歌——品味陈彦林 刘凤才 48

## 【史料辑存】

1916—1949：临沂早期的报纸（中）呼国英 刘金柱 52

回忆丈夫张灵甫 王玉龄 58

## 【百家渊流】

泰山南城羊氏（下） 唐士文 62

姓氏百家漫谈——刘姓（下） 赵丹峰 66

## 【影像沂蒙】

赣榆战役 73

## 【文史论坛】

琅琊兵学文化初探 刘洪连 任建华 74

## 【沂蒙乡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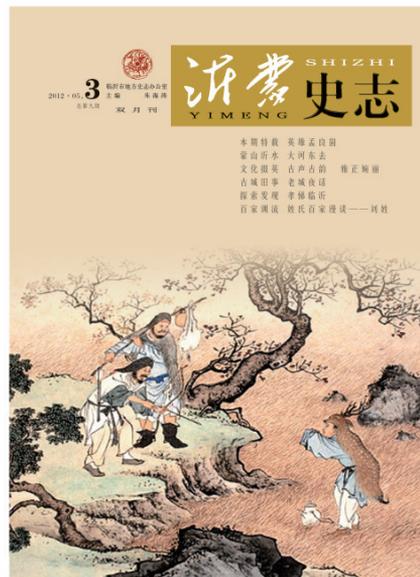
郭晓冬——从沂蒙山走出来的明星 石头 78

## 【史志动态】

80

封面：二十四孝图之“鹿乳奉亲” 绘画/陈少梅（清）

封底：书法/胡石



## 本刊声明

凡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均视为双方自动接受如下约定：

1、本刊刊载的文字、图片，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来稿不查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两个月未采用者可另作处理；请勿一稿多投。

2、作者文责自负，若侵犯他人权益，本刊概不承担连带责任。本刊发表的文字、图片，即拥有在“临沂市情网”和本刊主办单位编印的出版物及资料上转载的权利。



# 英雄孟良崮

粟裕

本文是《粟裕回忆录》的第十四章（有删节）。《粟裕回忆录》原名《粟裕战争回忆录》，1988年11月第一次出版，2007年8月再版时改为此名。该书最大的特点是，除开头一章对其参加革命的过程有所交代外，其余各章都是以战争事件来展开叙述的。讲的基本上是战争事件的战场背景、作战对象、力量对比、战役对策以及征战过程，最后有战事的检讨、总结和重观。本章“英雄孟良崮”就是典型的一例。粟裕的军事学术的造诣、战争理论的素养在《粟裕回忆录》中得到充分体现。

1947年5月中旬，华东我军主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地区举行的孟良崮战役，是一次大规模运动战和阵地战相结合的战役，是打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和转变华东战局的关键性一仗，也是解放战争以来华东野战军第一次从正面摆开阵势同强敌进行大规模较量，打得很有气势的一仗。这一战役，开创了华东我军在敌重兵集团密集并进的态势下，从敌阵线中央割歼其进攻主力的范例。

## 强敌云集 发动重点进攻

1947年3月，解放战争进行了8个月，敌军占了解放区105座城市，但付出了71万人的代价，用于第一线作战的机动兵力，从原来的117个旅减为85个旅。面对这一形势，敌我双方对下一步方针各作研讨。中央、中央军委鉴于内线歼敌之有利，确定华东我军继续执行内线歼敌的方针，于1947年3月6日发电指示我们：“考虑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原令你们提早转入外线之计划，现可改变，大约本年全部时间均可用于内线作战（注：因战争形势发展，我军于本年初转入外线）。并要求我们“在今后十个月内再歼敌四十个旅至五十个旅”。蒋介石则改变战略方针，由对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即集中兵力对我解放区的两翼——陕北和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而对其他解放区采取守势。

蒋介石的新的战略方针，固然反映了蒋军兵力不足的困境，但也是总结了前一段作战失利的教训后，在战争指导上的改变。陕北和山东是我解放区的两翼，把两翼作为其进攻重

点，从军事上看，既可集中兵力，又可从东西两面，对我形成战略的钳形攻势，将西北我军歼灭或压到黄河以东，将华东我军歼灭或压到黄河以北，迫使我军大部局处于华北，便于进而解决华北和东北问题。

敌军统帅部对山东重点进攻的准备在莱芜战役后即已开始。从3月初至4月初，敌人的步骤是：（一）进行黄河归故，即在花园口合拢，使黄河回归故道，以限制晋冀鲁豫野战军南北机动，切断华东与晋冀鲁豫的联系；（二）将王敬久兵团自冀鲁豫战场调到山东战场；（三）撤销徐州、郑州两绥署，组成徐州指挥所，统一指挥原两绥署所属部队。此外整编第九师正由武汉向山东调动中。

在兵力上，敌人用于山东方向的已达24个师、60个旅、45.5万余人。占其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27%，占其重点进攻兵力66%。“五大主力”中之“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均调集于山东战场。并以“三大主力”为骨干，分别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汤恩伯第一兵团，辖整编第七十四、第八十三、第六十五、第二十五、第二十八、第五十七师；王敬久第二兵团，辖第五军、整编第八十五、第七十五、第七十二师；欧震第三兵团，辖整编第十一、第九、第二十、第六十四、第八十四师以及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第七军、第四十八师后又划归一兵团指挥），共十七个师（军）四十三个旅，约25.5万人，执行机动突击任务。另以7个整编师、17个旅约20万人，配置在各以徐州、济南为中心及鲁西南等地区担任守备和策应。

在作战方针上，蒋军亦作了新的研究、改变。解放战争开始，多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乘虚进袭等战法。鉴于屡遭我军各个歼灭之惨痛教训，鲁南战役后，蒋军统帅部即提出了“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作战方针；又因莱芜战役采取南北夹击，致北线被我歼灭，遂进而提出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妄图进一步加强兵力密度，成纵深梯次部署，作弧形一线式推进，使我无法分割和各个击破，而陷我于战略、战役布势上被动不利之地位。

为贯彻实施对山东重点进攻的方针，敌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进驻徐州统一指挥，蒋介石则坐镇南京统筹决策。敌情确实是严重的。

## 耍龙灯 创造战机

面对敌人大军压境，我华东军民无不义愤填膺。陈毅同志在一次会上说：为了全局的胜利，即使我们华东野战军全部牺牲，我们也会再建一个新的野战军去参加全国大反攻！陈总的讲话，充分表达了华东全军将士英勇奋战、不惧强敌、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

3月底，敌军对我山东的重点进攻正式开始。到4月中旬，敌逐步推进，已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并占领了我鲁西南地区。随即汤恩伯兵团主力共6个师，从临沂向蒙阴、沂水方向进犯。王敬久兵团在占领泰安后向莱芜方向进犯。欧震兵团从泗水向新泰方向进犯。敌军对我略呈弧形包围的态势。为吸引和调动敌人，我军从4月初结束整训，同敌军进行了以下几次接触和作战。

4月初，我军分路南下，出击郯城、马头、新安镇等地，扰敌侧后，以寻歼汤恩伯主力为目标。但敌立即调集部队，加强防御，我即改变决心，北上另寻战机。

4月20日，从汶上、宁阳地区北进占领泰安的敌整编第七十二师，依于敌之左翼，较为孤立。我们即定下围泰（安）打援的决心。以3个纵队包围泰安，吸引敌整编第七十五、八十五师北援，准备在运动中予以歼灭；以4个纵队待机歼灭可能自泗水、平邑北援之敌。虽然泰安守敌呼救数日，邻近泰安各路敌军恐惧我军打援，始终按兵不动。我军遂于26日攻克泰安，歼灭了七十二师主力，生俘师长杨文泉，连同南线共歼敌2.4万余人。我打援计划虽未实现，但歼灭了敌人有生力量，迟滞了敌人的进攻行动；接着我军一部乘胜南下，拊敌侧后，攻克



我军顺着山路  
插入敌人纵深

宁阳城，歼敌2000余，主力则回师鲁中。

4月28日，汤恩伯兵团进占河阳、青驼寺、垛庄、桃墟、蒙阴等地。29日，我军以4个纵队向桃墟、青驼寺地段之敌出击，拟分割汤恩伯兵团，歼灭其一部。敌一经接触即后缩，退据蒙阴至临沂公路以西山区。我在歼敌整编第八十三师一个半团3000余人后，主动放弃继续打击该敌的计划。

5月3日，进占新泰之敌整编第十一师立足未稳，我军以4个纵队达成对新泰的包围。王敬久兵团主力急忙来援，根据当时情况，不易速决取胜，我即主动撤围。

在一个多月连续四次的作战行动中，我们始终处于主动，充分利用了在解放区腹地作战的有利条件，时南时北，或东或西，有进有退，既打又撤，用高度机动回旋的方法来调动和迷惑敌人。陈毅同志形容为同敌人“耍龙灯”，即我挥舞彩球，逗引敌军，像长龙一样左右回旋，上下翻滚。在这一阶段中，我军调引敌军往返行军的里程在1000公里以上。敌军哀叹进入山东一个月未与解放军主力发生战斗，只是每日行军，有时围绕着一个地方团团转。通过这些积极行动，我们削弱、调动、迷惑了敌人。尤其是进一步摸清了敌人的心理动向，即尽管蒋介石的战略意图是要与我决战，但从其战区指挥员的行动来看，实际上是尽量避免与我决战。他们想依恃其强大的兵力优势，压逼我军撤向黄河以北或退到胶东一隅，至少是等待我军疲惫之际再同我决战，以为这样可以拣到便宜，既可以保存实力，又可以邀功请赏。所以一经与我军接触，立即龟缩和靠拢，但求自保，甚至对非嫡系见死不救。这就暴露了敌军指挥上的一个大矛盾，即战略上速决的要求和战役指挥上的迟疑、犹豫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到敌军各个指挥集团，从而在对我军作战的态度、决心和行动上，必然会产生差别。至于蒋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主力与非主力、中央军与地方军、上级与下级之间的矛盾，更是不可克服的。因此，蒋介石设想达到指挥和行动上的集中统一是不可能的。敌人的这些矛盾必然还会表现出来并为我所用。

但是一个来月没有打上个痛快仗，不少指战员沉不住气了，顺口溜又唱起来了：“陈司令的电报嗒嗒嗒，小兵的脚板扑扑扑”。我们的战士实在是令人喜爱的，他们渴望着以自己的英勇作战来换取战争的胜利。

为了进一步调动和分散敌人，5月初我们计划以两个纵队南下鲁南，以另一个纵队南下苏北，以威胁敌人后方，吸引敌军回师或分兵，以便于我在运动中歼敌。我们将此设想上报后，5月4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即复电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忍耐待机，处置甚

妥。”同时指示：“胶济线以南广大地区均可诱敌深入，让敌占领莱芜、沂水、莒县，陷于极端困境，然后歼击，并不为迟，惟（一）要有极大耐心；（二）要掌握最大兵力；（三）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六日中央军委指示“凡行动不可只估计一种可能性，而要估计两种可能性”。接着，中央军委又提出放开正面、北攻昌潍、诱敌来援、相机歼敌的意见。中央军委的指示极为重要，肯定了这一段持重待机的方针，指示我们不要分兵，进一步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在山东腹地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至于告诫我们不要性急，则是给了战区指挥员更大的余地。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我们立即决定放弃以第七纵队南下苏北和第一纵队去鲁南的计划。命令已位于新泰以西的第六纵队就近南下至平邑以南地区，不再以牵制敌人作为主要任务，不采取积极行动，隐伏于鲁南敌后待命。必要时即可作为一支奇兵使用。考虑昌潍之敌筑城较久，王敬久兵团和“第二绥靖区”增援较近，而鲁中之敌已向前推进，正可捕捉战机，因而暂缓北攻昌潍，主力与敌脱离接触，集结于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摆开阵势待机歼敌。这个地区群众条件好，民兵组织强，能严密封锁消息，地形复杂，道路狭窄，不利于敌笨重装备的运动，但便于我部队隐蔽集结和寻隙穿插。中央军委同意我们的部署。

从4月初到5月初是一个创造战机的过程。我军放弃出击郯城、马头、新安镇；放弃打击进犯临蒙公路之敌；撤了对进占新泰之敌的包围；以及回师鲁中等一系列行动，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敌人，而且大大迷惑了敌人，促成了敌人的错误判断。果然，蒋介石及其参谋总长陈诚误认为我军“攻势疲惫”，已向淄川、博山、南麻、坦埠、沂水、莒县之线退却。这样，5月中旬战机终于出现了。战机不是自然地出现的，而是通过我军的指挥得当，广泛机动，诱使敌人因应而动创造出来的。

## 割歼强敌的决心和部署

歼灭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决心，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当我军稍向东移后，敌人乘机前进，侵占了莱芜、蒙阴寨、河阳等地。5月10日，汤恩伯兵团的第七军和整编第四十八师从河阳出动，先头占了苗家区、界湖，有续犯沂水模样。该敌位于敌之右翼，比较暴露，我们打算首先歼灭该敌并视机打援。这路敌军是桂系部队，打仗很狡猾，又较顽强，和他们作战要拼消耗，很难有俘获，不是我们理想的打击对象。因此，作战命令下达后，我一面派专人给部队调配充足的弹药，打算以强大的火力保障我攻击部队将该部歼灭；一面继续密切注视着敌情的细微变化，寻找更合适的战机。

11日，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由垛庄经孟良崮两麓向坦埠南之杨家寨、孤山我第九纵队进攻。这一行动引起我的高度重视，究竟是局部行动，还是新的全线进攻？我特别通知各有关情报单位，日夜密切注意搜集研究敌人的行动部署。当日晚，我们从密息材料中获得了敌汤恩伯兵团的具体作战部署：命令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中心，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分别为其左右翼。又以第六十五师保障第二十五师翼侧；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保障第八十三师翼侧，限于12日（后又改为14日）攻占坦埠。同时，我们又查明敌王敬久兵团之第五军、欧震兵团之第十一师等部，亦已由莱芜、新泰出动东犯。同日，中央军委也向我们通报了上述动态。

面对战场形势的这一急剧变化，我经过冷静的思索，认为尽管敌军行动尚未完全明朗，但据现掌握的情况已可判断敌人决定向我发动全线进攻。其部署显然是以整编第七十四师为主要突击力量，在两翼和后续强大兵团掩护下，对我实施中央突破。敌军把中央突破的矛头直指坦埠，因为敌人已经侦知坦埠是我指挥部所在地，并已于数日前以飞机对该地实施过轰炸。敌军对我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一是企图一举击中我指挥中心，陷我军于混乱与四面包围之中，便于其聚而歼之；二是敌人估计也许我不敢迎战，那就可将我逼压至胶东一隅或赶过黄河。我认为这一形势恰恰为我带来了有利的战机，因为在此以前，敌军密集靠拢，行动谨慎，一打就缩，很难捕捉。现在，敌军既已开始全线进攻，并对我实施中央突破，我应立即改变先打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的

计划，以反突破来对付敌人的突破，即迅速就近调集几个强有力的纵队，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的中央楔入，切断对我威胁最大的中路先锋敌第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并将其干净、全部消灭掉。这个设想，我依据的是以下分析：

第一，歼灭第七十四师，可立即挫败敌人的这次作战行动，迅速改变战场态势，获得最有利的战役效果；若仍打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敌人很可能置该部于不顾，继续对我实施中央突破，反使我陷于两面作战之困境。整编第七十四师是蒋介石手中的“王牌”，它全部美械装备，经过美国军官训练，具有相当的指挥、战术、技术水平，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之师，曾被誉为“荣誉军”、“御林军”，把它歼灭了，将给敌人实力上、精神上以最沉重的打击，将宣示我既能歼灭第七十四师，还有什么敌人不能消灭呢？而且敌第七十四师是我军的死敌，解放战争以来，敌军对我华东的数次进攻，常常以第七十四师打头阵，曾先后抢占我淮阴和涟水，我军亦多次寻歼该敌，均因未遇有利战机而未能得手；此次如能将该师歼灭，对我军指战员必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第二，先打较为薄弱之敌或翼侧、孤立之敌，是我军的传统战法，华野作战历程中，亦多采用此种战法。宿北战役可算是一次我对敌军的中央突破，但当时四路敌人相隔甚远。这次要在敌人重兵集结又有充分准备的条件下，以中央突破对付敌人的中央突破，的确是无先例的。但是，我们不应局限于以往的经验，而应从战场实际情况出发。我军经过8个月作战，特别是转入内线纵深作战后，连续打了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战术、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各级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积累了大兵团运动战的作战经验；我军的武器装备有了很大改善，特种兵纵队已有相当基础，我军火力已大大加强，已经具备了围歼强敌的基本条件。而且，敌挟重兵采取中央突破的战法，估计我不是主动后撤就是被突破。我军针锋相对以中央突破反中央突破打最强之第七十四师，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奏奇效。

第三，从兵力对比上来看，敌军在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总兵力24个整编师（军）中，集中17个整编师（军）进攻鲁中山区。第一线从莱芜到河阳，只有120多公里，敌军密密麻麻，一字长蛇阵摆了8个整编师（军）。位于敌军左翼的第五军、第十一师、第六十五师和右翼的第七军、第四十八师，多数与第七十四师相距仅一至二日行程，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则相距更近。我军只有9个主力纵队和1个特种兵纵队，敌军兵力占有很大优势。但是，第七十四师担负中央突破任务，

已进入我主力集结位置的正面，我军部署不需作大的调整，即可在局部对该师形成五比一之绝对优势。我们可以利用山区地形采取正面反击，分割两翼，断敌退路，坚决阻击各路援敌的战法对该师加以围歼，只要缜密部署，在战役指挥上没有失误，实现这个意图是完全可能的。

第四，强和弱是相对的，或强或弱，部队本身所具有的战斗力不是唯一的因素，而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强敌，但也有其弱点。该敌是重装备部队，进入山区，地形对其不利，机动受到限制，重装备不能发挥威力，甚至成为拖累，其强的一面就相对削弱了。同时该师对其它敌军十分骄横，矛盾很深，在我围歼该敌、又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其它敌军不会奋力救援。

时间紧迫，我立即将上述种种想法向陈毅同志汇报。陈毅同志十分赞同，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并立即定下战役决心。

战役指挥中，由于情况变化而临机改变决心并不少见。但是，这次临机改变决心时，不仅敌情严重，时间紧迫，而且作战对象的选择和作战方法的采用，都有其特殊之处。

我们决定：以五个纵队即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纵队担任围歼任务；以第二、第三、第七、第十共4个纵队担任阻援任务。具体部署是：

以第一、第八纵队从敌整编第七十四师的左右两翼迂回穿插，抢占芦山，并会同由鲁南兼程北上的第六纵队断敌后路，封闭包围口；以第四、第九纵队正面出击。五个纵队协同围歼该敌。具体任务区分为：

第一纵队（附独立师）以一个师攻占蒙阴以东的曹庄，阻击敌第六十五师，主力从敌第七十四师与第二十五师的结合部楔入，割断该两师的联系，阻击敌第二十五师，并协同友邻第六、第八纵队攻占垛庄、芦山，断敌第七十四师退路，从敌右侧后攻歼该敌；第八纵队从敌第七十四师与第八十三师的结合楔部入，割断该两师的联系，以有力一部阻击第八十三师，主力迅速攻占万泉山、芦山，与一纵队沟通联系，协同友邻从敌右侧后攻歼敌第七十四师；第四纵队首先控制北楼以北山地，阻击敌人继续向坦埠进攻，尔后抢占孟良崮，协同友邻向芦山突击，从正面攻歼第七十四师；第九纵队首先控制坦埠及以南山地，坚决抗击第七十四师，尔后攻占雕窝，协同友邻向芦山突击，从正面攻歼第七十四师；隐伏在鲁南敌后的六纵队，取捷径兼程北上，在第一纵队协同下攻占垛庄，断敌退路，尔后协同友邻攻歼第七十四师。



以第十纵队钳制莱芜敌第五军，阻其南援；第三纵队进至新泰东南，阻击新泰敌第十一师南援；第七纵队配属特纵榴炮团，阻击河阳敌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北援；第二纵队进至界湖、张庄集地区，保障第八纵队左翼安全，并策应第七纵队作战。

特纵主力集结待命。鲁南军区地方武装加强在临沂及临泰公路沿线敌之后方的袭扰、破坏。

战役决定于13日黄昏发起。

5月11、12日，中央军委两次来电指示说：敌人已进犯，可选择好打的，歼灭其一两个军。究打何路为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施，我们不遥制。这些指示，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对前线指挥员的信任。我们于13日发电上报军委并刘邓，报告了我们围歼敌七十四师的决心和计划：“（一）七四师十一日开始向坦埠进攻，八三师在青驼以北跟进，二五师在蒙阴东南为其左翼部队，桂顽则在临沂东北汤头、葛沟。（二）我们今晚集结一、四与八、九纵向七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在这里我想指出，在后来的若干材料中，把我军捕捉孟良崮战机，说成是敌整编第七十四师孤军冒进、送上门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战场实际的，既没有反映敌军的作战企图和动向，也没有反映我军的预见和战役决策。由于敌人拟对我实施中央突破，敌第七十四师的态势势必稍形突出，但在战役发起前敌两翼部队距第七十四师仅四至六公里。上述说法，可能是由于不了解我们创造和捕捉战机过程的缘故，从我军通常采用的传统战法出发来臆想战场情况，这未免是“削足适履”，而且也把敌人想得过于愚蠢。

### 喜见贼师精锐尽

要把敌第七十四师从重兵集团中挖出来予以歼灭是艰巨的。实现战役决心的第一个关键是隐蔽我军意图，达成对敌第七十四师的合围。我担任主攻的五个纵队，出色地完成了各自的任务。

5月12日晨，敌第七十四师由重山、艾山间渡过汶河，占领了黄鹿寨、佛山、三角山、马牧池等地，与我九纵一部激战于马山、迈逼山、大箭一线。13日下午4时，该敌攻占了马山



我军将士向固守山头的七十四师发起攻击

等地，距其主要攻击目标坦埠尚有7至10公里，踌躇满志，准备于14日攻占该地。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则分别进到旧寨、依汶庄地区。

面对敌军进攻，我第九、第四两纵队全力由正面抗击敌第七十四师。我第一纵队则利用敌军各求自保的心理，于13日晚，以小部对敌第二十五师发起进攻，使该敌误以为自己受攻击而无暇他顾。我主力则利用山区地形实行迂回，从该师与第七十四师的结合部向纵深猛插，并抢占制高点。第八纵队以相同的战术从第七十四师与第八十三师之结合部插入，并夺取制高点。我第六纵队则从鲁南之白彦地区兼程向垛庄急进，以断敌退路。到14日上午，我第一纵队一部逼近蒙阴城，构筑了阻击敌整编第六十五师之强固阵地，主力攻占了蛤蟆崮、天马山、界牌等要点；第八纵队攻占了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第六纵队于14日晨到达距垛庄西南20余公里之观上、白埠地区。而正面第四、第九纵队，经过激战，已推进到黄鹿寨、佛山，并攻占了马牧池、隋家店。我军对敌第七十四师的包围态势已大体形成。15日拂晓，我第六纵队在第一纵队协同下攻占了垛庄，第八纵队则攻占了万泉山，三个纵队打通了联系，最后封闭了合围口；并构成了阻击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的强有力的对外正面的坚强防线。

在这一个回合中，动用隐伏于鲁南的六纵队，是关键的一着。第六纵队同敌第七十四师是死对头。记得当时我们命令该纵留在鲁南隐伏待机时，纵队司令王必成同志很担心打第七十四师时没有他们的任务。我对他说，你放心，打敌七十四师一定少不了你们。当时第六纵队距垛庄约100公里之遥，一路山区，他们12日接获命令后，立即收拢部队，急速开进，十四日即抵达垛庄附近。王必成同志后来曾以“飞兵激渡”来形容他们的这次行动，是不夸张的。这说明在战役指挥中设想可能出现的情况，走第一步就预想到第二步，有时要巧妙地预留伏笔，是灵活用兵的重要一着，此次我军诱敌深入，而又预伏第六纵队于鲁南待机，这着棋，一旦动起来，全盘就活了。

到14日上午，敌第七十四师发现我军已迂回到他们的翼侧，有被包围的危险。便仓促收缩南撤，企图退向垛庄。但撤退中发觉垛庄已为我所占，只得退缩到孟良崮、芦山地区，并不得不把美式重炮和许多现代装备丢在山下，因而丧失了它现代化的“优势”。

在我军以往的战役中，一般只要对敌人达成了战役合围，胜利就算基本有把握了。但是，这次战场态势特殊。我军五个纵队包围着敌第七十四师，敌军却有十个整编师（军）包围着我军。第七十四师为敌“五大主

力”之首，其战斗力不可低估，且该部所退守的孟良崮及其周围山地，山峰陡峭，主峰海拔在500米以上，岩石累累，土质坚硬，易守难攻。因此，攻占垛庄后，陈总和我虽都松了一口气，但鹿死谁手，尚待决战。我立即带领少数参谋、机要人员，将指挥所向前推移，进入山沟，以便密切观察和指挥战事。

果然，当敌第七十四师被我包围后，蒋介石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处于易守难攻的高地，临近有强大的增援兵力，正是与我华野决战的好时机，便一面命令第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坚决固守，以吸住我军，一面急令新泰之第十一师、蒙阴之第六十五师、桃墟之第二十五师、青驼寺之第八十三师、河阳之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师火速向第七十四师靠拢；又急令莱芜之第五军南下，鲁南之第六十四师和第二十师赶向垛庄、青驼寺，楼德之第九师赶向蒙阴增援，企图内外夹击，与我军决战。张灵甫亦自恃建制完整，又处于战线中心，外有大量援军，要求空投弹药，依托山头高地固守。在蒋介石严令督促下，蒋军各路援兵，一齐向蒙阴东南急进。

这时的关键，一是围歼第七十四师能否迅速解决战斗；二是阻援力量能否挡住敌之援军。根据战场形势发展，陈毅同志当即发出了“歼灭七十四师，活捉张灵甫”的响亮口号。广大指战员立下“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消灭七十四师立大功，红旗插上最高峰”的誓言。各级指挥员到第一线督战，作战形式主要转入了阵地战。

围歼战是一场剧烈的阵地攻坚战。我军于15日下午1时发起总攻，从四面八方多路展开突击。敌第七十四师和第八十三师十九旅五十七团麇集于孟良崮、芦山及附近山地。依托巨石，居高临下，不断对我发起反冲击。从战术上来说，依托阵地的反冲击，可以给对方以相当的杀伤，何况我军为了争夺每一个山头、高地，要从下向上仰攻，每克一点，往往经过数次、十数次的冲锋，反复争夺，直到刺刀见红，其激烈程度，为解放战争以来所少见。

我军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逐次粉碎敌人的顽抗，缩小了包围圈。张灵甫在我军强大攻势的重压下，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击，先向南，又向西，后向东寻隙冲击，试图突出重围，均被我军击退，并遭到惨重杀伤。15日晚，敌军已被压缩于东西3公里，南北2公里的狭窄山区。该地草木极少，水源奇缺，敌人空投的粮弹和水囊又大都落到我军阵地，数万敌军已处于极端饥渴难支的狼狈困境。

16日上午，我军再次发起攻击，首先集中强大的炮兵火力，向敌军密集的山头、高地猛烈轰击。在浓烟和



被俘的国民党  
七十四师官兵

火光中，敌人的血肉与岩石碎片齐飞，形成一片混乱，我步兵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猛烈冲击，越战越勇，指战员不待上级命令，哪里有敌人就向哪里冲。16日下午，攻占了所有高地，敌军官兵纷纷就擒，猖狂一时的张灵甫及副师长蔡仁杰均被击毙，我担任突击的五个纵队的英勇健儿，会师于孟良崮、芦山顶峰，欢呼声惊天动地。阻援战斗则是艰苦的阵地防御战。我军利用既设野战工事进行了顽强的阻击，像一座座坚固的堤坝，挡住了敌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敌第五军被我第十纵队钳制住；敌第十一师被我第三纵队抑留于蒙阴以北；敌第六十五师在我第一、第六纵队各一部阻击下，前进不到10公里；敌第七军第四十八师被我第二、第七纵队钳制住；敌第二十师、第六十四师被我鲁南军区地方武装牵制，未能及时赶到青驼寺。敌第二十五师、第八十三师虽逼近我军包围圈，与第七十四师相距仅5公里左右，并对我形成炮兵火力交叉，但仍无济于事。16日上午8时，蒋介石还抱侥幸心理，向各路增援部队亲下手令称：“山东共匪主力今已向我军倾巢出犯，此为我军歼灭共匪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必以纵匪害国贻误战机论罪，决不宽容。”但到同日下午，汤恩伯已感到大势已去，发电报给所属各部称：张灵甫师“孤军苦战，处境艰危”，各部务须击破共军包围，“救袍泽于危困”，“不得见死不救”。但无论是蒋介石的严令，还是汤恩伯的乞求，在我阻援部队顽强抗击下，都无法挽救张灵甫全师被歼的命运。

在收拢部队、清点战果之时，我电台发现孟良崮地区仍有敌人电台活动，似有残部隐匿，我们立即严令各部清查毙伤俘敌实数。根据各部报告，我发现所报歼敌数与七十四师编制数相差甚大，即令各部继续进行战场搜索。当时山雨欲来，阴云密布，能见度很低。部队在严密搜索中又发现约有7000余敌隐藏在孟良崮、雕窝之间的山谷中，已开始集结，这说明我军搜索不严，同时也说明各部均能如实报告歼敌实数，不事浮夸，才得以发现这股残敌。于是我即令第四、第八、第九纵队立即出动兜剿。各部队不顾疲劳，复又投入战斗，16日下午五时全部肃清残敌。至此，我们的战役意图得到完全实现。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嫡系中的嫡系、整编第七十四师，悉数就歼。我们取得了战役全胜。我立即打电话报告陈毅同志，陈总在电话中兴奋地说：我在电话里向全体将士们祝酒致贺！

这次战役，我歼敌3.2万余人，彻底粉碎了敌统帅部“鲁中决战”的计划，严重挫败了敌对山东的重点进攻，极大地地震动了蒋军内部，有力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胜利信心，配合了陕北及其他战场的胜利攻势。战役结束后，敌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被撤职，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第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等也受到处分。



蒋介石多次痛心疾首地说：“孟良崮的失败，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真是空前的大损失，能不令人哀痛”；“必须等到我们全军一番起死回生的改造之后，乃能作进一步的打算。”王耀武表示“对七十四师之失，有如丧父之痛”。蒋介石等的哀鸣，说明了此役给敌人打击之惨重，而所云“起死回生”，不过是一场幻梦。后来的事实证明，经过孟良崮战役，敌人虽仍未放弃对山东实施重点进攻的计划，但其进攻的势头已经被打掉了，并且从上到下真正地被我们打怕了。

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胜利归功于中央军委的英明领导和毛泽东军事思想。

胜利归功于以压倒一切敌人之气概冲锋陷阵的广大指战员。各纵队首长都冒着炮火到了作战前线，有的团长、政委亲率部队冲锋，还有七处负伤仍率领部队夺占敌人山头的英雄连长，近万名指战员负伤，更有2000多名干部战士把最后一滴血洒在围歼和阻击敌人的战场上。他们的牺牲精神，是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铭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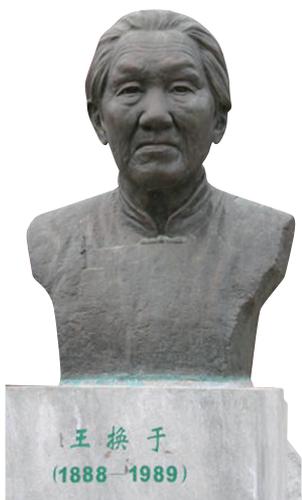
胜利归功于广大人民的支援。鲁中人民群众战前实行空舍清野，给敌人造成很大困难，战役中有20多万民工大力支前，对战役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没有老解放区地方党和政府领导下的支援，胜利是不可能的。鲁南的地方兵团和各地广大民兵配合战役取得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

现在，我想以1947年5月22日新华社的时评来结束这段回忆。时评写道：“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从去年7月到现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已经歼灭了蒋介石正规军50个整旅（旅以下成团成营被歼灭的正规军及全部被歼的伪军、保安部队、交警、还乡团等均未计算在内）……蒋介石以近100个旅使用于华东战场，欲以此决定两军胜负，这个主观幻想已接近于最后破灭。这次蒙阴胜利，在华东解放军的历史上更有特殊意义。因为：第一，这是打击了蒋介石今天最强大的和几乎唯一的进攻方向；第二，这是打击了蒋介石的最精锐部队（四、五个精锐师之一）；第三，这个打击是出现于全解放区全面反攻的前夜。和这个胜利同时，东北、豫北、晋南、正太等地，强大的反攻正在展开。”

# 叫一声母亲泪花流

——追忆沂蒙母亲王换于

薛杰 李顺利



**题记：**沂南县地处沂蒙革命根据地中心，革命战争年代，这里留下了罗荣桓、徐向前等老一代革命家战斗的足迹，人民群众中也涌现出一大批先进英模人物，其中沂蒙母亲王换于就是沂蒙人民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光辉典范，她的事迹被广为传颂。

2003年9月19日，地处沂南县马牧池乡的“沂蒙母亲王换于纪念馆”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王换于铜像与国家审计机关、山东省直机关党工委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同时揭幕、揭牌。原国家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迟浩田亲笔题写的馆名熠熠生辉。王换于的大女儿、83岁高龄的北京市离休干部于淑琴，当年战地托儿所的成员——原电子工业部某处处长、胡奇才将军之子胡鲁克等人长跪在王换于铜像前。最是难忘慈母恩啊，他们纵情地喊一声母亲，泪流满面。人们在偌大的展室中参观，在唏嘘的感叹中，仿佛又回到那战火连天的艰苦岁月，沂蒙母亲王换于那感天动地的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

## 无私创办战时托儿所

王换于（1888—1989年），娘家是沂南县岸堤镇圈里村，贫苦出身的她19岁就嫁给马牧池乡东辛庄于家。旧社会妇女没有地位，到夫家后就两姓合在一起，她被称为于王氏。抗战爆发后，她曾任我党情报联络员等，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腊月，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被选为村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在外工作不能没有个名字，于是就将于王氏改成了王换于。那时她已经年过半百，大家都称她“于大娘”。

1939年夏，日寇扫荡的时候，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首长徐向前、朱瑞来到了东辛庄。她那个村因为汶河顺着山势绕了大半圈，三面环水水连山，只有一条出路，有“兵家绝地”之说。日本鬼子虽然那么猖狂，却不敢随便进村子。可是共产党人就不怕，只要依靠群众，绝处也能求生。领导同志看准了她这个庄，就驻扎在那里。不久，大众日报社也搬迁到她家里。从那时候起，她便认识了徐向前、朱瑞、黎玉、王建安、胡奇才、陈若克、毕铁华等许多首长和同志。她和他们朝夕相处，结下深厚的情谊。那时她们山村虽不富庶，可群众千方百计为部队弄吃的。她操持着家务，有时一天办七顿饭天还不黑（同志们工作忙碌，吃饭不及时，你走了，他来了这样做饭就不分钟点了）。

王换于创办了战时托儿所，可她的四个孙子、孙女却先后夭折。当时，她看到部队领导干部的20多个孩子长得精瘦，就向徐向前建议说：“这样下



战时托儿所的孩子們

去不行，得给孩子找奶母，分散喂养。那样既能很好照料孩子，打起仗来也好掩护。”徐向前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就安排她去完成这项任务。

她有两个儿子两个闺女，抚养孩子是有经验的。山村里穷，没有细食滋补，孩子主要靠吃奶。她就挨村挨户打听，谁家的孩子夭亡了，就动员女的不要把奶退回去，把需要哺乳的孩子送给她抚养；稍大一点的孩子，就送给抗日“堡垒户”照料。这样一来，机关里27个孩子全被安排了下去。她自家也抚养着两个。她除了当村妇救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外，又当起托儿所的所长，最多的时候达50余个孩子。她想：抚养孩子也是为了抗战。所以不论到哪个村里发动抗战工作，总忘不了到户里去看看抚养的孩子。一次她到西辛庄，看望烈士的爱人刘仁铁、高志寄养的孩子。抚养孩子的人家没有奶，山村又少医缺药的，孩子瘦得不像个样，她一阵心酸，就将孩子抱回了家。这时她二儿媳正在哺乳期。她便对二儿媳说：“把这个孩子拉扯着吧。这是烈士的后代！让他吃奶，让咱们的孩子吃粗的。咱们的孩子就是磕打死了你还能生育；烈士的孩子死了，就断了根了。”二儿学荣是个党员，不用说就想得通。于是二儿媳就把这个孩子拉扯着。后来二儿媳的头两个孩子都没有成活，可她抚养的几个孩子却一个也未受损失。她家先后抚养过罗荣桓的女儿罗琳，陈沂与马楠夫妇的孩子陈小聪等。

战争的环境是残酷的，但王换于毫不畏惧。1941年冬，日寇对沂南进行大扫荡，30多个孩子被她分别掩藏在村外两个地屋子里达两个多月。还有一次，听说鬼子要过大梨峪，她立刻跑到那里，通知抚养孩子的一个妇女带着孩子赶快转移到亲戚家里。孩子刚转移，敌人就来了。没来得及转移的王换于经过一番周旋，才摆脱了一场危险。尽管那个时期形势紧张，可由于安排周全，各户里抚养的孩子一个也未受到损失。孩子们长大后时刻不忘沂蒙山区的养育之恩。王换于在世时，有的来信，直接称呼老人家为“父母大人”，有的每年将抚养他们的亲人接到工作单位去团聚一次，有的还经常往山沟里寄东西，还有一些首长和同志常到山里来探望亲人。原工程兵副司令员胡奇才从北京来过，原上海市委副书记陈沂从上海来过……2001年春，罗荣桓之子——某部政委罗东进还专程来到山村看望了王换于的二儿媳张淑贞老人。战争年代沂蒙山区人民和子弟兵结下的深厚友谊，将世代永远传下去。

## 精心保存战工会联合会刊

1940年夏天，山东的工、农、青、妇、文各界代表，冲破了敌人一层又一层的封锁，冒着炎夏酷暑，跋山涉水汇集到该县青驼寺，参加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会。大会从7月26日开始，开了整整一个月。会上选举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即山东省政府的前身）。这次会议在山东的抗战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会后，出版了一本《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全书20多万字，由于当时纸张、印刷材料的困难，这本书印数有限，是一份抗战时期少有的资料。书中收集了所有在会上作报告的领导人的讲话稿，登载了山东省的行政机关和群众团体所有领导成员名单。听说，只有少数几位首长有这本书。

在日寇发动对沂蒙山区“大扫荡”紧急关头的一天，山东省参议会副参议长马保三把这本书交给她，并语重心长地对她说：“您为抗日斗争做了大量工作，同志们永远不会忘记您。现在把这本书交给您保藏，这要比掩护一个战士或干部还重要得多。您要千方百计把这本书保存好，等战争胜利了我们再来取。”她双手接过这么轻轻的一本书，心里却沉甸甸的。抬眼看看马副参议长，他把书交给她显得十分放心的样子，她顿时增加了百倍的信心。为掩护革命干部，她在村子隔河靠山的隐蔽处挖了许多山洞子，家中的东屋里也挖了地洞。她把那本书当成了心肝宝贝，用一块印花棉布包好，收藏起来。由于后来战事频繁，许多首长离别后没有再回来，这本书一直保存完好，没出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本书该见天日了，她时刻盼望着马保三同志来取。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邻近村子里出了坏蛋，投奔到敌人那里当了还乡团。他们了解底细，知道她过去常和首长们接触，家里或许还保存着什么重要东西。他们也知道山上有洞，知道哪个山洞能藏人，哪个山洞能藏东西。为给这本书找个安全之地，她不得不将它频繁转移，有时还带在自己身上。她想就是自己牺牲了，也要保全这本书，决不能让它落到敌人手里。1947年冬季的一个中午，国民党还乡团到解放区烧杀掳掠。她得到消息后带上这本书准备转移。突然一伙匪徒闯进了她家，直冲她来了。匪徒们晃动着长枪上明晃晃的刺刀，恶狠狠地问道：“你叫王换于吗？听说你给八路军藏过东西。现在还有什么？快交出来！”

“俺是个老粗，听不懂你们的话。过去打鬼子的，到俺家也不过是喝水、吃饭，俺没见过什么东西。”

“叭，叭”一个匪徒劈头带脸打了她两个耳光，她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匪徒把刺刀架到她的脖子上威胁她说：“你这老东西装糊涂！今天要是交不出东西，就要你这条老命！”

她定了一下神说：“你们愿意要我这条老命就拿去吧！”她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其实心里扑通扑通的，这本书正掖在她的棉裤腰里呢。

敌人威胁了一通，问不出一句话，便气势汹汹地到处翻腾，屋里屋外、箱子柜子、甚至连老鼠洞都掏遍了。敌人搜查了一阵，没有结果，就把注意力转到她的身上。一个匪徒朝她走来，刚要动手，她急中生智地大喊大叫，并大声骂道：“混账东西，你想干什么？我老妈妈了60多岁的人了，过去日本鬼子也都没能把我怎么样，你想怎么样？你有没有父母？你是不是你爹妈生的？你是不是个中国人？”她这一招还真有效，只见那匪徒缩了手，脸红到脖子根底下。可是冷不防背后一个匪徒劈腰捣了她一枪托子，她疼得猛一缩肚子，那本书一下滑到裤筒里去了，她想这帮坏家伙总不能向她下身搜吧，书滑到裤筒里，双腿缠着腿带子，反倒更安全了。她顾不得腰疼，故意提高了嗓门说：“你们不用打，也不用翻，我自己脱下衣裳你们看看，你们哪一个不算娘养的，尽管睁开狗眼，可别闭上……”说着她便解开大襟扣子，露出了半个肩膀，接着她就做出要解裤腰带的样子。匪徒们看见她一本正经的架式，断定她身上不可能有什么重要东西，也实在不愿意在她这60岁的老妈妈面前出尽丑态，便灰溜溜地走了。就这样，书终于保存了下来。

全国解放后，她常常把那本书拿出来晒晒，以防虫蛀，等候有朝一日首长来取。年复一年地过去，她已经成为年逾九旬的老人，1978年，她便把这本书交给了沂南县领导部门。县委派人送来一张奖状和一笔奖金。这钱，说什么她也不收，同志们再三解释说这是领导的一点心意，她才收了。

随后，这本书被征调到山东省档案馆去，填补了省档案馆关于山东省第一次各界人士代表联合大会资料的空白。1983年《山东党史资料》第四期（总第十一期）根据这本书集中整理翻印了新本。

《山东省联合大会会刊》一书在她手中几经风险，仍安全地保存下来，并且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她感到无比欣慰，没留下一点遗憾。

在抗日战争艰苦的岁月中，王换于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一大批八路军伤病员和抗日干部。

1941年11月，日寇开始对沂蒙山区进行“铁壁合围”式的大扫荡。有一天下午，依汶村的王洪山推着独轮小车把一名伤员送到她家里。那时候来个伤员不是奇事，她象往常一样，赶紧收拾铺盖，轻轻地伤员放到炕上。

伤员的伤势真是不轻，浑身血肉模糊，前胸、后背和四肢的皮肉都象烙熟了一样，一块一块地往下掉，身上流出来的不像脓不像血，是奇臭难闻的恶水。他的面目全非，神志昏迷，只有一口气了。她见过不少伤员，可是从来没见过伤成这样的。她怀着一丝希望，立即进行抢救。她象喂孩子一样，把他轻轻揽在怀里，用左胳膊托着他的头，叫老伴用火镰（过去农村打火用的小钢片）慢慢地撬开他的牙齿，大女儿淑琴用汤匙将红糖茶水慢慢送进他的嘴里。时间一刻一刻地过去，看到伤员的气越喘越粗，她合家人打心里往外喜。

经过抢救，伤员终于睁开了眼睛。他先是惊疑，然后用目光到处搜寻着什么。当目光转到她脸上时，便开始凝视。他干裂的嘴唇动了两下，轻轻地喊了一声：“于大娘……”她听出声音有点熟，情不自禁地问道：“你是……”他非常艰难地答道：“毕—铁—华……”她一听到这个名字，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扑簌簌地落了下来。两年前的情景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那是1939年初冬，大众日报社从牛王庙迁到了她家，毕铁华这小子在报社发行科工作。他模样俊俏，心眼机灵，手脚勤快，常常帮她挑水、扫地、推磨、碾米……有时候和她家的那些孩子互相打闹，那股子乐呵劲，实在讨人喜爱。

1940年3月孙祖战斗后，大众日报社从她家迁走了。听说铁华被分派到依汶搞采购工作，可是一直也没见面。没想到一年半后他却伤得让她无法辨认。她既疼他，又恨敌人，热泪一个劲往下滚。

经过三天三夜抢救，铁华终于脱离了危险。他慢慢向她叙述了遇难的经过：

1941年11月“留田突围”之后。大部分敌人被罗荣桓政委牵着鼻子离开了中心根据地。一天下午，在依汶北大山坚持游击活动的毕铁华、王雁南等同志，回到了依汶村，察看大众日报社埋藏的印刷材料和其它物资。不料，这天夜里，铜井据点的敌人突然包围了依汶村。铁华竭尽全力对付前面的敌人，不料被身后的敌人拦腰抱住。他被捕后，敌人对他严刑逼问。敌人怎么拷问，铁华拒不回答。敌人狗急跳墙，吼叫着命令把铁华的衣服全脱光，用点燃的香在他身上一点一点地烧。铁华怒骂翻译官是狗汉奸、民族败类。翻译官恼羞成怒，命令部下点起一堆木柴，用烧红了的刺刀烙他的身体。从夜里一直折腾到第二天上午，铁华身上百分之八十的皮肉被烙糊了，可是敌人没有从铁华嘴中得到一点东西。

铁华虽然暂时脱离了危险，可是他的伤是一时半刻难以治好的。她跑了许多地方，到处打听治烙伤的民间验方。听说獾油拌头发灰能治烙伤，她就爬上南山找到一家猎户，托他打了一只獾。她把自己的长发剪下来烧成灰，和好，给铁华搽敷，但是见效不快。后来听说“老鼠油”是专治烧伤的特效药，她又想法搜集来，搽敷后没几天，铁华伤处就结了痂，不



1983年，毕铁华又来到王换于家，看望他的救命恩人。

再流脓淌血了。

尽管铁华伤得很厉害，可他从不喊一声疼，叫一声苦，她大女儿淑琴侍候他，他说啥也不依，说：“我身上又脏又臭，叫大姐给我擦洗，我实在过意不去！”她就说：“孩子，眼下养伤是你的头等大事。你烧成这个样子，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咱穷苦人民得解放，为了打败日本鬼子？往后可别说那些见外的话。”

他的伤治好了，可是身子弱，一时上不了前线。为了安全，她把他转移到山洞里，还要她老伴在四外站岗。铁华在山洞里坚持锻炼，洞口准备好许多石头，以防万一。她去送饭，怕饭凉了，就把刚摊好的煎饼揣在怀里。铁华看了不忍心地说：“大娘这样还了得！当心把你的胸膛烫坏了。”她说：“再烫也不会烫成你那样子，即使烫伤了，还有老鼠油呢！”说着，他俩都笑了。

40多天后，铁华恢复了健康。他决定重返工作岗位。临别那天，大家痛哭了一场。从那以后，老长时间没再见面。

1983年9月8日，县上来人通知王换于，说从广东来了个姓白的同志要看望她。她想在自己的一生之中不曾交往过姓白的。“当吉普车开进俺村之后，倒是俺二儿媳妇先认出了他：‘这不是小毕吗？’我拭了一下昏花的眼睛，认真端详了一下。是他，就是他——毕铁华。原来他现在改姓白了。”见面后大家高兴极了，几十年来的悲欢离合涌上心头，激动的热泪，洒在那当年曾经一起流血流汗的热土上。

### 含泪掩埋烈士遗体

也是1941年的冬天，当铁华的伤势刚刚脱离危险的时候，又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陈若克同志在沂水县城被日寇残暴地杀害了。听到噩耗，王换于只觉得天旋地转，脚底无根，一下子昏倒了。

陈若克是当时八路军一纵政委朱瑞同志的爱人。她老家是广东，出生在上海。她在苦水里泡大，从11岁就开始做童工，是共产党指引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36年加入了共产党，1938年同朱瑞同志结婚，1939年从太行山来到沂蒙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那时她就住在王换于家的南屋里。1940年8月，在山东省各界代表大会上，她代表全省妇女作了《山东妇女运动的任务》的报告，并当选为山东省妇女救国总会执委常委。1941年冬天日寇大扫荡时，她

已经怀孕8个多月了，可她毅然决定跟随部队转移，王换于不让她走，她倔强地说：“咱们革命哪能避艰险！我是个领导干部，要是找个地方躲起来，怎么去号召同胞们抗战？”王换于实在留不住她，就说：“你一定要走，就化化装吧。”王换于把自己的大襟褂子给她穿上，又把头发给她梳理了一下，打扮成一个农家妇女的样子。若克走后，王换于的心提到嗓子眼上，整天为她的安危担忧。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1941年12月中旬，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山东纵队做敌工工作的同志，把陈若克的遗体从敌人的虎口里运到根据地。不久，又秘密地运到东辛庄村。打开蒙在上面的被子，只见若克面目全非，四肢不全，衣裳全部破烂，只有一条苏联产腰带（这是朱瑞送给她的结婚礼物）还能辨别清楚。旁边还有一个婴儿的尸体，用白纱布裹着，头戴的白纱小帽，有一颗若克为她精心制作的红五星。

护送若克遗体的同志含着热泪说：“若克是拖着快要临产的身子，在11月7日从大固撤退的时候，不幸落入敌人的手里。起初她要求速死，但敌人强制着把她带到沂水城进行审讯。敌人拷问她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丈夫姓什么，干什么，若克冷冷地回答：我和丈夫都是抗战的，打日本鬼子的！若克大骂敌人的残酷暴行，敌人就把她吊在梁上拷打，昏死了就用凉水泼，苏醒后再用杠子压。在敌人的残酷摧残下，若克同志早产了。敌人看硬的不行，改用软的手腕，拿来牛奶给孩子喝，企图用她疼爱孩子的心理诱使她屈服。若克对敌人的卑劣行为极端蔑视，把牛奶泼在地下，和孩子一起展开绝食斗争。敌人使尽了招儿，最后下了毒手。”陈若克同志怀抱婴儿，大义凛然地走向刑场。敌人过去强夺她的孩子，若克拼命地抱在怀里不放，高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敌人用刺刀将若克母女活活穿死。那时，若克才22岁……

听着来人声声血泪的诉说，她的心象被撕碎了一般。晚上，王换于坐在昏黄的油灯下，边哭边为若克和婴儿做寿衣。大滴大滴的泪珠，模糊了视线，手指被针扎出了血都觉不着疼。她和若克相处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在眼前浮现：

那是陈若克乍来她家的时候，有一天她偎在王换于的怀里，甜甜地说：“大妈，我从小就离别母亲，就做您的女儿吧！”她向王换于倾诉了她的身世，讲述了许多革命的道理。从此，王换于和她亲如母女，有时一个铺上睡觉，一起参加妇女会议，一起搞抗战宣传……

王换于一边回忆，一边穿针引线，密密的针脚，缝进了无限的哀思。寿衣缝好后，王换于仔细地给她母女俩穿上，整理了一下遗容，便将若克的遗体装进棺材，将婴儿的遗体单独装进一只小木匣里，放在若克棺材上面。婴儿和母亲一样光荣！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几天，就和母亲一起进行了一场英勇悲壮的斗争。

第二天，在村头上举行了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汶河的流水呜呜咽咽地向远处流去。大家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悼念陈若克烈士。若克的丈夫朱瑞同志也来了。他声调低沉地说：“若克同志是为着党，为着革命，为着妇女解放而牺牲的，所以我特别的悲痛和偏爱。”他昂起头来，号召大家以命还命，以血还血，一直斗争到最后的胜利。在场的男女老少无不失声痛哭，心里燃烧着复仇的怒火。这天夜里，陈若克和婴儿的遗体，一起隐蔽地埋葬在村东王换于家的黄土地里。

全国解放后，为了缅怀先烈的英雄事迹，1953年沂南县人民政府将陈若克和孩子的遗骸迁葬到孟良崮烈士陵园。

1989年，101岁的沂蒙母亲王换于与世长辞。她没带走遗憾，却为这个世界留下了许许多多……她的品德和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人们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沂蒙母亲王换于，人民永远怀念您。

# 战斗在沂蒙山

——记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王彬

gherry 511



1939年8月，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图为纵队领导合影

在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的名单中，有六位未参加1955年授衔的将领，他们是：耿飏、伍修权、孔原、周文龙、舒同、王彬。

王彬原名李彬，曾用名王致中。1908年生于山东濮县（今河南范县）。1926年起在国民革命军孙殿英部任排长、连长、副营长等职。1932年入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高级教育班第二期学习，1933年毕业后，先后任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参谋，国民党军63军教导队队长，北平辅仁大学军事教官。在党的影响下，他接近进步乡友，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参加了1935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在白色恐怖下保护了一些爱国学生免遭反动派迫害。193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于1937年10月辗转到延安，在中共中央学校学习并兼任军事教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侵入山东。山东人民在中共山东省委的领导下，迅速掀起了抗日的热潮。

1938年2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向中央“要兵”，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3月，正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王彬就接到中央通知，去山东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同他一起到山东的共有70多人，由郭洪涛带领。临行前，郭洪涛与王彬及其他几位同志一起，专程向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告别，当面聆听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山东问题的指示，这些指示的基本内容就是后来《论持久战》中的主要精神。毛泽东还对他们指示说：你们到山东，不要只管山东，而要统一领导苏鲁豫皖边区的抗日战争。

## 前往山东

5月中旬，王彬一行在山东省东平县张北华领导的六支队活动地区与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张霖之接上了头。之后，张霖之派一个团护送他们去鲁中，在莱芜以南地区，与四支队胜利会师。不久，王彬就任四支队的参谋长，林浩为支队政委，赵杰为副司令。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将原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

王彬到任后就大力扩大八路军的影响，宣传抗日，争取同非党人士的合作，共同抗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将原国民党莱芜县长梁竹航争取到了共产党阵营（梁竹航解放后任粮食部的司长），从而顺利打开了局面。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后，制订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中心是要创建沂蒙山中枢根据地。毛泽东和刘少奇同志审阅了这个计划，并电示：“战略计划尚妥，照此做去。”

这时，在鲁南坚持工作的特委书记叫郭子化。党中央决定成立苏鲁豫皖省委后，郭子化派王见新来省委，宣传鲁南的群众基础和地形对开展游击战争有利，省委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定派书记郭洪涛率省委机关去鲁南创建抱犊山区根据地。王彬率四支队两个团，掩护省委去鲁南。到鲁南后，首先和郭子化会师。他那里有三个大队（营）的抗日武装，司令员张光中，政委李乐平。

## 打申从周

与郭子化会师后的第二天，省委就决定攻打申从周。申从周是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司令，也是费县、滕县一带地主武装的主力，有2000多人，不打日寇，专和八路军作对。6月上旬，我鲁南起义武装就曾遭到申从周的围攻，义勇队第一总队政委何一萍牺牲。

攻打申从周的战斗由王彬统一指挥，当时王彬手中有两个不满员的团。申从周的司令部设在冯卯，这是个大村子。为了出其不意消灭敌人，王彬兵分两路，用三团一个营直插冯卯顽军司令部，二团直接进攻外围顽军主力。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消灭了申从周地方武装1000多人，只有申从周和少数人逃走了。

冯卯攻下之后，对周围的敌人震动很大，大部分地主武装都投降了，只剩下了冯卯东边一个大地主，是申从周反动武装的死硬分子，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的炮楼和八路军顽抗。王彬找到当地的开明地主李维需，从他那里得到20发八二迫击炮弹，终将炮楼攻下。

这两仗旗开得胜，打得漂亮，扩大了我军的影响，也显示出了王彬高超的指挥艺术。

## 回师鲁中

打完申从周后，郭洪涛和王彬深感鲁南的情况并不象郭子化和王见新讲得那样好，在这里创建根据地很困难。于是，郭洪涛决定，返回群众基础较好的鲁中沂蒙山区创建根据地。

决定回师鲁中之后，郭洪涛和王彬率省委机关和四支队的的一个团出发了。在途经费县西南、滕县东北大山区白彦村附近的八里沟时，部队遭到该村大地主孙鹤龄的包围。时间是夜里两点钟，敌人居高临下，三面夹击，将我军队伍打乱，机关散了，电台丢了，部队也集合不齐，一时陷入了被动。面对险恶的困境，王彬镇定自若，果断组织部队抵抗，稳住了阵脚。天亮后，王彬冷静观察周围的地势，发现北山口以外有个山头，如果控制了 this 山头就可以掩护大部队过去。他当即命令一个连去占领这个山头。但可惜晚了一步，被敌人先占领了，这下形势更加恶化。我军在八里沟困了整整一天，断粮断水，形势非常危急。在这种关

键时刻，王彬协同郭洪涛一起将失散的省委机关重新组织起来，找回丢掉的两部电台，重新集结部队，决定夜里突围。经过仔细地观察判断，王彬果断决定通过西侧山峰向南突围，这一方向大大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一下子被冲了个稀里哗啦，部队和机关全部安全突围，返回了郭子化的特区。经过短期休整，决定再次回师鲁中。

由于有了八里沟被困的前车之鉴，第二次回鲁中就非常谨慎了。郭洪涛和王彬决定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兵不血刃地通过白彦村。通过省委统战部的赵笃生与白彦大地主儿子的师生关系，终于说服了白彦的大地主同意借路。经过整整一天的行军，途中虽然遭到地主武装的开枪袭击，但终于有惊无险，顺利通过了白彦村。部队到达费县以北地区后，随着靠近沂蒙山区，群众同情和支持八路军的多起来了。在一个村子里，部队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然后，又挥师北上，终于胜利到达沂蒙山区，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四支队会师，时间是1938年9月。

和四支队会师后，郭洪涛将省委机关放在沂水县西北部的王庄。后来这里成为苏鲁豫皖省委和中共山东分局的所在地。这在山东省的革命斗争史上称为“王庄时代”。从1938年9月开始，一直到1939年夏季日本鬼子扫荡，约一年的时间，山东党和军队的首脑机关一直设在王庄。

郭洪涛和王彬到王庄之后，头一个任务是建立和健全省委领导机构，加强省委对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领导，确定了在沂蒙山区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战略目标。1938年9月下旬，省委还召开了苏鲁豫皖边区的县委书记会议，对各地工作的领导加强了。

不久，郭洪涛指示王彬把跟随他南下的部队交还给四支队，廖容标接任司令员职务，政委为林浩。在王彬返回王庄途经南麻东部的悦庄时，碰上了奉中央之命从延安来山东工作的张经武和黎玉，当即被张经武留下，负责指挥和领导他们带来的津浦支队（一个营）和部分干部。当时，张经武带来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王彬看过之后省悟到他在延安向毛泽东辞行时，毛泽东已经将该书的主要精神和他讲了。

## 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

1938年，是我山东各抗日游击队取得辉煌战果的一年。根据七个抗日支队的统计，到1938年底共击毙敌松井大将、山村中将等以下敌伪军3300余人，俘虏敌伪军180余人，击落敌机2架，毁敌汽车68辆，火车头17台。我军曾一度攻入济南，四次攻入烟台，两次攻入威海，恢复县城十余座，并在胶东的蓬莱、黄县、掖县等地，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开辟了我党在山东最早的抗日根据地。

1938年12月上旬，中央指示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领导成员暂时不变。12月27日，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统一领导山东各支队的武装斗争，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委，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从此，山东的抗日游击战争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

1939年秋，中央派王建安来当山东纵队副指挥，进一步充实了山东纵队的领导力量。当时支队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辖第二、三、四、五、六、八（七、八支队合并而成后改为一支队）、十二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两个特务团、临（沂）郯（城）独立团等单位。每个支队相当于一个师。

山东纵队成立后进行了整编，编成十个支队（二、三、四、五、六、八、九、十二、挺进、陇海南进支队）、三个团（特务团、直辖团、临郯独立团），共2.45万人。所属地方独立营团为1600人。3月30日，山东纵队进行第一期整军。整军后的建制是：第四支队编为一个团，活动在泰（安）、莱（芜）边沿地区。第五支队编为三个团，巩固蓬（莱）、黄（县）地区，创建栖霞（霞）、莱（阳）、平（度）、掖（县）根据地。第七、八支队（即八支队）

改为第一支队，编为两个营，在安丘西南一带活动。原第二支队编为一支队的另一个营，仍守日照东北两个海（以后从该区撤退）。第五支队的六十一团与第十二支队合编，成立新的第二支队，在临沂、费县边区活动。第三、六支队及陇海南进支队不变，仍在原地活动。

4月上旬，罗荣桓来到山东分局，向领导干部传达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是错误的，号召我军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和抗日根据地。通过这次学习，王彬和其他领导逐步认识到了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方面出现的偏差，并注意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

### 一纵与山纵的合并

1939年是山东党和军队领导机构变化比较大，不少人搞不清楚一纵、山纵、一一五师、山东分局、苏鲁豫皖分局的相互关系，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领导机关和名称不断变化，让人难以区分清楚。

张经武和黎玉于1938年8月21日从延安出发，11月到达鲁中，即开始组建山东纵队，12月中央下令正式成立山东纵队。1938年9月，萧华率115师343旅机关百余人抵冀鲁边区。1939年2月，罗荣桓率343旅684团到鲁西。115师的司令部于1939年8月到达山东。当时，王彬带一支队（即七、八支队）到泗水（石莱、仿城）一带去策应他们过铁路。当时带领115师的是参谋处长王秉璋，随同来的有教导大队和第七团，团长彭雄。

115师入鲁之后，山东境内便出现了山东纵队和115师两支八路军队伍。为了统一指挥山东纵队和115师的武装力量，1939年6月中央派徐向前、朱瑞到山东。8月10日，第十八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任命徐向前为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朱瑞为纵队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纵队、115师和苏北的所有八路军部队。8月9日，中共北方局批准成立山东军政委员会，朱瑞为书记，其他成员有徐向前、郭洪涛、罗荣桓、黎玉、张经武等同志，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民的工作。

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后，只有司令员和政委，其它都是空架子，所以一开始就和山东纵队在一起活动。随徐向前来山东的只有王建安、罗舜初、谢有法等少数几个干部，因此徐向前便与山东纵队几个领导商量后并报请中央同意，八路军第一纵队与山东纵队的机关合并。合并后，一纵和山纵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领导机关和领导人都合而为一了。纵队司令员徐向前、政委朱瑞、副政委黎玉、王彬任参谋长、江华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张经武、郭洪涛相继调离了山东。

### 打东里店受挫

东里店位于沂水和沂源之间，曾经是国民党省政府的所在地，但在1939年夏季的敌人“扫荡”中，东里店失守，日伪军安上了据点。

当时，徐向前刚刚担任一纵司令员不久，他与王彬、张经武商量，认为国民党把东里店丢掉了，还让敌人安了据点，如果我们把它拿下来，意义很大。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攻打东里店。

主攻东里店的一支队部队在李福泽的指挥下打得很顽强，主攻营已经打进东里店，但是，担任阻击任务的滨海独立营是新组建的部队，缺乏战斗经验，结果让从沂水增援的敌人冲了进来。我主攻东里店的部队，处于腹背受敌的情况，只好撤出了战斗，东里店没有攻下来。徐向前为此发了火，站在院子里狠狠地批评了独立营刘营长。王彬是第一次见到徐向前这么大火。后来王彬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时，和徐向前聊起这件事，徐向前主动承担了责任。这种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为下级承担责任的精神对王彬触动很大，在后来的工作中，他一直将徐向前的这种优良作风作为自己榜样。

### 讨伐秦启荣

秦启荣是一个专打内战，不打日军的国民党顽固派，曾一手制造了震惊华北的“太河惨案”。此后，秦逆不顾八路军的一再争取和警告，不断地对八路军进行骚扰和攻击，对刚刚开始形成的大好抗战局面是一个严重的威胁。

1939年秋，一纵和山纵合并不久，徐向前司令员就决定打秦启荣。作战方针由徐向前决定，张经武和王彬具体负责前线指挥。

秦启荣的活动范围在莱芜以北胶济路以南，主力在淄河流域与泰山之间。为了打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嚣张气焰，8月下旬，铁路以北的三支队调到了铁路以南，与一支队、四支队一起参加反击秦启荣的战斗，这实际上是集中了山东纵队的主力。经过仔细地侦察和研究，张经武和王彬决定将这一仗的主要作战地点放在胶济线以南的淄河流域的福山、八陡一带。经过几天的激战，秦启荣的主力被击溃。秦启荣带领败兵由淄河以东逃到淄河以西，当时，我军未能继续追击。回到纵队之后，徐向前对没有打歼灭战很不满意。从这件事上，王彬充分体会到了徐向前对下级指挥员的严格要求。通过这一仗，王彬学到了许多东西。在后来的生涯中，王彬一直



山东纵队过沂河奔赴抗日前线

将徐向前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师长。

### 五井歼灭战

打完秦启荣之后，徐向前和王彬令一支队驻守在临朐县西南山区，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保卫沂山、鲁山根据地，面向胶济线，保持鲁中与胶东、清河根据地的联系，同时靠近南麻的山东纵队指挥部，随时又可以作为纵队身边的机动武装力量。

当时，一支队的一营驻守在五井镇，支队司令部设在八里路外的茹家庄。五井镇在临朐县城西南30余里的山区，镇四周围有五六米高的石砌围墙，四周各有一门，象个小城堡。10月24日下半夜，驻益都、临朐城的一批日伪军突然来袭击五井镇。当时在镇上的负责指挥的是一支队司令员钱钧和一营营长李福泽。敌人首先偷袭并占领了五井东面300米处的莲花山，然后向五井镇发起进攻。天亮之后，钱钧和李福泽侦察了敌人的兵力情况，果敢地组织反击，中午便夺回了莲花山。王彬和张经武在纵队指挥部及时了解了作战情况，命令他们咬住敌人，力争全歼。最后100多名日伪军被团团包围在一个坟地里，经过激战，全部被我歼灭，无一漏网。这是山东纵队成立之后，打得最好的一次歼灭战。当年的《大众日报》曾发表题为《庆祝临朐大胜利》的社论，称赞五井歼灭战为“山东抗战两年来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经过一系列的战斗考验，山东纵队已经从一个新组建的年轻部队逐渐成熟并不断发展、壮大，开始成为一支令敌人胆寒的主力部队。1939年11月，王彬就任山东纵队第三军区（胶东军区）司令员，奔赴胶东，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 崎瀨山下访陈明烈士家乡

王有瑞



陈明辛锐夫妇

福建省龙岩市是著名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在新罗区东肖镇有一座山，名叫崎瀨山。山下秀丽的龙聚村，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烈士的出生地。多少年来，陈明和爱人辛锐的英名响彻齐鲁大地，而他在家乡的情况，却少有人知道。

2007年11月21日，笔者怀着对烈士的崇敬，在新罗区党史办主任符维健带领下，来到了陈明烈士的旧居，并采访了陈明侄子陈荣华同志，得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材料。

原来，陈明烈士有兄弟七人，他排行老大，他的六个兄弟有3个参加红军。陈荣华的父亲叫陈锦辉，是陈明的二弟，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参加红十二军，在部队病死。陈明四弟在1931—1933年期间也参加革命，在漳州时，曾给大哥陈明当通讯员。另有3个因为躲避敌人迫害而远渡南洋马来西亚。

陈明的父亲叫陈庭左，略识字，因为儿子当了红军干部，因此不能在家安住，于1933年初跑到瑞金参加红军，在部队负责养马。红军长征时，对人员进行遴选，规定不带老弱残疾。陈庭左年龄偏大，不能随军，又不敢回家，只得四处隐藏度日，在艰难困苦中颠簸，于1936年去世。

母亲郑连地，是本地红坊村人，在家更是担惊受怕，备尝生活的艰辛，于1945年前后去世。此时陈明已经牺牲四年，他的两位老人不知信息，怀着对儿子的思念和牵挂，先后离开了人间。

陈明生于1902年，21岁闹革命时辞别父母、离开家庭，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当过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后进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毕业后到中央苏区工作，担任过红军师政委。长征时在中央干部团任教员，抗战后到山东，担任山东分局党校

副校长，是中共著名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当时有“七只钢笔进山东”美誉流传，他就是其中之一。

1940年7月，在青驼召开山东各界人民联合大会后，陈明担任了山东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他全力从事抗日根据地的人民政权建设工作，发表了许多指导性的理论文章，直到1941年在东蒙大青山牺牲。

陈明外出革命后，很少回家，据他侄子陈荣华讲：“红军攻打漳州时，因为取道龙岩，红军队伍由他负责带路，部队正路过家门口，他回家一趟；红军长征前夕，为向父母告别，又回家一趟。”

陈荣华说：“他最后这次回家时，我已经5岁了，见到了他，记得了。他到延安后，给家里寄信一封，向父母报平安，此后断绝了音信。直到建国后，才听说牺牲了，这时候，我的爷爷、奶奶俱已不在人间了。我大伯父陈明牺牲的详情和埋葬地址无人知道，这给家中的亲人造成沉重的期盼！”

陈明究竟牺牲在哪里？埋葬何处？这让侄子陈荣华进行了30多年的苦苦寻觅……

78岁的陈荣华说：“建国后，我利用给供销社当采购员的机会，到处打听伯父陈明的音信，听说湘江战役死了不少闽西红军，我就到江西、瑞金查找，连湖南都打听了，找不到下落，俺新罗区有3000多烈士，也没有他的名字。我四叔就给北京邓子恢写信打听，邓子恢是东肖区泉井村人，比我伯父陈明大六岁，他们都是在家乡一块搞革命的知识青年。陈明当福建省委书记时，他当时是闽西特委书记，都是一个县里的老乡，他回信说，可能牺牲在山东。”

他继续说：“1966年初，我给山东省政府写信打听，他们把信转到临沂，临沂方面才告诉我说牺牲在哪里，埋在什么地方。既然有了地址，我就很想去祭扫坟墓，可是来了文化大革命，去不成了。

到1979年，我辗转北上，从江苏新沂转汽车到山东沂南县民政局，由一位姓王的副局长陪我，到东梭庄烈士陵园，见到了我伯父和大娘辛锐的墓碑和坟墓。当时墓还没移走，我在墓前照了像带回家来。我到山东扫墓来回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回家以后，我又和大连的辛颖联系过，通过电话，两家亲戚算是第一次联系认识。

1985年，临沂把陈明的墓移往临沂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并与大娘辛锐合葬，精制了坟墓，充分体现了山东革命老区对烈士是多么重视！我们家人十分感激临沂人民和当地政府。我们家里也没有埋空坟祭祀他，我回来后，只是刻了一块木牌，写着“烈士陈明故居”，悬挂在他原先住过的屋门口，作为标志，来寄托我们的思念。”

在陈荣华的倡议和指引下，我们一行又看他自制的那块纪念牌。这是一栋小黑瓦老房子，已有200多年历史。就其规模看来，当时还算富裕人家，可是到陈明父亲时候就已经开始贫穷，陈明在龙岩城里上中学，在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的影响。

我们边听介绍边观瞻已经闲置的烈士故居，看烈士睡过的阁楼和使用过的家具，人人神情肃穆，唏嘘感叹！想到陈明为救中国，起于南疆崎瀛山，之后奔赴北国沂蒙山，为抗日救国，夫妻喋血沟壑，在异乡大青山下，为人民献出宝贵的青春，不禁心头如铁追铅堵，万分沉重！

幸喜在烈士牺牲的东蒙山，人民没有忘记他！在临沂、费县、沂南等地方志书中，记载了陈明和夫人辛锐的英名。1986年，经山东省政府批准，临沂专署将陈明夫妇遗骨迁葬华东革命烈士陵园，为他们夫妇建造了六角亭结构合葬墓。

古人立碑喜作铭，陈明辛锐合葬建亭，宜铭，铭曰：

天南海北，相遇沂蒙。抗日救国，碧血苍弘。

世纪过半，重构辉亭。后人瞻仰，万世崇敬！

# 先贤原宪

王庆全



原宪（前515—？），姓原，名宪，字子思，亦称原思、原思仲、原仲宪。春秋末年鲁国人，孔子著名弟子，七十二贤之一。原宪是孔子学生中很有名的一个人物。孔子当鲁国司寇的时候，他担任过孔子家的总管职务。孔子死了以后，他退隐于山川草泽之中，以安贫乐道而著称。后从祀孔子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前之东庑内。他“少孔子三十六岁”（《孔子家语》卷九），生于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出身于贫寒之家，其家世生平后世知之者甚少。卒于何年不详。故里在今平邑县仲村镇南屯（旧称原宪屯）。村之东北3里处南武阳故城亦称原宪城。清光绪《费县志》从《兖州府志》、《山东通志》称：“原宪城城北数里许，王家武阳西岭有所谓播鼓台，非台也。周围砌以石，为古墓形制。”谓此为原子思墓。

原宪的思想特点是不贪财、不求仕。《论语·雍也》篇载：“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意思是：原思当孔子家的总管，孔子给他小米900斛，原思辞而不要。孔子就说，不要推辞，如果你自己用不完，就送给你家乡的穷人吧。在孔子的学生中，大部分是追求当官的，如子张就一心学习求官职的方法（《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原宪则不同。孔子死时，原宪37岁，正是精力旺盛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并没有去追求官职，而是“孔子卒，原宪遂亡在草泽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被历代儒家奉为神明的荣辱观，源于原宪和孔子的对话。“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邦”，指国家。“道”，原指道路、方向、方法、道理，“有道”指社会政治清明。“谷”，粮食。古代以粮食充官俸，“谷”也常用以指称俸禄。此用为动词，意为领取官俸，即做官。“耻”，耻辱。《论语·泰伯》又载：“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前一段是孔子回答原宪问“耻”时说的，后一段是孔子自己阐发的意见。两段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总的意思是，坚持自己的信仰，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当官领俸禄，要是国家政治黑暗，就躲开不干。原宪牢牢记住了孔子的这些话，同时他又认为春秋末年各国的

政治都很黑暗，找不到一个清明的可做官的地方，所以当孔子一死，他就隐居草泽，终身不仕。

安贫乐道是原宪思想的核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思（原宪）曰：‘克（好胜）、伐（自夸）、怨（怨恨）、欲（贪欲）不行焉，可以为仁人乎？’孔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弗知也。’”孔子是反对好胜、自夸、怨恨、贪欲的，所以原宪就提出不好胜不自夸……是否是仁人的问题。孔子虽没有肯定做到这些就达到仁的境界，但也肯定这是难能可贵的。可见他早就有意以不贪欲、不怨恨等品行，来培养自己的仁德。既然如此，自然他也就安于贫穷了。

孔子死后，原宪遂退隐在山川草泽中，过着不厌糟糠的清贫生活。而子贡聘享诸侯，过着富贵的生活。得意的子贡，结驷连骑来看这位过着贫穷生活的老同学。《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子贡相卫，而结驷连骑，排黎霍入穷闾，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择而去，终身耻其言之过也”。子贡拜访原宪，原宪破衣烂衫出来迎接。子贡为此感到羞耻，问原宪难道病了吗？原宪承认自己贫穷，但不承认自己是有病。本来，子贡来看原宪，既有炫耀自己的意思，又有想对原宪表示同情和可怜的想法，可是原宪并不感到自己这样不愉快，所以他既不理睬子贡的炫耀，也不接受子贡的怜悯，照旧自行其素，充分表现出他“安贫乐道”的思想。

原宪努力按照孔子提出的仁德行事，认真遵循孔子“危邦不入，乱而不居”和“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的思想。他以“安贫乐道”的行为，体现着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的学说。所以说，他是儒家思想的忠实成员。当然他和孔子也有不同的地方，如，孔子虽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可是他还是以救世者的态度到处奔走，而且所到的国家，也都是些既危又乱的地方。孔子虽然说“邦无道，谷，耻也”，可是他还是到处求仕。不当官时，他也并不逃避现实，而是一方面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评论，另一方面设坛讲学，招收弟子，大办教育，以这种方式影响和作用于社会。总之，孔子是个积极入世并以救世为己任的人。然而原宪不同。自从孔子死后，他就藏在草泽之中，不当官，不办教育，不和人们来往，终日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总起来看，他是个名哲保身，自求安逸，逃避现实斗争的出世主义者。虽然在个人品德上，有不少可以肯定的地方，如不贪欲、不自夸等等，但是从当时的时代潮流看，他的思想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

西汉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载：“及若、原宪，闾巷人也。读书怀独行君子之德，义不苟合当世，当世亦笑之。故季次、原宪终身空室蓬户，褐衣疏食不厌。死而已四百余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原宪的思想和行为对后世产生过重大影响。后代贫而乐道的人常常以“原宪”自居。东汉顺帝时张楷“家贫无以为业，常乘驴车至县卖药，足给食者，辄还乡里……隐居弘农山中，学者随之”。顺帝知道此人后，下诏征用他，诏曰：“故长陵令张楷行慕原宪，操拟夷、齐，轻贵斥贱，窜迹幽菽，高志确然，独拔群俗……”（《后汉书·郑范陈贾张传》）张楷见到诏书后，仍不应诏入朝，而是照旧“告疾不到”。可见他是个受原宪影响很大的人。

后代人们在谈到原宪时，还有如下的评论。有的说“原宪……请约守节、贫而乐道”，有的就说“处士贱贫，原宪非病”（《史记集解》）等等。唐朝人吴筠有《咏原宪子》诗：“原生何淡漠，观妙自怡性。蓬户常晏如，弦歌乐天命。无财方是贫，



原宪甘贫

有道固非病。木赐钦高风，退惭车马盛。”历代诗人也常常以“原宪”自居，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顾炎武等都留有咏赞原宪的诗句。

原宪“安贫乐道”的思想和行为，对于消除和稳定落第落魄的士大夫的不满情绪和维护社会治安有好处，所以历代封建官府尊孔祭孔的同时，对他也加以尊崇和封赐。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巡狩，“三月……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弟子”（《后汉书·明帝纪》）。从此以后，包括原宪在内的孔门弟子，就不断受到历代官府的祭祀和封赐。唐玄宗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封原宪为“原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又追封“任城侯”。明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改称为先贤原子。

原宪屯因其为原宪故里而得名，又因地处仲子故里仲村之南，民间习称南屯。上世纪80年代，原宪屯正式改名为“南屯”。



# 大河东去

## ——导沭整沂工程

时麟

1949年4月21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向国民党反动统治发动摧毁性攻击的同一天，在山东解放区临沭县境内马陵山下，20万民工在山东省导沭整沂委员会领导下，开始了第一期导沭工程。

“导沭整沂”是疏导沭河和整治沂河两项相关工程的简称，以导沭为主。导沭自1949年春首期工程开工，到1995年秋它的后续工程——沂沭河水东调工程基本完成，前后历时46年。虽然当中工程有间停，但其开工之早，历时之长，用工量之多，堪称新中国第一水利工程。它也是立足沂蒙、根治淮河、利在当今、功垂千秋的伟大治水工程。

在为期几十年的两项工程中，国家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百万沂蒙儿女作为工程所在地的东道主，和兄弟地区一起，为工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这些贡献和牺牲换来了工程的巨大社会和经济效益——根治了沂蒙水患，造福于鲁南、苏北。

### 一、根治淮河的序幕工程

沂河和沭河，是纵贯临沂市境、南流苏北、同属淮河水系的姊妹河。它们均源出沂蒙山区，上游多山，中游多丘陵，下游（含苏北地区）地势低平。沿河地质和地貌决定了它们河身上游窄、下游宽；河道水流落差大；而中游多丘陵，造成了它们的支流多而短。

鲁南、苏北冬春干旱、夏秋多雨的气候特点，使两河的年水流量极不平衡：常年的少雨季节或干旱之年，河道枯水断流；多雨季节或洪涝之年，上中游山洪暴发，冲走泥沙，致使下游河道决口，洪水泛滥，漫淹良田，给沿岸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沂州府志》对沭河沿岸的旱涝灾害有“三日之旱即成涸泽，一日之雨良田随沙石而去”之说。

沂、沭二河在历史上多洪涝灾害的为患“本性”，不完全归咎它们自身，其为祸范围也远不止于鲁南。



刘家道口枢纽

一者，它们自鲁中高处流向苏北和皖东北低洼的平原，是水往低处流的自然规律；二者，两河一西一东平行南下，当沭河流到鲁南郯城、临沭一带后，因东有马陵山相阻，所以它的洪水往往决堤西去，与沂河东溢之水汇合南下，再与皖东北的泗水合流，强行注入骆马湖，泛滥四溢；三者，历史上黄河多次决口，黄水南下夺淮，造成淮河淤塞，沂、沭二河尾系混乱，尾间串通，洪水在苏北沭阳、东海等县低洼处游荡，借其他河道入海。为此，仅沭河就有临洪口、埭子口和灌河口三个入海口。

沂、沭二河历代为患，不少有识之士皆为此提出过治理主张。清朝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郯城县令王植倡议“沂沭相关之省、县应一体疏治”。北洋军阀政府水利总局总裁张謇（清光绪甲午科状元）也提出“沂沭河兼治”。

民国十四年（公元1925年），国民政府在“治淮计划”中则首次提出了“沭河经大沙河从临洪口入海”的设想（沙河时为郯城县东北部流向临洪口的自然河道）。但在旧中国，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不关心民众疾苦，清末民初又战乱频仍，所以上述种种设想和计划都不可能实施。

历史进入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苏鲁皖部分地区建立了人民政权，治理沂、沭河水患才有了可能。1946年大涝，沂、沭二河洪水南下肆虐，淹没皖东及苏北2000万亩良田，500多万灾民流离失所，其惨状目不忍睹！

水患引起时任苏皖边区人民政府水利局副局长江国栋的思考，他萌生了“由苏鲁联手，治理沂、沭、泗三河”的想法。同时，他认为国民政府当年提出的“经沙入海”治沭方案可行。此后，他和同事们经过初步勘察、测量，向中共华东中央局写了报告。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形势转好，华东局遂决定治理淮河，并将“导沭整沂”定为首批工程。

1948年3月，山东省人民政府实业厅水利队到临沭县对沭河进行了查勘，并拟定了沂沭河治理初步方案。7月，省人民政府实业厅通过了导沭工程方案，10月，省沂、沭河流域水利工程总队组成3个测量队，对导沭经沙入海线路进行测量，为导沭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提供了资料。

导沭的核心是“导”，而“导”的关键工程为“经沙入海”。施工方案是：给由沂蒙山区南行、绕苏北平原，后又折向东北、经临洪口入海的沭河找一条捷径，为之开辟一条新河道，让它按人的意志东流，缩短入海路线。这样做的好处是：减少河下游洪水流量，腾出流入苏北的沭河故道作导沂入海通道，为江苏的“导沂整沭”工程打下基础。

“经沙入海”工程主要项目有：（一）筑河坝：在沭河中游临沭县河口村与大官庄之间，筑一道长1200米，底宽38米，高10米的拦河大坝，拦住南去的河水；（二）开引河：把沈马庄至陈棠村的马陵山劈开，挖一条长6.5公里，宽120米，深14米的河道，将沭河水导入沙河经临洪口入黄海；（三）修河堤：因沙河为天然河道，两岸无堤，所以要在它和临洪河两岸筑起65公里长的（合计130公里）河堤，建成一条横贯苏鲁边界的東西河道——新沭河；（四）修河堰：在引河上口修一座溢水堰（名人民胜利堰）。当沭河水流量达4500立方米/秒时，分1700立方米/秒，过溢洪堰流入沭河故道，其余洪水放入新沭河，东流入海。

“经沙入海”的导沭工程，在大官庄将沭河分为两支。大官庄以上与原沭河“共身”，源出沂山南麓，流经沂水、莒县、莒南、河东、临沭等县区。至大官庄后，一支过人民胜利堰南流，经郯城、东海县境，至新沂市口头入新沂河，沂沭合一东入黄海，称老沭河。另一支被人民胜利堰所阻，折向东流入引河，经临沭县南部流向江苏省东海、赣榆两县边界，至临洪口入黄海，称新沭河。它自大官庄至临洪口仅长78公里，比原沭河入海路线缩短近半，确是最佳泄（分）洪路线。

新沭河不但使沭河分流，而且为整沂的“分沂入沭”工程创造了条件，即分沂河洪水至大官庄，使之从老沭河南下。分沂入沂水道自郯城县刘家道口村北沂河左岸起，向东南至临

沭县河口村南，全长20.24公里。该水道自1951年11月开挖，次年7月竣工。设计指标为：沂河临沂站洪水达6000立方米/秒时，分1000立方米/秒入老沭河。

经沙入海的“导沭”工程和分沂入沭的“整沂”工程是根治淮河的序幕工程。

## 二、令人难忘的施工过程

“导沭整沂”和沂沭河东调工程施工早、工期长、工程量大，社会和经济效益显著，因此它不仅是沂蒙地区根治洪水的壮举，也是一部生动的新中国水利建设史书。

其一，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为导沭整沂工程层层建立了领导机构，调集了大批得力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组织施工，表明中共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对该项工程的重视程度。

1949年2月，为治理沂河、沭河，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批准导沭工程方案的同时，成立山东省导沭整沂委员会，由省政府副主席郭子化兼主任。其常设指导机构——导沭委员会驻临沭县陈巡会村，由鲁中南行署主任李乐平兼“导沭委”主任，滨海地委宣传部长狄生和山东省水利局副局长江国栋任副主任，张璠任总工程师。随后又调原新海连市（时属山东）市长薛翰亭任副主任主持工作。

1951年春，因第五期导沭和第一期整沂同时开工，导沭委员会改名“导沭整沂委员会”。鲁中南行署副主任王涛、山东省财委主任王卓如先后任主任，江国栋、薛翰亭任副主任。

工程全面铺开，又建立了沭河、沂河两个工程分处。沭河分处驻江苏省赣榆县沙河镇，薛亭任负责人；沂河分处驻山东省郯城县马头镇，负责人为杨庆先。除上层领导外，每期工程都设临时机构；地（市）设工程分处，县设指挥所，区设大队、乡设中队和若干小分队，各级都配备了得力的领导干部，其组织机构类似军事化。

其二，施工时间早、工程跨度时间长，在国内外发生重大事件的情况下也坚持施工，表明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心民众疾苦，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导沭工程开工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属“跨朝代”工程。当时，华南半壁河山还没有解放。鲁南、苏北虽已解放，但淮海战役刚结束，老区群众尚未从“支前”的紧张岁月中得到休养生息，不少新解放区还满是战后疮痍，加之灾荒，群众生活处于赤贫状态。

在这种民穷且备战渡江战役的艰难时期，华东、山东等党政高层领导仍能下定决心，搞导沭整沂工程，实属超常之举！而施工不久，又爆发了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在举国处于战争状态的非常时期，“导沭整沂”非但没有停工，反而激起了民工们要和前方战士比贡献的豪情，加快了工程进度。

为此，国画大师徐悲鸿1951年来导沭工地体验生活时，动情地为民工题词赞扬：“模范同志们，你们英勇创造出来的纪录，可与我们在前方抗美援朝战士们英勇光辉的战功同垂不朽的！因为他们在消灭猛兽，你们消灭洪水，洪水猛兽为害人类是一样，我国古人常相提并论的。”

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岁月里，广大干部群众竟能顶住“四人帮”大批“唯生产力论”的压力，在“导沭整沂”的基础上又实施沂沭河东调工程，确属又一非凡举措。

其三，“导沭整沂”工程参与者效法古人大禹的治水精神，以支前的劲头、战士的作风顽强施工，表现了他们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

导沭开工初期，由于灾荒，国家对民工实行“以工代赈”。民工一日三餐吃小米饭，但为了节约菜金、省下小米养家糊口，很少有人买菜下饭。从住的方面看，因为当时民工多，只能在沿河两岸搭席棚、睡地铺。冬季施工，民工们在席棚里铺上麦糠或狗皮、羊皮，盖着薄棉被，互相偎依着抗寒。因为席棚多是半地窖式的马架子屋，若有大雪降临，往往是雪埋

席棚，出入不便。

除了吃、住条件艰苦，就是干活劳累：当时施工无机械，挖泥全靠锹铲镐刨，运泥全靠肩抬车推；开石方则用大锤、钢钎和炸药。原始的、靠重体力劳动的水利施工方式在工地上随处可见。遇到工期紧张时，民工加班劳动没有灯光，只能借星星和月光打夜战。然而，艰苦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却丝毫减低不了民工劳动的热情。

有一年初冬，天气骤冷，雨雪和冰凌一夜之间就把某段民工住的工棚“埋”掉。当时民工们都还没穿棉衣，粮食也因天气恶劣运不来，10万人陷入饥寒交迫境地。沭河分处领导到临沭县大兴镇一带工地慰问，只见遍地白雪不见人烟，但到处都听到从地下工棚里传出欢声笑语和琴声、笛声，还有唱拉魂腔的歌声。

当工地大队长高声喊话，动员大家去白塔埠火车站（约百里路程）运粮时，民工们一个个从“地下”冒出来，钻出工棚，争先报名。不少人还穿着单裤、打着赤脚，就冒雪出发了。这种情景使一位工程技术人员深受感动，并为此给《工地小报》写了一篇报道，其中有两句话：“千人万马地下军，只闻歌声不见人。”

这里举的“地下军”一例，在“导沭整沂”工地上并非个别。光着膀子推“千斤车”运土，赤着脚丫子跳进冰水里用手抠淤，都是常见的事。除了特别能吃苦挨累之外，民工们在施工中还肯动脑筋、用智慧创造和改进施工手段，提高工效、保证工程质量。

在开挖新沭河引河工程中，自沈马庄至陈棠村的6.5公里河道均为岩石构造（石方总量约315万方），且岩性复杂，硬度自7.5级至12级不等，极难开采。炮眼打深了夹钢钎，打浅了轰不开石头，民工们编顺口溜形容：“打浅眼，密布炮，雷声大，雨点小，用药多，炸石少，急得小车吃不饱。”为了提高放炮出石率，临沭县民工参照煤矿爆破经验，在河槽底部挖深9米、直径0.9米的横洞，在洞顶挖药室，一次装炸药144公斤，起炮一次轰起石头1600多方。

这一创举被工程指挥部誉之为“松动大炮”，及时帮助总结经验，在全工地推广。后来，民工们又创造了“平洞式”、“竖井式”、“针插式”等多种打眼形式，使药越装越少，而爆破效果越来越好，大大提高了采石率，解决了运石小车“吃不饱”的难题。

1953年秋，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到导沭工地视察，对此作了很高评价。陪同视察的苏联水利专家也说：“伟大的中国，伟大的工程，了不起！”

其四，沿河人民为支援导沭整沂工程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上下游协作，苏鲁人民联手，像支援前线一样，要人出人，要物出物，要地给地，整个工程成了战天斗地的战场！

导沭整沂“头”在郯城（分沂入沭水道），“腰”在临沭（大官庄枢纽），然而，“尾”却落在苏北（受益地区）。反之，导沭工程既要占用临沭县的土地，又有新沭河洪水倒灌县内中小支流、漫灌良田的可能。当时有人作一幅对联比喻这种矛盾：“南巡会北巡会南北巡会，东赤金西赤金东西赤金。”巡会是导沭委驻地，属临沭县，巡会的谐音是“损坏”；赤金是江苏省赣榆县沙河北岸村庄，赤金的谐音是“吃紧”。对联的意思是说导沭占地压青，损坏了临沭县沿河两岸农田，而引来了洪水，防汛时东西两头（上下游）都要吃紧。与之同时，位处工程下段的苏北也有农田被占、村庄搬迁的难处。赣榆县沙河镇有个南靠大沙河的蒋庄，因位处新沭河道中心，必须搬迁。故土难移，加之这里土地特别肥沃（当地有“千顷良田靠沙河”之说），群众又怎么想离开呢？

但是，中国的农民是最懂理和法的，当干部做了过细的工作，让他们明白了工程的好处、而且非这样做不行的时候，他们的思想就马上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变被动为主动，变消极为积极，原来举双手反对者恨不得长四只手来拥护！

先是像蒋庄这样的下游地区群众思想通了，尔后地处上游的临沭县群众思想也通了。原因是：一者，工程方面认真落实了被占土地的青苗赔偿政策；二者，导沭委在沿河两岸又修筑了一系列治水排涝的辅助工程。排涝工程包括：在新沭河北岸修建了380米长的穿沭涵洞；

治理了高榆河；两岸开挖了牛腿沟等56条排水沟；在曹庄、陈棠、石梁河（江苏境内）等地修建大小桥涵130多座。涵洞都装有自动闸门，当新沭河行洪时，闸门自动闭合挡水，洪峰过后，涵闸又自动开启排除内涝积水，当地群众说“涵闸是双保险”。

由此他们深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激发了他们支援导沭的极大热情。每期工程开始，沿河村庄都热情欢迎民工的到来，要地有地，要房腾房，与民工相处如一家人。

人情无价，数字为证：仅临沭一县，在导沭整沂工程中，就出动民工8.5万人次，完成工日244万个；施工中，4人献出生命，400多人因工致残，施工占用土地8万亩，搬迁村庄40个，移民2.3万人。

### 三、沂沭河东调工程续写治水新篇

导沭整沂工程自1949年4月开工，至1953年12月结工，共进行10期导沭、3期整沂。先后调动当时的滨海、沂蒙、台枣、尼山、泰山、泰西6个专区37个县的114万民工参加施工（含时属山东的徐州、新海连市部分县），工程技术人员5000多人，共用劳动工日3745万个，支付以工代赈的小米1亿多公斤，完成316万石方，3900万土方。

如果把上述土石方连接起来，可绕地球一周。其主要工程除开挖新沭河和分沂入沭水道之外，还有许多辅助工程。其中，新沭河上修建的人民胜利堰（俗称翻身堰）、穿沭涵洞桥梁（4座）、涵洞（11处），都是整个工程不可缺少的部分。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导沭整沂工程竣工后发挥了巨大的水利功能，加之后来沂蒙人民在沂、沭两河上中游搞了许多水利工程（如修水库），基本上免除了沂、沭流域水患，改变了沂蒙大地的自然面貌，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发展，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

但是，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导沭整沂工程不可能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水利设施老化，也很难继续维持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于是，随着国力的增强，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提高，在导沭整沂工程基础上再搞新工程，就势在必行了。

这个后续工程就是由国家水电部批准，1971年11月动工的沂沭河东调工程，其作用是：最大限度地使沂、沭河洪水就近东调入海，腾出其下游骆马湖、新沂河部分蓄排能力，以承接四湖来水，根治淮河水系水患。

“东调南下”的沂沭河洪水东调工程，是治淮的重点项目之一，自1971至1995年，进行了14期。它是继导沭整沂后，进一步治理沂沭河的大型水利工程。项目包括沂沭河扩大、分沂入沭扩大和调尾、刘家道口枢纽、大官庄枢纽、沂沭河护堤覆险、支流排水、灌溉发电和附属工程等8项。整个工程气势宏伟、任务艰巨、技术复杂、战线长、时间久，又是在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文革”时期上马，所以困难重重。

但它建成后的效益将远远大于对它的投入。比如将沂、沭河“腰斩”（腰斩点分别在刘家道口枢纽和大官庄枢纽），迫使沂、沭河竖水横流，北来东去，可以形成一个灵活机动的水利控制网，如果再遇1957年那样的特大洪水（沂河流量达15400立方米/秒），它可以东调63亿立方米洪水，由新沭河入海，如此水量占沂、沭河洪水总量的87%；可为鲁南、鲁西南、苏北、皖东北洪水打开出路，减轻3000万亩农田的洪涝灾害；另外，经控制东去南下的水流，还可为上述地区城区供水、用电、航运、旅游提供条件。

沂沭河东调的三项主要工程是：

（一）分沂入沭扩大工程：水道原长20.24公里不变，但过水量扩大了，按4000立方米/秒设计，5000立方米/校核。做法是将原水道扩宽加深，结合筑堤，河底宽200—210米，加深1—2米。在朱村以下开始调尾至沭河大官庄枢纽人民胜利堰以上入沭河。

（二）新沭河扩大工程：自大官庄至石梁河水库共长21公里。过水流量按6000立方米/秒设计，7000立方米/校核。为上下两段，上段自大官庄至陈棠桥，长6.4公里，为引河段，将



市水利局工程人员在治淮工地

原有河道由深14米加深到17米，河底拓宽至90—120米；下段由陈棠桥至江苏省石梁河水库，主要是移民排围，将校核水位以下村庄搬迁。另有7处护岸，4座桥梁工程。

（三）大官庄枢纽：该枢纽包括新沭河泄洪闸、人民胜利堰节制闸、灌溉引水闸和拦河坝等多项工程。

#### 1、新沭河泄洪闸

位于新沭河口，作用是控制“老”沭河水量，泄洪于新沭河。该闸为钢筋混凝土梁板结构，于1974年春动工兴建，1975年建成。闸身长241.5米；18孔，孔宽12米；闸门高9.5米，为钢结构弧形，由18组2×2.5米号卷扬机对孔启闭，设计流量为6000立方米/秒，实验流量达7000立方米/秒。闸上机架桥、检修所、交通桥上下融为一体，以闸代桥。交通桥宽7.2米，高13.4米，承载量为汽15吨，挂80吨。因此，这座闸下能泄洪，上能跑车。从远处望去，整个闸身雄伟壮观。桥两端且附有公园式景点，供游人驻足观赏。

#### 2、人民胜利堰节制闸

人民胜利堰为导沭工程建筑，其作用在前文已有介绍。1991年，全国性的洪患为有关方面敲响了警钟。同年，国务院召开治淮治太（湖）会议，决定再次实施80年代初停建的沂、沭、泗洪水东调南下工程。根据会议精神，1993年11月，大官庄枢纽工程的重点项目——人民胜利堰节制闸动工兴建，它的功能是：取代胜利堰，控制从沂河东调而来和沭河北来的两段水流，让它们按人们的意志东去南下。

节制闸于1995年9月26日竣工，国家水电部钱正英部长于同年12月为大闸命名题字。该闸东西走向，坐落于人民胜利堰东端，与南北走向的新沭河泄洪闸相距仅1公里，一东一西，隔水相望，双闸映波，风光无限。该闸长181.5米；底宽93.6米；8孔，孔宽10米；高12.2米；设计流量2500立方米/秒，实际流量3000立方米/秒。和新沭河泄洪闸一样，闸面为交通桥，可通行车辆。

人民胜利堰节制闸和它的配套工程引洪闸等完成之后，保证了沂沭河洪水东调的成功。1997年8月19日，沂河洪峰达6700立方米/秒，按准委紧急指示，将沂河洪水分1000立方米/秒于分沂入沭水道，由节制闸分洪南下。洪峰来时，新建的调水拦河坝在洪峰中巍然屹立。此后，1998年汛期又两次进行分洪，最大分洪量接近2000立方米/秒。

大官庄枢纽除分洪作用外，距节制闸东百米处的引水闸，穿过胜利堰涵洞水道，常年向下游放水，灌溉农田。

综上所述，大官庄枢纽作为沂沭河东调的关键工程，不但外观壮丽，而且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强大。它保证东调南下整个工程发挥最大的水利效益；而东调南下工程作为导沭整沂工程的后续，又为扩大治淮成果，为新中国水利事业的成就增添了一笔辉煌的记录！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古声古韵 雅正婉丽

——“郟马五大调”声腔源流、艺术特色初探之三

张铁民

## 古郟大地孕育的艺术瑰宝

“郟马五大调”的历史传统，已经比较清楚：源于宋元时的南北散曲，明清俗曲是孕育它的母体。但它究竟是郟城、马头土生土长的艺术品种，还是传自四方的唱曲样式，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始于清代的扬州、灌县；有人说源于清朝商城地区。也有人说是明朝从云、贵等地传来。清代末年，郟城县高峰头村有一位名叫王宗贤的道士，曾撰文称：“……大凡腔调，昆、乱、皮黄、梆、柳、小曲，皆有发源之地。‘淮调’之歌，源出于淮安府，移植北方，据吾所知，已二百余载矣。”

在没有找到明晰的文字记载之前，口碑当是重要的证据，所以宁可相信上述说法，空穴来风，并非虚妄；王宗贤道人遗文所述“源出于淮安府，移植北方”也必言出有据。但经多年研究、考证，我们判断“郟马五大调”并不是源自一时一地，还是认定为“传自四方，本土生根，精彩绽放”，是相互交流、浸润的产物，更为接近事实，更为科学。



老艺人演奏“郟马五大调”

拿那些和“郟马五大调”有相同源头，即都是由明清俗曲发展而来的“牌子曲”，如扬州清曲、南阳大调曲子、湖北小曲、四川清音、广西文场、北京时调小曲、单弦等，相互对比、考察，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都有着一定的亲缘关系。比如：曲调都婉转柔润，优美动听。许多常用曲牌〔满江红〕、〔寄生草〕、〔银纽丝〕、〔马头调〕、〔叠断桥〕、〔小郎调（郎儿调）〕等，或者相同，或者大同小异。唱腔结构都分为单曲和套曲两种样式。演唱方式，都追求雅正平和，不激不厉。伴奏乐器品种都有弦索、箫管、碟盏，几乎完全一样。曲目的内容大多反映男女情爱和新兴市民阶层向往自由、追求幸福的愿望，还时有揭露时弊、劝善贬恶之作，充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所有这些，都无可辩驳地证明，它们是由一个共同的母体“明清俗曲”派生出来的。自然，差异也是有的，甚至有曲牌、曲目同名，唱腔和内容截然不同的现象存在。这是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艺术的自身特点，和它所独有的传播方式决定的。由王文章主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10月第一版）在第二章第四节，论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点流变性时，这样论断：通常而言，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通过复制就可以获得，依据图纸和建造方案进行复制就可以了。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是一种活态流变，是继承与变异、一致与差异的辩证结合。在它的传播过程中，常常与当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特色相互融合，从而呈现出继承和发展并存的状态。但应该看到，虽然有变化和发展，但仍存在基本的一致性，如果完全不同，也就失去了其特质。

现在的问题是，牌子曲这种唱曲样式，究竟是怎样传播、交流、浸润到郟城、马头来的？这当然应该与郟马一带的交通、经济、文化的状况，有密切的关联。

马头镇居于临郟苍平原的中心地带，濒临鲁南黄金水道沂河南岸，是鲁南苏北著名经济文化重镇。汉代就有先民在此生活，唐代已经是一处较大的聚落。宋元以来，日益发展，至明清时期已成为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人口众多的商贸文化中心。依仗沂河水运之便，大型帆船南行数十里，经邳州即可进入京杭大运河。由是北上京津，南下苏浙八闽，甚或可以凭借海运，直帆南洋吕宋诸岛。“马头”之名，就是因为既有舟楫之利，又商业繁盛得来的。清康乾盛世，马头进入发展的高峰，沂河岸边帆樯林立，镇内商号店铺鳞次栉比，南北方各省的晋商、豫商、徽商、冀商等众多商贾纷至沓来，并建有“山西会馆”、“河南会馆”、“安徽会馆”等馆舍多处，其中以康熙年间18家晋商集资兴建的关帝庙（即会馆），规模最为巨大宏伟。会馆的兴建，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马头镇商贸经济的繁荣兴盛。清代诗人兼书画家彭孙贻（1615—1673年）在他记录1668年郟城大地震的《客舍偶闻》一书中，曾写道：“马头集为通商办课所在，商贾杂处，房屋尽塌，压死男妇千余。”足证清康熙时，马头已是商业繁荣，人口众多的商贸重地。

正是这便利的水运交通条件，促成了众多的外地商人、船工、江湖艺人，把“扬州清曲（旧称小唱）”、“南阳曲子（现称大调曲子）”之类的唱曲，从江淮、南阳等地带到了郟城马头这方经济、文化的沃土。而且一经落地，就得到了各方人士的喜爱，开始生根、发芽，并开出了绚丽的花朵。由是，〔淮调〕、〔满江红〕等五大官调，得以唱响古郟大地，并迅速地向外传播。

古老历史文化的浸润，民间艺术的营养，特别是大批文人雅士的加入，使得“五大调”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在郟马这方土地上产生了变异，呈现出新的面貌，并结出了硕果。其中尤以〔淮调〕最为引人注目。〔淮调〕进入郟、马之后，清贫文人对它情有独钟，为它填制了大量新词。其中以郟城“八大才子”中的张保信（清贡生）、吴小寒、张佩恩（清秀才），马头镇的杨晓（清廩生）等最为踊跃。这些文人比较接近下层民众，了解普通百姓的疾苦，其部分作品能为民立言，反映他们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和对幸福生活的期望与追求，很受百姓欢迎。如《饥民难》、《柴谷仓》、《节妇自叹》、《戒赌博》、《集戏名》、《孔明赞》、《贬肉头》以及杨晓创作的《家住在罗俊庄》、《玉石琵琶粉墙挂》等作品，



在社会上就非常流行。后来唱曲结构也有了变化和创新，出现了“把字句”。“带把儿”的马头调容量增大，能够负载更为长大的故事，表现更为复杂的情感，演唱也富于变化和机趣，因此不胫而走，并且有了一个崭新的名字〔马头调〕。这也是大型唱曲山东派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从此，马头调〔淮调〕就以一种崭新的面貌，走出古郯大地，传播四方。李斗在它的《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虹桥录”下一节里，有这样的记载：“近来群尚《满江红》、《湘江浪》皆本调也。其京舵子、七字调、马头调、南京调之类，传自四方，间以效之，而鲁斤燕削，迁地不能为良矣。”

虽然担心外地传来的曲子，水土不服，难以保持原汁原味，却从侧面证实了〔马头调〕已经反向传播到江淮扬州、苏州等地方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介绍马头调说：“清初至道光年间流行。晚清时传唱者已少。清杨懋建《梦华琐簿》：‘京城极重马头调，游侠子弟必习之，其调以三弦为主，琵琶佐之。’一般六十三字，可加衬字，平仄通协，句式与〔寄生草〕略同，故〔寄生草〕可翻〔马头调〕唱之。嘉庆年间盛行‘马头调带把’，即每句带一四字句或五字句，《白雪遗音》收此较多。”〔马头调〕在全国流行后，很快发生变异，形成南北两个分支，称为〔南马头调〕、〔北马头调〕。一时，演唱〔马头调〕成为风气。

走进来落地生根，传播出去绚丽绽放。“郯马五大调”在文化交流的回环中，结出的硕果，唱响京城，传遍大江南北，永远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

# 老城夜话 (连载)

刘家骥

## 玩赃官惹恼翟文林 扎纸人激怒李占彪

封建社会民告官是有罪的。京剧《四进士》表演得最为具体，虽然告倒了贪官但是告状人宋士杰还是要判刑的。平时百姓辱骂长官当然也要治罪。但临沂古城却有一习俗，每年正月向寺庙进香时可以“玩赃官”。这种既是祭祀又是娱乐的活动是合法的。它可以让老百姓通过“玩赃官”来骂骂贪官出出气。这一活动从清朝就有了。

所谓“玩赃官”，就是由一个人扮演为神佛押送金银的贪官，这贪官头戴官帽，身穿翻毛皮袄，同行的还有两个“老婆”、几个兵丁和轿夫，押送着四辆运送金银的独轮车。演出时配上各种乐器，演员一边行走一边嬉笑怒骂贪官和他老婆出尽的丑态，把官场的贪污腐败表演得淋漓尽致。快到寺庙时贪官和他老婆还分别坐在由两人所抬号称“独龙轿”的扁担上，让老百姓对贪官的不满出出气。但是表现过头也会引来祸灾。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的春节，古城的西南隅文昌官巷的中段搭了一座彩棚，表演“玩赃官”时，演赃官的演员杨科由于在官府当过差役，对贪官的形象看得十分真切，所以他演的赃官十分逼真。首事者（导演）为了压倒其他的演出，为赃官安排了一个大老婆3个姨太太。三个姨太太皆着时装，化妆得和那些军官太太一样。演大太太的名叫黄敦和，两耳上各挂一串红辣椒，手拿芭蕉扇。演姨太太的，其中一人名纪三安，他本人就有两个姨太太，故也演得也十分出色。吹唢呐的名叫仁振东，吹得歌调十分出色。这一演出轰动一时甚是热闹。

临沂城当时有个军阀镇守使翟文林，此人在临沂作恶多端，可巧他也是四个老婆。这时就有人向其报告说这是有意侮辱镇守使。翟文林即派人前往看个究竟，结果正是如此。他当即派兵丁，将演“玩赃官”的演员全部抓来。后经人说情，才将这些演员给予了罚款并各打了20军棍。人皆私下议论：翟文林因是贪官才怕演“玩赃官”，从此在临沂留下了笑柄。

老城的西南隅有个馍馍巷，巷中住着一户财主，人称王胖子，在西乡有300亩地。此人十分吝啬，据说他下乡去割麦，为节省柴草，就买了个泥盆倒上井水让太阳晒热，中午吃饭时当开水喝。他有五个儿子，和他完全不一样，个个皆会铺张。他死后五个儿子为他出大殡，一切皆要豪华。他的五儿提出要扎上一队兵马，让老父亲在阴间好威风威风。于是请来了城隍庙街刘家的扎彩匠和他的几个徒弟。为了扎方相士（俗称“打路鬼”），还从潍坊请来了高手。本来扎一队古装的就可以了，他儿子偏要扎“现代化”的武装。于是几个高手就上街上去找样子。这时正是军阀李占彪在临沂驻防，他的部队当然是现代化的装备。高手们回来后就照着李占彪的官兵扎了一个排马队，个个骑着高头大马背着洋枪，连领章帽徽也一模一样，摆在门前甚是热闹。这时有人向李占彪打了报告。李派人察看属实，当即派人前往将纸人马打毁并将他五个儿子全部抓来，装入麻袋要活埋。说是诅咒他的部队是阴兵，今后无法

出征了。王家十分着急，连忙请人说情。李占彪开口要罚款一万大洋，最后交了3000大洋了事。王家的一场大殡就这样结束了，王家也开始败落了。

### 朱公盛酱园遭劫 华新池澡塘遇盗

临沂城过去最大的酱园当属惟一斋，然而它于抗战前就歇业了。它的技术工人都转移到另一家大的酱园——朱公盛酱园，这家酱园一直延续到上世纪50年代的公私合营时期。朱公盛酱园创自清末，至解放前后其主人为朱克贤，抗战前店址在南关粮食巷，日伪时迁至南关西园。这里既有店面门市部，又连着作坊，同时还有生产酱菜的菜园，至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达全盛。朱家经营酱园有方，也十分爱国，他们的子弟多数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朱克贤本人亦多次向民主政府捐款。抗战胜利后，政府安排他担任了商会会长。好景不长，1947年2月国民党军占领了临沂城，朱公盛酱园遭到了灭顶之灾。朱克贤的开明和进步受到了惯匪司令王洪九的仇视，他带“还乡团”到达临沂后马上向朱公盛酱园开刀。他派了一个连开往酱园，将酱园的成品全部抢光，然后将酱园夷为平地。朱克贤逃往南京，女儿等人

逃到天主教堂躲藏才幸免于难。这一事件震惊了整个工商业界，直到1948年10月临沂二次解放后，朱公盛酱园在人民政府支持下才重新振兴。

过去临沂城最大的澡塘是在今沂州路的中段、井神楼北侧的“华新池”。这座澡塘建于清末民初，大匾“华新池”三字为清末翰林庄陔兰所书。1945年解放后，陈毅、罗炳辉等领导也经常在该澡塘洗澡。1947年国民党军队占领临沂，来临沂的是八十三师的一个兵匪混合的部队。师长李天霞在抗战胜利后改编了部分伪军，招安了一批土匪，所以说是兵匪混合的队伍。它的番号有“霞流”、“涪陵”、“巴中”等，皆是以四川地方命名的。这些匪兵四处抢夺老百姓的财物，拐卖妇女儿童，强奸妇女，打骂百姓，在临沂做尽了坏事。这年的3月，一帮匪徒到华新池洗澡，一个匪军头目将自己的一个金牌让一匪兵事先带走，然后声称澡塘内有贼偷了他的金牌，还殴打了一个店员。澡塘经理没办法，只好答应赔了他一两黄金了事。八十三师是贼兵从此在临沂传开了。



老澡塘旧景

### 一贯道一贯害人 黑帮头黑心投敌

邪教祸国殃民古今皆然，反动道会门一贯道即是一例。一贯道起源于济宁，抗战前本是一个迷信组织，后来发展成为收敛钱财、秘密结社的邪教。临沂城有一个地名——道门首，它既不是大街也不是小巷，只是一个俗称。它位于今兰山路八小集巷口向西百米处，明朝时这里曾经是“兵河道衙门”的驻地，它的全称是“兖东兵河道署”，道门首由此得名。康熙七年震毁后，只剩下了一个地名。这道门首的路南有一处宅院是邪教一贯道的住地。日伪时

一贯道投靠日寇成为日寇的鹰犬，在这道门首设下了坛场。它的头目称“点传师”，在汉奸特务、地痞、流氓、地主姨太太中发展了一批道徒，他们经常去农村刺探情报配合日寇扫荡。1945年日寇投降后这帮邪教头目逃走。1947年随着国民党军队又回到了临沂，因曾投靠日寇名声不好，于是改了个名字叫“崇华堂”，还在原址活动。但是好景不长，1948年10月临沂第二次解放后，这帮邪教头目又从事破坏活动。在全国取缔了反动道会门组织后，临沂的一贯道也就从此消失了。

帮会组织在临沂历史上只有青帮而无洪帮，青帮的全称是“安清道义会”。他们的会众又分水码头和旱码头，临沂只有旱码头。民国初年，临沂的青帮曾遭到官府的一次镇压，到抗战前才又恢复起来。临沂城塘子巷西路南有一处公寓“普益里”，设有青帮的山堂，俗称公所。青帮的辈数分为：园明心理大通悟学……当时的头目名万教传，道号多宝道人，志善堂当家，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辈分比较高，收的徒弟甚多，其社会成分十分复杂。抗战开始后，他的徒众大分化，有的参加了抗日队伍，有的当了汉奸，还有一部分当了土匪。日寇进城后万教传就投靠日伪，大汉奸齐华亭、特务头子刘伯符等皆是他的徒弟，日伪通过他的关系将城外的土匪招安来当了汉奸。土匪司令王洪九虽不是他山堂的徒弟（王洪九的师傅是杨瞎子），但也和他有勾结。1943年普益里被日军占用，他的山堂迁到了城西北隅协台后巷的西端路南。好景不长，眼看日寇节节败退，这个老奸巨猾的青帮头子还未等到日本投降，就借口访友跑到东北投靠了他当胡子的徒弟去了。临沂青帮逐渐瓦解，依附于它的小偷、流氓、土匪等也被消灭了，从此青帮成了一个历史的名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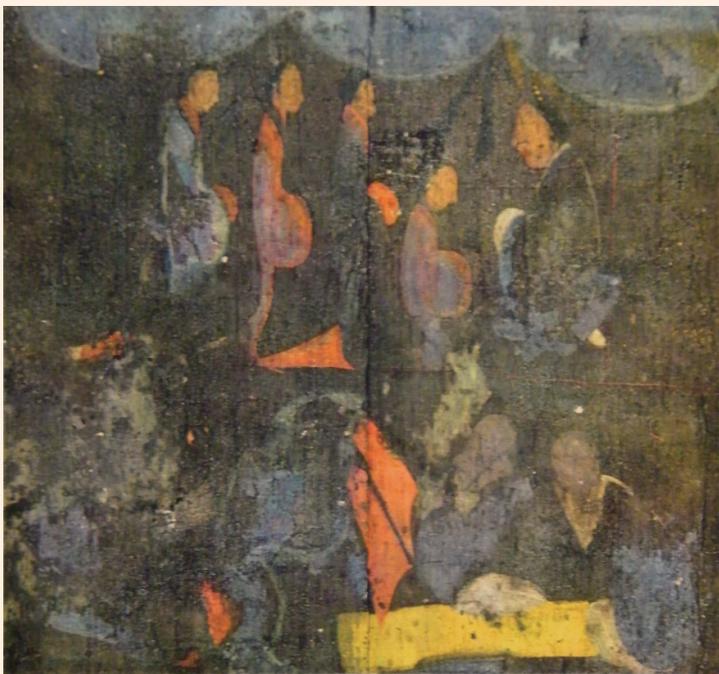
### 羊蹄山出土汉阙 东更道发现古墓

临沂城在金代始建土城，称“新城厢”，明代改建砖城。城内还发现了汉墓，如：东城弯曾有汉画像石墓出土，北城墙根曾有汉墓出土，2003年王羲之故居内又有西晋墓出土。上世纪60年代土城内还发现了汉阙。城东北部的城隍庙后是一片芦苇，冬季水落后便现出了一片石灰岩的巨石，巨石上有几个像羊蹄子的石孔，当地人称羊蹄山。上世纪60年代时，爱好考古的孟季华先生去羊蹄山考察时发现了一堆刻有图案的石块，经仔细观察原来是一座汉石阙的构件，当即通知了文化馆。文化馆派人将石刻运至五贤祠保管，可惜的是在“文革”中这一组石刻遭到没顶之灾，被造反派砸碎了。这一发现证明古城在汉代就有石阙的建筑。

1938年日寇进犯临沂前经常来飞机轰炸，城内居民多挖防空洞躲避轰炸。原县政府的东侧有一巷名东更道，巷内路东南侧的一孟姓人家，也在院内挖了一个防空洞。为了进入方便又请工人在堂屋东间挖个通道，直通院内。当挖下一半深处发现了古砖的券顶，工人们将券顶打开了一个洞，用手电向下照看，原来是一座古墓。墓内中放置两个朱红色的大棺，主人知道后马上令人封闭，停止了开挖，当天还请工人喝了一场酒请工人保密。事后孟家便欲出卖此房，但由于还是未能保住密，被人知道后没人愿购买。孟家自己也不敢在此居住，租给一蒋姓在此开炭场卖煤炭。后来此房圈入公安局院内，县公安局建办公楼时，此房处在楼后的院正中，故此古墓依然保留地下。当然建楼时无人知道，这只有等后世来发现吧；不过它却说明了一个问题：西边的洗砚池有西晋墓，东边的公安局后又有古墓，这皆可能是金代以前的城外部分，古城的变化还有待考古者在今后的发现中进行论证。

### 银雀山汉简出土 金雀山帛画问世

西汉时的临沂城名开阳。城南有两座小山对峙，东山曰金雀山，西山曰银雀山。汉代的习俗喜在山地建墓，故这两山皆有汉代的墓群。在考古史上最为人称道的还是银雀山一、二号汉墓的发现。



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帛画(细部)



临沂金雀山九号汉墓帛画(细部)

1972年4月14日，地区卫生局在院内修建地下仓库，由城关建筑管理站施工。当挖到80厘米深处时发现了木椁顶，工人十分兴奋地声称“我们工人也考古”，但当即被工程人员孟宪隆制止。他告诉工人要保护文物，便立即到地区文物组去汇报。文物组负责人崔涛会同工作人员张鸣雪、刘心建立立即前往察看并作了请示报告，经批准后开始正式发掘清理。当时还请了图书馆的杨佃旭参加清理，电影发行公司的钟依负责拍照。打开椁盖后发现是一棺一边箱，积满了淤水，工人抽出积水后发现了不少漆器和陶器，对于发现的汉简，起初认为是竹的竹片。有人取出一枚用自来水冲洗后才发现上面有字，经大家辨认后其文曰：“齐桓公问管子曰周天下何以……”当时惊喜万分，立即采取了保护措施。晚上由文化馆长赵海峰和孟季华两人看护，第二天省里来的两位考古工作者又参加了清理，当然这已是尾声了。清理过程中又发现了二号墓，出土了一部“汉元光元年历谱”。竹简这一惊人的发现很快就在电视台和报纸上作了报道，成为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金雀山出土的重要文物是1976年5月19日在金雀山9号墓发现的西汉帛画，这是长江以北发现的唯一的一幅汉帛画，也是继湖南马王堆汉墓帛画发现后的又一个重大发现。当时请了文物出版社的张露前来拍照，故宫博物院的张耀宣和徐建华两先生前来揭取，临沂地区组织了由张寿民先生任组长的复制组，聘请了王小古、张鹤云、刘家骥、高天祥负责临摹复制。复制后将帛画原件和复制件一同送往故宫修复厂，请刘炳森、刘家骥再次复制并写出论文发表在《文物》1977年第11期上。临沂的两件西汉文物——竹简和帛画，从此便写入了中国文物史册。

# 览蒙山胜境 抒诗家情怀

——《沂蒙诗话》之七（续一）

李兴河

## 四

胡纘宗，明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进士，官至副都御史。文学家。在任山东巡抚期间，曾游览蒙山，写有诗篇《望蒙山》：

蒙山向日鲁衿喉，翠黛长连紫气浮。

铁索万年悬鸟道，石梁千仞惹猿愁。

海邦控带形非昨，谷镇兴衰事已休。

晴日卷帷时骋望，忽惊身是大东游。

这是一首七律。诗中赞美了蒙山险峻奇丽的自然风光，并寄寓了深沉的世事沧桑之感。诗的首联说，蒙山往昔是鲁国的咽喉要地，苍翠的山峦绵延连接，常弥漫浮动祥瑞的紫色光气。诗的颔联极言蒙山的险峻，古老的铁链吊桥悬挂在险绝的山道之间，山上高峻的石梁连猿也愁于攀援。读这两句诗，自然会使人联想起李白《蜀道难》中的诗句：“西当太白有鸟道”，“猿猱欲度愁攀援”。诗的颈联是说历史演变、世事兴衰，蒙山依旧在，“控带形非昨”，蒙山已不象春秋时期那样连接控制着海滨的邦国了，因为鲁国和滨海的邦国都已经不存在了，兴盛与衰落都已成为过去。言外之意是说明朝已不是诸侯割据，各霸一方，而是统一的国家了。诗的尾联说，在这晴朗的白天驱车经过蒙山，时时卷起车帷放眼远望，惊异地发现自己是在国内极东的地区进行游览了。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诗的前四句侧重写景，后四句言



事抒情，这样写，要比单纯地写景，内容更丰厚，思想更深刻，更能给人以启迪。

赵鹤龄，明成化十一年（公元1475年）进士，在任山东按察司副使期间，曾游览蒙山，写下诗篇《过蒙阴题紫荆关》：

朔风吹马过东蒙，极目遥看倚碧空。  
翠黛青螺霜雪蔽，层峦叠嶂雾烟笼。  
昔分季氏三家内，今在皇舆一统中。  
寄语山灵司孕毓，多钟人杰应昌隆。

蒙山有四大险关，自西而东，依次为白马关、九女关、紫荆关、黄草关，其中紫荆关尤为险要。驻足关口，西望蒙山主峰龟蒙顶及云蒙峰等，东望望海楼、玉皇顶等，群峰竞秀，大气磅礴。这首诗正是写的诗人驻马紫荆关时的所见所感。诗的首联，说诗人冒着寒冷的北风骑马经过蒙山雄关，极目遥望，只见蒙山奇峰巍峨高倚碧空，这是远望山的气势。诗的颌联，说高耸的翠峰为皑皑霜雪所覆盖，重叠的山峦为雾霭烟岚所笼罩，这是细写蒙山之高峻。这两句诗，可谓“诗中有画”，写出了蒙山的朦胧之美。诗的颈联，写蒙山的历史沧桑，昔年蒙山曾分属鲁国季氏三家的封地，如今都在国家统一的版图之中了。诗的尾联，写诗人过东蒙的所感，观赏蒙山如画的美景，沉思蒙山的沧桑变化，一种美好的意愿便在诗人心中油然而生：传语给蒙山之神灵，有这样美好的环境，应当养育产生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既是诗人对蒙山之灵的寄语，自然也寄托了诗人美的理想。这首诗的立意是高的，意境是美的。先写景，再写情，情由景生，景中有情，情景交融，耐人寻味。

王世贞，明嘉靖二十六年（公元1547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文学家、诗人。任山东副政使时曾到蒙山游览，写有《玉虚观》：

霞矗黄金界，虹飞白玉桥。帝居开显赫，天路入岧峣。  
薛网云常挂，松珠露不消。步将尘世隔，境许俗心调。  
圣水流仍暖，仙衣静自摇。可知笙鹤度，特地引王乔。

玉虚观是蒙山著名的道观，始建于唐代，盛时道众达300余人。这首诗写的就是作者游览玉虚观时的所见所感。诗的前六句为第一层，是写玉虚观得天独厚的优美环境。先写仙界飘动的红霞和凌空飞架的虹桥，接着写道观显赫的神殿和高绝入云的天路，再写道观周围薛萝挂云、松叶凝露的清幽景象。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写步入仙观神殿的感悟。一步入仙观，就感到似与尘世隔绝，这圣洁的仙境可以洗净世俗之心，聆听流动的泉水感到融融暖意，静观神像的仙衣似觉微微摇动，看到殿壁上彩绘的翩翩仙鹤，便想到这是特地为带引王乔升仙的。王乔，即王子乔，古代传说中的仙人。东晋孙绰在《游天台山赋》中说：“王乔控鹤以冲天”。诗人选择圣水流暖、神衣飘动、仙鹤飞翔等有特色的事物，烘托出一种庄严、圣洁、静穆的气氛，给人一种出尘入化之感，同时，也表达了诗人在特殊环境中所产生的的特殊感情。

贝公远，浙江上虞县人，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任沂州同知。1371年中秋时节，乘休暇之日，登览蒙山，寻访道人，写下《游蒙山道官》：

佐沂经两载，佳游违赏心。斯晨稍休暇，整驾一登临。  
是时秋正中，原野气萧森。远峰明霄汉，回溪漱玉音。  
梨枣垂佳实，松柏散繁阴。缥缈神仙居，绀碧出乔林。  
道人恒宴坐，何由尘迹侵？我来良未久，潇洒散烦襟。  
此山表东鲁，仰止日已深。安得随真性，于此脱朝簪。  
前旌返城市，归路独沉吟。

这是一首五言古体诗。主要写了作者游览蒙山的所见所感，诗的内容可分为四层。前四句为第一层，是写出游蒙山的缘由。作者供职沂州已两载，蒙山是管理区域内的名山，乘休暇一登览，自在情理之中。“是时秋正中”以下六句为第二层，是写中秋游览蒙山所见之景：天朗气清，旷野萧森，远峰倚空，明丽可见，回溪潺湲，漱玉有声，梨枣硕硕，松柏阴郁。这段

写景很美，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高有低，梨枣的黄红与松柏的苍翠，构成蒙山五彩斑斓的秋色。“缥缈神仙居”以下六句为第三层，是写隐隐约约的道官黑里透红的颜色浮现在高高的林表，道人安闲地久坐潜心修炼，不受世尘的侵染。自己来的时间则很短，只是散散烦闷的襟怀。“此山表东鲁”以下六句为第四层，是写作者游蒙山的感悟，对蒙山仰止已久，很想脱去朝簪，任随真性。正如唐释然所言：“真性怜高鹤，无名羨野山”。全诗用语平淡质朴，写景宛然如画，言情坦率诚挚，读之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 五

蒙山钟灵毓秀，人才辈出。有明一代，蒙山麓区考中进士者，就有二三十人。有兄弟进士，有三代进士，有五世进士。这些人才，具有沂蒙人的传统美德，大都为官清廉，颇有政声，诗词创作，多有佳篇。

王雅量，费县人。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光禄寺卿等。为官廉洁自律、刚正不阿。晚年回归故里，致力研究学问。游览蒙山，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篇，《登蒙山绝巔》就是其中的一首：

大观擅东鲁，一径薄天门。绝顶红轮耀，中腰白雾昏。

泰山堪伯仲，诸阜尽儿孙。不受秦封辱，老莱遗迹存。

这首五言律诗，生动地描写了蒙山拔地倚天的高峻气势和奇丽壮观的自然景色，同时赞美了蒙山“不受秦封辱”的高洁品格和不慕名利、隐居蒙山的前贤老莱子。诗的首联，是写蒙山横亘东鲁、一径逼天的高大险峻气势。诗的颔联，是写一轮朝日红光熠熠在蒙山绝巔，乳白色的晨雾弥漫缭绕在蒙山半腰。这两句诗，勾画出一幅奇丽壮观的《蒙山日出图》。诗的颈联，是说只有泰山与蒙山堪称伯仲，东鲁其他的山尽是它的子孙辈。诗的尾联，转而述事写人，是说泰山受到秦封，而蒙山却“不受秦封辱”，这与老莱子不应楚王征用一样清高，山品与人品相映衬，内美与外美共生辉，更显出蒙山的圣洁。作者赞美蒙山，赞美前贤，自然也寄寓着自己为人的品格。诗贵含蓄。好的诗能使人产生无穷的回味。应当说这首诗收到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

李柰，蒙阴人。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进士。历任南京监察御史，陕西布政司左参议。为官刚正，不避权要，尤恶贪暴，有“铁板李御史”之誉。在官数年，治民无冤狱，人称“李佛”。善书法，工诗文。著有《春秋管窥》。晚年辞官家居时，悠游蒙山山水，写有《山中春霁》：

静卜林泉深处居，乾坤清气蔼吾庐。半窗宿雾仍栖竹，一亩浓烟自种蔬。

远浦水从天外落，乱峰云散雨晴初。春光自老风烟色，松影横斜午梦余。

这首诗通过对山中春雨初晴的景色描写，表达了作者归里山居的闲情逸致和对幽栖生活的满足。全诗围绕诗的立意，精心选取了最有特色的景物，有幽深的林泉，松下的庐舍，清新的空气，竹林的宿雾，园圃的岚烟，云崖的瀑布，奇峰的流云，阳春的烟景，横斜的松影，等等，这些景物和谐地营造了一种春意盎然、充满生机、自然恬静的境界。这种美的境界，又是作者午梦初醒后所看到所感到的，自然也是作者梦寐以求的。诗中看似句句写景，实则景中蕴情，情景交融。

李炯然，李柰长子。明天顺元年（公元1457年）进士。初授户部主事，后迁户部郎中。奉命到江北赈济灾民，劳瘁成疾，卒于徐州。囊无余物，惟遗七律一首，诗中写道：“死生有命吾何恨，俯仰无惭世漫怜。寄与故园诸子弟，好将清白继家传。”死后，安徽凤阳一带民众，感其恩惠，钦其清标，为之立祠。家居期间，写有《蒙山仙洞》：

仙人飞去向蓬山，洞府无人敞不关。丹灶尚余松焰黑，石床惟有藓苔斑。

月明绿树猿空啸，日暝青山鹤自还。何日得捐冠冕系，此身来伴白云闲。



蒙山仙洞位于蒙阴山顶上，是蒙山的一大景观。洞广可容百余人，据传汉承官曾在此隐居。诗家多有吟咏。这首诗的前四句，写蒙山仙洞是仙人飞升的洞天福地，仙去洞空，遗迹犹存，令人神往。这样写颇有唐人崔颢诗句“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的意味。诗的五、六句，写仙洞周围的景物，月明、树绿、猿啼、日暮、山青、鹤飞，有声有色，有动有静，清幽神妙。这里正是昔日仙人修炼的仙境。仙人飞升的美丽传说让人心醉魂迷，仙境般的洞天美景让人流连忘返。诗的七、八句，写作者置身仙境所产生的不愿继续为官，很想只身来此隐居的思想感情。全诗把自然景观与神话传说巧妙地融为一体，形成完美的意境，自然给人以美感。

李梦龙，李炯然长子。明弘治六年（公元1493年）进士。官至陕西按察副使、甘肃兵备道。时河北大饥，他奉命前往赈济，及时将赈粮发放至饥民手中，民众无不称道。著有《云松集》。居家时游蒙山，吟成《雨中望蒙山有感》：

卧看阴晴顷刻分，荒村落水隔窗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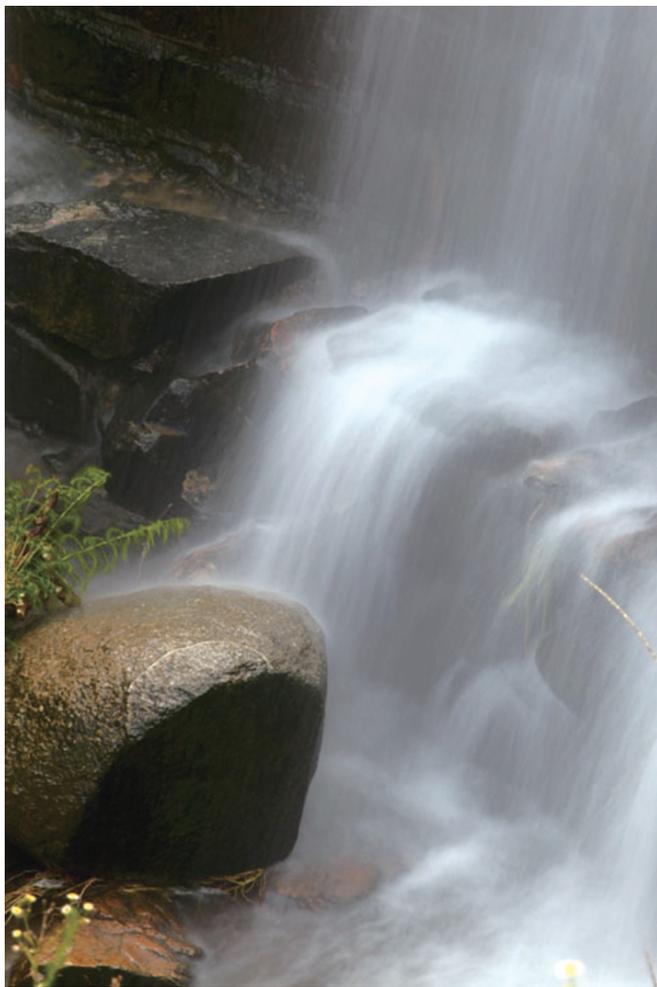
天昏野树千家雨，泉响空山万壑云。

可怜谷口三春老，肯录河阳半策勋。

得句无人能会意，清新不让鲍参军。

这是一首七律。主要写作者雨中望蒙山所见的迷人景色及欢悦心情。诗的首联，写作者静卧山村，看到山中天气倏忽由晴转阴，继而隔窗听到淅淅沥沥的雨声。诗的颔联，写从荒村眺望蒙山所见的雨景：天昏野树，雨落千家，泉响空山，云漫万壑。“天昏野树千家雨，泉响空山万壑云”两句，对仗工整，形象生动，有声有色，颇为传神。诗的颈联，不再写烟雨，而调转笔锋，特写蒙山谷口的可爱春色。谷口的可爱春色是什么呢？是一片绚丽夺目的桃花。当山外大地春归，芳菲落尽之时，山中却桃花盛开，明丽灿烂，这样的景色，自然可爱，自然能使人感到兴奋。读这两句诗，也会使人联想到白居易的诗句“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也许作者为避免与白居易的诗句重复，故而在“肯录”句用典。史称西晋潘岳为何阳宰时，在河阳遍种桃花。这里即以“河阳”代指桃花。因桃花装点了蒙山谷口的春色，所以愿意给它记上一纸功劳。此句写景用典，似显艰涩，有隔膜之感。颔联中所写的茫茫烟雨与颈联中所写的灼灼桃花，构成了一幅春意盎然、充满生机的画面，自然能激发人的诗情。诗的尾联，正是写作者触景生情，思得美妙的诗句，尽管无人能领悟诗中的真正意趣，但作者认为诗的清新俊逸堪与鲍照的诗句相媲美。在尾联中，作者化用了前人的诗句，一是陆

游的诗句：“得句已无前辈赏，开编时与古人游。”一是杜甫的诗句：“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化用得妙，意从己出，效果自然是好的。这首诗是写作者在蒙山寺中观赏雨中的奇妙景色。诗的首联，写山雨骤来，茫茫烟雨笼罩着崖谷。诗的颔联，写山路石级上流水湍急，到处都听到飞溅的泉声。这两句诗，颇有唐王维诗句“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的韵致。诗的颈联，写树梢摇动着深翠的枝叶，呼呼的风声从高天吹来。诗的尾联，写观赏这山雨中的美好景色，仿佛有与世隔绝之感。陶醉山中美景的心情自然流露出来。



# 孝悌临沂

——《二十四孝》探源之三

大荒堂主



## （三）鹿乳奉亲

《二十四孝》中第五人记载的是郯子。名为“鹿乳奉亲”。有两种版本，今选取之一。“周郯子，性至孝。父母年老，俱患双眼，思食鹿乳。郯子顺承亲意，乃衣鹿皮，去深山，入鹿群之中，取鹿乳以供亲。猎者见欲射之，郯子具以情告，乃免。”

老亲思鹿乳，身挂鹿毛衣；  
若不高声语，山中带箭归。

故事说：东周的时候，郯国国君以孝治国，被世人所称道。郯子的父母年纪大了，患了眼疾，需要用鹿乳治疗。他认为义不容辞，自己披鹿皮进入深山，混进鹿群中，挤取鹿乳来侍奉双亲。一次进山时，恰巧被猎人碰到当作了猎物，郯子不得不脱下鹿皮，急忙现身，并将自己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猎人，让人佩服。

郯，春秋国名，据昭公十七年传，为少昊（黄帝后裔）之后，一说为己姓之国；然而《史记·秦本纪赞》说：“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意思是郯出于少昊之后伯益。《汉书·地理志》谓为“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当以《汉书》为准。《史记·楚世家》顷襄王十八年记载有郯国，说明郯国至战国犹存。秦汉实行郡县制，郯设县，隶属东海郡，此后至今未发生大的变化，即今天的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

郯子有着很高的素养，在《春秋左传·昭公十七年》中有着这样的记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昊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



昊摯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郟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官学在四夷’，犹信。”

公元前525年（鲁昭公十七年），郟子朝见鲁昭公。在欢迎宴会上，鲁国大夫昭子问郟子说：“少昊的时代，以鸟名命名官员是什么原因呢？”郟子说：“因为少昊是我的祖先，所以我有所了解，在少昊被遵为首领的时候，高尚的品行感动了天地，有凤鸟来临，作为祥瑞，用鸟名来命名官职来纪述这件事情。自颛顼以来，“德不能致远瑞，而以民事命官。”孔子听到了这番议论，向郟子登门求教，回来后告诉他的门人说：“我过去听说，天子那里失去了古代官制，相关学问还保存在远方的小国。”

从这一段话可知，郟子自称神话人物少昊的后裔；郟国是一个由以摯（鸷）鸟为主，以众鸟为百官组成的鸟图腾崇拜的诸侯国。《春秋》之例，当时所谓夷狄之国，皆以“子”称，故它又是生活在中国东部沿海一带东夷集团中的一个小国。

二十四孝中叙说的故事有多少可信度呢？从故事的背景看，《诗经·小雅·鹿鸣》之中有“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诗句。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自然环境。到了三国时，曹魏有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为民请命时指出：“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说明那个时候鹿在中原地区相当常见。对于鹿乳的作用，没有找到确切资料，而同时成书于魏晋时期的《名医别录》中指出，人乳汁“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疗目赤痛多泪”。可以成为故事的佐证。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睽颂》，传说为曹植所作。睽子当为郟子的原型。《睽颂》讲述了睽子的本生故事，所谓本生故事是利用佛教的说唱形式，寓意着忠孝仁义的民间寓言故事。

现存文献中，首见引睽子故事入孝行的是成书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61、62“忠孝篇·睽子部”。至于它进入我国二十四孝之列，应在晚唐五代之后。

今郟城县存有郟子庙与郟子墓，供后人凭吊。

# 一束玫瑰一支歌

——品味陈彦林

刘凤才

人是欲望的产物，生命是欲望的延续。古之大典《礼记》云：人之“六欲”，“生死耳目口鼻”。《吕氏春秋》又云：“所谓全生，六欲皆得其宜者。”若缺失一欲，人生便少了一份欢悦滋味，多了一份痛苦折磨，不能谓之“全生”，只能称作“残生”，人生将“残”不忍“度”。

陈彦林，市人民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中国红基会“天使回声基金会”专家组评委，省、市各有关专委会的委员、副主任或主任。人生“六欲”，其司耳、鼻、口“三欲”，足见行当之重。其虽年逾天命，犹如俊逸小生，可谓学者中的帅哥，帅哥中的学者。他让无数被病魔扼杀了人生欲望的患者，重新或首次品味到了生活的美好滋味：嗅到了玫瑰的芬芳，听到了歌声的妙曼，咀嚼着生命的甜蜜。当笔者对他欲加品评时，不由信手拈来两句骈文：

他让人们品味一束玫瑰一支歌；  
品味他，亦如一束玫瑰一支歌。

## 送人一束玫瑰

1993年、1997年，陈彦林两度受命参加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该国对耳鼻喉科医生尤其敬仰，专业要求特高。一个正规医学院的毕业生，先要轮换其他各行当，再经耳鼻喉科专门考试，才能取得临床资格。全国不过十几个耳鼻喉大夫，何况陈彦



林是来自中国的专家。

一天，医疗队来了一位20多岁的黑人青年，形象骇人：鼻子不翼而飞，面颊上只有两只一线鼻孔呼吸着丑陋的痛苦。中国人把“关门挤了鼻子”比喻为凑巧加倒霉，这小伙子的巧合更是恐怖而残忍：砍柴时，他把锋利的柴刀信手挂在高高的树枝上，悠然自得地坐在树下小憩。不料，眼前寒光一闪，柴刀从天而降，活生生把鼻子一削而去。数年来，这非但让他遭受了极大的生理痛苦，仅男人们见到他后无不表现出的异样目光，姑娘们见到他后无不退避三舍，就把他折磨得痛不欲生。此番，他是专门前来求中国医疗队的陈神医给他“安”鼻子的。这给陈彦林出了一道大难题：当地根本没有做鼻子整形术的条件，何况他也从未做过此类手术。然而经不住小伙子苦苦哀求，只得硬着头皮答应下来。这是代表“China”的承诺。陈彦林用极大精力，查阅了大量资料，最后确定了一个独创的“陈氏方案”：先把患者额头上的一块皮瓣带蒂切下，垂到鼻子位置，做成两侧鼻翼，再用其腿上的皮瓣修补其额头，一个月后再对鼻子“断蒂”。一切如期进行。当小伙子终于在镜子中看见一个“中国陈氏制造”的完美鼻子在自己的面颊上光鲜挺立时，喜出望外，激动分他，迭不停声地向陈彦林“阿桑太洒那”（谢谢）。

有了陈彦林送给他的这束“玫瑰”，小伙子终于找到了如意情侣，娶妻生子，幸福完美。当陈彦林二次援坦时，小伙子还专程到医疗队向他致谢。

送人幸福玫瑰，甘愿自我受累。坦国医疗条件差，有时基本条件都不具备。一次，他为一名鼻癌患者做手术。鼻腔切开，血流如注，医院竟无血可输，只得用纱布止血，不料连纱布也不够用。情急之中，他只好命令助手把用过的纱布随时拧干、反复使用，总算化险为夷。另一位咽喉部巨大肿瘤患者，已经面临随时窒息死亡的危险。陈彦林不但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成功地为他进行了手术，而且手把手地教护士们精心进行护理，终于把患者从死亡边缘上挽救了回来。《人民日报》海外版专门对陈彦林的事迹作了报道。

做口腔手术都是面对面、近距离。坦国为艾滋病高发区。为防止传染，每次手术时，陈彦林不得不穿上两层隔离衣，戴上野外作业用的防风眼镜，一台手术下来，汗流浹背，几欲窒息。医疗队人手紧，他自告奋勇，担任了业余驾驶，出诊急救，购粮买菜，迎来送往，不辞辛劳，从不言累。白天工作再累，夜晚他仍然坚持自我“充电”，总结医案，撰写论文，其中两篇分别发现在《坦桑尼亚医学杂志》与《东非医学杂志》上，让世界同仁们认识了中国专家的学习精神与真知灼见。

陈彦林，用自己的妙手与汗水，为人们献上了一束束玫瑰，让世界充满了芬芳。

## 送人一支歌

歌声是人类命运的回响，情欲的风铃。听不到大千世界的旋律，不能抒发自己心曲，肯定是人之欲望大悲。

2009年5月29日晚7时，市人民会堂。齐鲁电视台《天下无双》栏目与临沂市联合举办的“天使回声”大型义演，名角云集，一片欢乐。舞台大屏幕上，播放着一段即时录像：著名歌星姜玉恒，陪着当地一名先天失聪的女孩进了手术室，他一个满怀深切期冀的“再回首”，手术室的门轻轻地关上——此时，市人民医院耳鼻喉手术室中，陈彦林与助手们正在紧张有序地为女孩实行人工耳蜗植入术。人民会堂中，所有人都满怀着希望，等待着消息。而此时的陈彦林，正肩负着极大压力。若在平时，做此种手术他是驾轻就熟，但现在无异于现场直播。这等于给他下了军令状：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万一植入装置不工作，或者出现面神经瘫痪，导致手术失败，可就砸了这台万人瞩目的晚会的场子。他不敢稍有懈怠，每一根神经都崩得紧如满弓。一个多小时后，主持人高声宣布：“手术圆满成功！”全场一片沸腾。如释重负的陈彦林，没有见到鲜花，也没有听到掌声，只喝了一碗稀饭，算是对这次不同凡响的成功手术的庆

祝。

2007年，陈彦林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负责“天使回声”医疗项目。这是市人民医院发起、与央视和中国红基会联合创办的一项面对全国贫困失聪儿童的慈善活动，主要是为患者实行“人工耳蜗”植入术。此项手术先进、精细、复杂，难度极大，当时只有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能做，他仅仅看过报道，从未有过实践经验。困难再大，没有孩子的痛苦大。孩子没有歌声，如同花儿离开了阳光。为了患儿，他毅然接受了任务。某天，他好不容易抓住了一个去北京同仁医院学习观摩手术的机会，急忙托济南的朋友买翌日清晨赶到北京的火车票，结果朋友却鬼使神差地买错票，火车误了点，飞机没赶上。他又急又恼，“强行”要求误事的朋友连夜开车把他送到北京。一路风驰电掣，终于提前赶到了同仁医院。当然，他看到的还只是人家转放的手术摄像。为了在实践中找感觉，回来后，他专门去市卫校找了个尸头，对照着人家的手术录像，连续数天，不分昼夜，熬眼费神，一丝一毫地解剖研究，一点一滴地学习操作，终于熟练地掌握了这项手术。目前，他已经为80多名患儿做了植入术，而全省市级医院中，也只有临沂与烟台市人民医院能行此手术。

陈彦林，用自己的仁心妙术，为患者送去一支支歌曲，让世界充满了欢乐。

### 他是一束“玫瑰”

把男士比作玫瑰，必有人以为要嗲泛酸。其实“玫瑰”本来就不是花。祖上《说文》中本讲得十分明确：“玫，石之美者；瑰，珠圆好者”，是爷们中的君子的象征，展现的是一种隐涵于坚韧中的杰出风华和圆满品行。即便做了爱之信使，代表的也是一种无疆大爱，比拟医者最合适不过，形容陈彦林更恰到好处。

“玫瑰”之风华品质，是打磨砥砺出来的。陈彦林从小就有极强的求知欲、好学心，尤其对技术活儿抱有浓厚兴趣，肯于钻研，喜欢动手。摔了一个瓷碗，他悄悄找来工具，竟然一个巴儿一个巴儿地自己钜上了。妈妈说他：没出息，长大了要当个补锅钜盆的小炉匠呀？但他很有成就感，相当得意。妈妈没想到，这个在老人眼中未来的“小炉匠”，长大后竟然成了外科手术专家。

1975年，陈彦林进入当时的红旗车辆厂当了一名工人。几年中，他当过钳工车工铣工刨工，五把全搂，样样精通。没有白学的手艺，没有白练的功夫。没想到，当外科医生后，这些活路与功底全用上了。外科手术中

的十八般精巧玲珑的工具，在他手里，自然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1978年，陈彦林考上了广播电视大学。当教师的父亲当时对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尚不够认识，总觉得这种学校不太“牢靠”，竟然把录取通知书给撕了。求知若渴的陈彦林心中当然有一定的纠结，但更激起了他要考个“正规名牌大学”的志气。厂里活儿多，工作任务重，领导坚持的纲领是“抓革命促生产”，也并不支持他把心思用在复习考学上。于是，他只得白天搞“抓促”，夜里苦读书。从厂里到辅导复习的中学，有十多里路。一连数月，他天天晚上披星戴月，来去匆匆，恰如一位取经路上的夜行者与苦行僧。1979年，他顺利考入滨州医学院。全厂参加考试的20多人，只有他榜上有名。陈彦林一下又成了全厂的骄傲与光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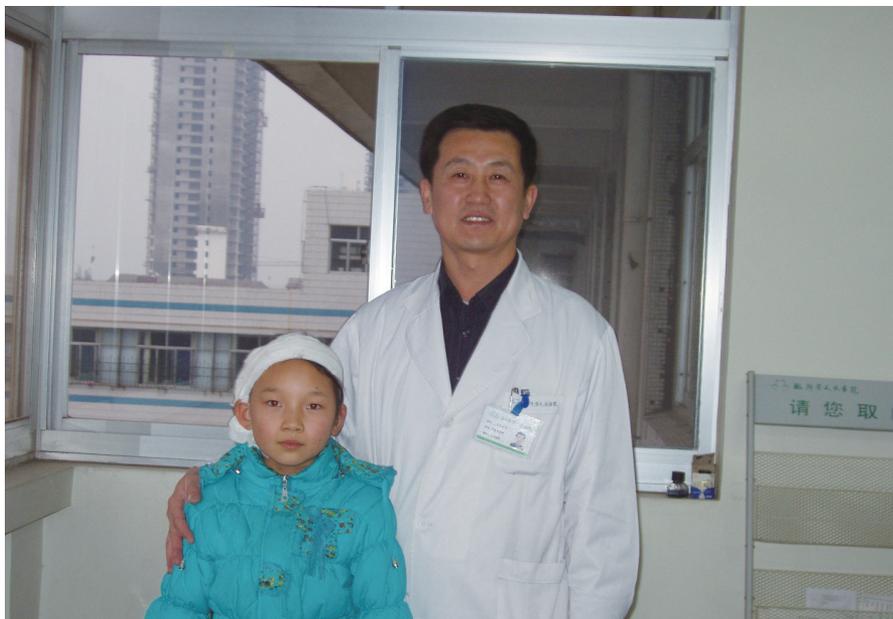
数年寒窗，壮志满怀，本科毕业后的陈彦林分配到了地区人民医院。本来期望坐上“内、外、妇、儿”等“大科室”的医师椅，不料与当年毕业的哥们姐们一起统统分到了不太招人的耳鼻喉科。一段时日，陈彦林总觉得自己有点高射炮打蚊子，心中不安稳，脚下想跳槽。科领导看出了他的“小九九”，科里来个高材生，当然舍不得放，并有意让他知道耳鼻喉科也不是“吃素”的，想法设法让他开阔眼界，放眼未来。1987年，特意派他到全国耳显微手术学习班学习。授课老师是国家工程院院士，名震中外；学习的内容是前沿技术，前途广阔。这下陈彦林顿悟了：耳鼻喉也是大事业，也有大作为，出大成就，有大前程。1989年，科里又让他到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专修头颈外科，此行收获更加巨大。于是，他把心之根渐渐深扎于本职岗位，象一颗牢牢定位的“玫瑰”，在不断的打磨砥砺中，开始闪耀出价值的光芒。

1990年1月4日，陈彦林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深刻清晰。这天，他主刀为一位70多岁的喉癌病危患者做联合根治手术。此类手术在市人民医院是开创性的第一例，也确立了他在科室专业上的骨干地位。自此，市人民医院头颈肿瘤手术进入了全省同级医院前列位置，连省级大院的专家都对他每每竖起大拇指。这些年，他共获得国家专利一项，获市级科技进步二等奖两项，在中、英文杂志上发表论著20余篇，可谓硕果累累。

用“玫瑰”比喻陈彦林，难道不是一种浪漫的贴切？

### 他是一支歌

诗言志，歌抒情，陈彦林有一句座右铭：“假如我



是患者”。其解释是：“医生多为病人动一下脑子，病人可能免除一辈子痛苦；大夫多为患者动一下手，患者可能终生受益。欲当合格医者，须先体验患者；为病人尽心尽力，乃为最高医德。”他正是这样一曲身体力行的感人的医者之歌。

为了病人，宁愿自己担风险。一次，科里来了一位刚刚40多岁的中年患者。病灶正堵着食道，莫说进食，就是连水都不能下咽。按病情，需要做“全下咽食管切除及胃代食道手术”。在耳鼻喉科中，这是难度最大、风险最大、死亡率极高的手术，有的患者甚至就死亡在手术台上，医生要承担极大压力与责任。病人的父亲是位70多岁的老人，正在经受着可能的儿子中年丧生、父亲老年丧子的巨大悲痛。医德仁心，让陈彦林把风险全部抛在脑后。经过反复检查、论证，最后他亲自主刀，经过5个多小时极为紧张的工作，终于做完手术。术后，他又亲自指导护理人员及时跟上精心护理，渡过了道道难关。10天后，病人终于可以进食了，他的心中才一块石头落了地。病人的父亲老泪纵横，竟然双膝一弯，跪到了陈彦林的面前。这一跪，使他更感到了职业的崇高，医德的重要，肩上的责任。

为了患者，宁愿自己多跑腿。有位患者把一排四五公分长的假牙误吞到食道中，向上取出时牙卡偏偏死死钩住了食道狭窄。此种情况，一般只有实行损伤极大的开胸术才能救治，病人当然难以接受，找到了陈彦林。他陪着病人，从一楼到七楼，从放射科到手术室，上上下下，反反复复，进行了数次检查，开动脑筋，试验了各种办法，最后终于在硬性食管镜下，用手术钳连镜加异物一并取出。一个专家让一排恶作剧的假牙折腾得精疲力竭，但是却为患者免除了大手术之苦。

为了病人，宁愿自己克疑难。一些边缘科际的疑难病症，原因复杂，疗效不显，“效益”不高。患者往往痛苦不堪，却很少有人愿意接这些“活儿”。为了患者，陈彦林迎难而上，破疑解困。他在本科开办了眩晕病门诊，特别是对“周围性眩晕”（又叫耳石症），采用“手法复位”治疗，一般20分钟左右就能治愈，堪称手到病除。对十分顽固的过敏性鼻炎、睡眠呼吸暂停障碍等病症，他也不懈地进行治疗探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为了事业，宁愿人人成专家。今天，陈彦林已经带领着一个40多人的专业团队。为了把这个团队建设成为一个充满芬芳的“玫瑰园圃”与传播妙音的“先锋乐坛”，他真诚希望每个同事都能成为专家。他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优势与特长，因人制宜，因材施教，谁擅长什么，就重点发挥他在哪方面的作用。临床实践成果自不待言，仅2011年，他们科就在全国耳鼻喉科最高权威杂志《中华耳鼻喉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让同仁们大为垂青。

用“歌儿”传记陈彦林，难道不是一种对医德仁心的真情呼唤？

# 1916—1949：临沂早期的报纸（中）

呼国英 刘金柱

## 二、抗日战争成为临沂报纸发展的推动力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爆发，沂蒙山区也成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

抗战初期，山东八路军和人民抗日武装力量还很弱小，又处在敌、伪、顽的分割夹击之中，无论在人力、财力和武器装备上，都处于劣势。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成为发展游击战争、坚持持久抗战的关键。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抗日团体蓬勃兴起。而中共党的各级组织和八路军及其地方武装，以及社会各界爱国人士，认识到了报纸在开展政治和武装斗争中的重大作用，为了更广泛地宣传抗日主张，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侵略斗争，他们克服了极其险恶的环境和艰苦的条件，以顽强和无畏的精神创办了多种报纸，报业由此得到较大发展，从而使得这一时期成为山东乃至全国报纸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阶段，在新闻史、文化史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在沂蒙山区，首先用报纸的形式吹响了动员全民抗战号角的是《民声三日刊》（简称《民声报》，后改为《青年报》）。1938年3月，沂水县的部分进步青年在中共党员的帮助下创办了这张报纸。从第三期起，报纸就连续刊登了毛泽东主席《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报纸还以《欢迎县长孙桐峰回城领导人民抗战》为题发表社论，尖锐地讽刺、批评了国民党县政府消极抗战的行径。而山东党和人民群众更迫切需要一张能够宣传贯彻党的抗战主张和政策，动员、组织和鼓舞全省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权威性的报纸。于是，中共山东分局决定要尽快创办一份四开大小的铅印报纸，作为中共山东分局的机关报。报纸集中筹备工作自1938年11月开始进行，报名最后确定叫《大众日报》，中共山东分局最初决定派刘导生、匡亚明分别担任报社社长和总编辑，具体负责《大众日报》的编辑创刊筹备工作。《青年报》的青年人也响应中共山东分局的号召，停办了报纸，全力投入《大众日报》的筹备工作。1939年1月1日，《大众日报》在沂蒙山区腹地的沂水县王庄正式创刊。创刊号一、四版是红色，二、三版是黑色，共印了2000份。开始时《大众日报》条件十分困难。报

社编辑部设在王庄村东南角一户农民的三间低矮的西屋和两间小南屋里。印刷厂设在王庄东北八里多地的云头峪村，该峪是王庄的八大峪之一，东西走向，地形十分隐蔽，便于随时应付敌人的奔袭和“扫荡”。

《大众日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边战斗边坚持报纸出版。创刊时为三日刊，一个月后改为二日刊，根据环境变化，报纸油印、石印、铅印并用。1939年夏，日军出动两万兵力对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大“扫荡”。报社150余人以仅有的七支土枪和手榴弹，组成沂蒙工作团，参加反“扫荡”斗争。先后进行了甘泉寺、后峪子、庙峪三次战斗，毙敌十余名。报社在临沂的八年多战斗环境中有500多名干部、编辑记者、工人、交通员等光荣牺牲，其中包括社长、报社管委会主任李竹如。一百几十位乡亲为掩护报社人员和印刷器材惨遭敌人杀害。

敌人在军事上进攻、“扫荡”的同时，在经济上实行全面封锁，报纸的纸张、印刷器材、印刷油墨等必需的物资供应面临极大的困难。报社职工自力更生，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保证报纸的出版。他们用植物油和马尾松烧的烟灰作原料制成油墨，请来造土纸的农民和印刷工人一起研究，把桑树皮和麦秸碾碎，放在水里浸泡发酵后捣成纸浆，然后制成纸张。自己研制机器设备。报社还设法通过敌占区的地下党组织、爱国商人等各种渠道，购进了大量的印刷材料。因此，报社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没有停止报纸的出版。

《大众日报》创刊后，报社就十分重视通讯与发行工作，大力发展通讯员队伍，建立了覆盖山东甚至到达华中、华北等地的广阔发行网络。1941年4月，报社成立通讯部，开始组建通讯网，经过三年努力，通讯员发展到1900多人，报社还编印了《青年记者》《新闻业务》等小册子，培养通讯员。为了做好战时报纸的发行工作，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报纸，报社通过多种渠道扩大发行面。建社之初，总发行处设在沂水县夏蔚、坦埠、黄山铺，各地八路军办事处设代销处。1939年五六月间，日军第一次大“扫荡”时，《大众日报》发行的区域仅为沂蒙区、泰山区、鲁南区，发行量也不太多。1942年2月，山东战时邮政总局成立，《大众日报》由“战邮”发行。这时，报社驻莒南县，发行工作以莒南为中心，开辟了四通八达的发行线路。向南到达鲁南地区，然后过陇海线通到华中地区；向西到达鲁中，然后过津浦线到鲁西，再转向华北、渤海地区，达延安；向北过胶济线直达胶东解放区。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和各种关系，发行到敌占区。这样，每期印三四万份的《大众日报》，迅速及时地传送到四面八方，成为宣传、组

织、鼓舞军民，动摇瓦解敌人的有力武器。在当时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大城市，如北平、天津、济南、青岛、徐州、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众日报》都拥有许多热心读者。到解放战争胜利时，期发达到六万份，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发行数量居前、有着重要影响的报纸。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中央举办报纸展览，《大众日报》被评为敌后办得最好的报纸之一。

1940年1月1日，毛泽东同志为创刊一周年的《大众日报》题词予以鼓励：“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反对任何投降妥协的企图，坚持抗战到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我们一定要自由，我们一定要胜利。”

《大众日报》从1939年创刊到1947年9月从莒南县大店转移到五莲县境内，在临沂经历了八年零十个月的时间。报社在临沂辗转驻过9个县的30多个村庄。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沂蒙人民与报纸血肉相连。报社不管到哪里，都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保护。1940年秋天，日军大“扫荡”后，报社一部分工厂要从蒙山搬到沂水。10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只能靠人力运输，300多



《大众日报》创刊号



《大众日报》的工人在排字



大众日报鲁中前线特派记者

名群众组成的运输队三天日夜兼程，走羊肠小道，爬悬崖峭壁，终于把机件材料安全无损地运到目的地。1941年秋冬反“扫荡”时，驻在蒙山脚下凤凰庄的报社印刷厂突然得到情报，敌人要来。大家把机器埋好后迅速撤出了村子。敌人扑了空便抓来村民严刑拷打，但没有一个人向敌人屈服，说出机器下落。报社与根据地的人民在血与火的战斗中结下了深厚友谊。沂水的群众还创作了京剧《一家人》，赞颂《大众日报》与群众的鱼水深情。

在战火中诞生的《大众日报》，是临沂报业发展史上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报纸，是中共党组织办报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报纸，标志着临沂报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大众日报》的创办，极大地促进了党的新闻事业的发展。

在此影响下，三大战略区相继创办了报纸。中共鲁南区委创办了《鲁南时报》，中共鲁中区委创办了《鲁中日报》，中共滨海区委创办了《滨海农村》。同时，党的基层组织、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武装、群众团体等也创办了多种报纸，为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提供了巨大的舆论支持。

《鲁南时报》创刊于1940年7月1日，开始为八开四版，油印，周报。1942年7月7日改为石印，1945年8月改为铅印，版面为四开二版或四开四版，三日刊。该报共出版了7年半的时间，曾暂时休刊两次，共出版了702期。

《鲁南时报》的创刊背景是：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政委罗荣桓的率领下，在白彦、梁邱一带（今平邑、费县）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同中共地方组织的武装力量共同建立了鲁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4月，山东军政委员会决定将第一区党委（又称大鲁南区党委）划为鲁中、鲁南两个区党委和鲁东南地委。6月，鲁南区党委成立。罗荣桓当时兼任中共山东分局副书记，为了便于传达党中央的声音，指导革命斗争，罗荣桓提议，将一一五师所办的报纸《时事通讯》交地方，扩大发行，改名《鲁南时报》。鲁南时报社成立后，鲁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林乎加兼任报社社长，一一五师派白刃到报社工作，担任总编辑。7月1日，《鲁南时报》在费南县天宝山区的油篓村（今属平邑县）创刊，报头由罗荣桓题写。创刊时报社仅有一台油印机，报纸刊发的内容主要是新华社播发的国际国内新闻稿和自己采写的地方新闻。每周一期，印刷几百份。1941年春，出刊半年多后，由于日军的“扫荡”和经济条件所迫，便暂时休刊了。1941年秋，鲁南区党委决定报纸复刊。9月间，大众日报社派出编辑部副主任赵宏弼支援《鲁南时报》复刊。赵宏弼在赴鲁南途中遭遇日寇“扫荡”便更道郯城码头到达三地委的新群众报社。正值该报总编辑调走，赵便临时接替了该报的领导工作。10月，日寇“扫荡”临（沂）郯（城）邳（县）根据地，赵宏弼率报社几十名职工突围，投奔中共鲁南区党委。就在他们赶到区党委驻地银厂村（今属苍山县）的当天夜里，又发生了国民党五十一军六八三团张本枝部勾结日伪军和顽匪荣子恒、王洪九等，突袭鲁南区党委机关的“银厂惨案”，鲁南区党委书记赵铸不幸被俘。报社人员全部突围脱险，赵宏弼头部受轻伤。“银厂惨案”后，中共山东分局派宣传部长来鲁南区党委处理善后事宜，期间研究

了《鲁南时报》的复刊问题。11月，报纸在抱犊崮山区的东涧村（今属苍山县）复刊。

复刊后，赵宏弼任社长，工作人员仅几个人，1942年初逐步增加到20多人，分为编辑室、通联科、经理部，黄华任总编辑。报纸初为四开二版，三天一期，油印，1942年夏改为石印，印量也由几百份增加到1100份。1943年，报社又调来了三名同志，于是报社也有了专职记者。这一年，新华社山东分社鲁南支社成立。支社社长由赵宏弼兼任，燕遇明、刘亦夫任副社长。鲁南支社和《鲁南时报》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

在艰苦的抗战时期，斗争环境十分艰苦，办报条件十分恶劣，还经常遭受敌人的袭击，报社全体人员不畏艰苦，克服种种困难，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采编、排版和印刷质量也不断提高，在打击敌人、宣传群众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深受根据地党政领导和抗日军民的喜爱。1943年夏，国民党九十二军和巨匪刘桂堂部1万多人由滕峰边区进犯，费南军民紧急动员之时，报社人员在离敌人集结黑风口不足20里的地方坚持出报。8月19日向五里外的常庄进攻，编辑记者分两路转移，一路绕回天宝山区，一路突破敌碉堡封锁的平（邑）城（后）公路脱险。第二天中午，两张油印的《鲁南时报》在两个地方出版了。两张报纸的第一版都是刊登的揭露九十二军和刘桂堂进攻鲁南山区罪行的内容。费南保卫战胜利后，两个组又会和在一起，石印的报纸又出版了。1943年11月东柱子战役，一举消灭了危害民众几十年的惯匪刘桂堂，解放了费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鲁南时报》对战斗过程和胜利后人们欢庆的盛况进行了出色的报道。1944年战斗极为频繁，记者马英一直跟随部队转战鲁南，活动在最前线，写出了《戈山保卫战》等许多有影响的稿件。在讨伐涧头崖王洪九部时，他还和《前进报》的记者办起战地小报。在天井汪战役中，报社从社长、总编辑到编辑记者和内外勤人员，全部分散到各战斗部队，进行战地采访。总编辑黄华随战士一道突进到敌人固守的围墙下面，得到了战斗的第一手材料。在两天两夜的战斗中，报社人员也紧张地工作了两天两夜，除了正常出版报纸，还出了几张《号外》。他们出色的工作受到了党委和新华社的表扬。1944年鲁南八路军在夏秋攻势中收复土地两万多平方公里，解放人民140多万。这些地方迅速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鲁南时报》以长新桥为基点，以点带面，广泛深入宣传“双减”运动，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工作。

到1945年5月，报社正式成立了铅印厂，8月3日印出了第一张铅印报纸。虽然只有一台机器但报纸的印刷量猛增到7000多份，版面也稳定在四开四版。1946年7月1日，报社在驻地桑村举行了创刊六周年活动，报纸发表了方源写的《从斗争中坚持过来了——纪念鲁南时报六周年》。军区司令员张光中题词：“自你诞生以来，即与鲁南人民一起奋斗着，度过了艰苦困难的日子，改变了严重的局面，取得了和平胜利。现在你已经壮大了，由油印而石印而铅印了，由出版几百份而几千份了，已成为我鲁南人民的喉舌，代表我鲁南人民的动向。你是我鲁南人民反对内战的先锋战士，也是我鲁南人民和平民主建设的指挥者。”

《鲁中日报》是中共鲁中区党委机关报，1943年5月在沂南县岸堤区王山村创刊，名为“日报”，实为三日刊，四开四版，铅印、石印并用。创刊初期，发行不过五六百份，后逐渐增加到2000份。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停刊，改名为《鲁中大众》，另行创刊。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鲁中地区党的对外宣传工作，上有《大众日报》（该报从1939年创刊到1943年5月，主要在鲁中地区出版），下有《沂蒙导报》（中共鲁中区二地委机关报）。1943年春，因适应形势的变化，《大众日报》东迁滨海地区，对鲁中地区的报道，逐渐减少。而《沂蒙导报》又很难担负起整个鲁中地区的各项报道任务。为此，鲁中区党委决定，撤销《沂蒙导报》，创办区党委机关报《鲁中日报》。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鲁中日报》于5月份在沂南县岸堤区王山村创刊。

《鲁中日报》是在中共鲁中区党委直接领导和密切关怀下，从比较薄弱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份在根据地中十分有影响的报纸。区党委书记罗舜初，组织部长高克亭和宣传部长董琰都非常重视报纸工作。高克亭任副书记后，更为关心报纸。区党委宣传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报

纸工作，并以区党委的名义明确提出“全党办报”、“在通讯工作上打人民战争”等口号，使各级党组织把通讯和读报工作列入议事日程。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沂南、沂中县相继建立了县通讯站，报社推广了他们的经验后，边联、费东、沂北、蒙阴等县也相继建立了县站。1944年秋，区党委召开宣传干部会议，对党报通讯工作进行了讨论。1945年5月，鲁中地区已有三分之二的县有了通讯站。已登记的工农通讯员达1100余名，每月来稿500余篇以上。《鲁中日报》的工农通讯员工作，曾受到新华社的表扬。1945年5月15日新华社山东分社做了较全面的报道。新华社总社也播发了。

《鲁中日报》紧紧围绕党委确定的中心任务，大力开展宣传报道。在1944年开展大生产运动中，鲁中区遵照毛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组织起来”的号召，为医治敌人多次大“扫荡”造成的创伤，巩固扩大和建设根据地群众面开展了大生产运动。此时，报社派出的记者，以沂南、沂中、边联等县为主，大力报道这一运动。为了树立榜样，报社抓住了边联县交良村党支部书记兼村长朱富胜这一典型人物，派出记者三下交良村，全面进行调查研究，前后一个多月，写出了个整版的通讯。《大众日报》于7月1日全文转载。接着，鲁中区党委发出指示，全面推广朱富胜带领群众组织变工互助的经验。报社又派出记者总结报道了若干典型人物和村庄，为1945年至1946年初的前后两次全区劳模大会做了准备。

在军事宣传方面，《鲁中日报》也不遗余力地做了大量工作。1944年，鲁中地区最困难的局面已经开始扭转，随着春季攻势的胜利，鲁中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1944年3月25日，鲁中军区部队继一、二次讨吴（化文）战役胜利休整之后，又乘胜追击，发起了第三次讨吴战役。《鲁中日报》派出记者随同讨吴战役前线指挥部行动，随着战斗的节节胜利深入到吴化文制造的无人区采访；有时直接跟随战斗部队采访，使前线的捷报源源不断地反映在报纸上。如著名战斗英雄曹士范等的英雄事迹，就大大鼓舞了鲁中地区的广大军民。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后，国际国内形势起了根本变化。鲁中区党委根据形势需要，决定《鲁中日报》停刊。

《鲁中大众》是中共鲁中区委群众工作委员会的机关报。1944年5月1日在沂南隋家店村创刊。1945年6月，鲁中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成立，该报成为“抗联”的机关报。该报与《鲁中日报》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主要面向广大的人民群众。报纸主要报道群众工作的动态和经验、群众文化活动，还开辟了许多专栏，介绍一些抗日作战的小故事、小常识，定期刊登“学文化”识字课，很受群众欢迎。该报最高时发行量达五六万份。为了更好地办好报纸，改进和提高宣传质量，“抗联”决定并经区党委同意，《鲁中大众》在业务上接受《鲁中日报》编委会领导，与《鲁中日报》一起办公和行动。《鲁中日报》编委官达非负责具体指导《鲁中大众》的编辑工作。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鲁中区抽调大批人员赴东北工作，再加上山东抗日根据地已基本连成一片，《大众日报》已能够发行到各地，在此情况下，鲁中区党委决定《鲁中日报》和《鲁中大众》停刊，此后创刊新的《鲁中大众》为区党委机关报。

《滨海农村》是中共滨海区委机关报，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6月在莒南县创刊，版面为八开二版，三日刊。

中共滨海区委于1943年4月成立（1946年7月改为滨海地委，直属中共中央华东局领导），年底区党委创办了32开的《滨海农村》小册子，以加强对工作的指导。1945年，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决战阶段。夏季，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抗日武装在各个战场纷纷出击，收复了大片国土，各解放区已基本连成一片。5月，日军作最后的挣扎，组织7000余人对滨海区进行最后的“扫荡”。全区军民同仇敌忾，经过1个多月的反击，取得了反“扫荡”的全面胜利，毙、伤、俘日伪军5000余人，攻克敌大小据点140余个。在这种胜利的形势下，滨海区党委为了及时传播胜利的消息，动员军民取得抗战的全面胜利，迎接新的任务，决定把《滨海农村》小册子改为报纸出版，成立报社和新华社滨海支社（后改为分社），一个机构、两个牌子。社长由滨海军区政治部主任赖可可兼任，辛纯为总编辑。

《民兵》是滨海军区政治部创办的报纸，1943年5月20日创刊。该报的前身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办的《战士》报。《战士》报于1939年春随一一五师师部由山西转战入鲁。该报在反映部队生活、加强部队军政建设、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扩大共产党八路军政治影响、组织部队参加根据地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宣传报道，1941年11月，德籍著名作家、记者希伯写了一篇《无声的战斗》，报道了罗荣桓指挥的“留田突围”一役，《战士》报套红转载。政治委员罗荣桓、政治部主任肖华和参谋长陈士榘等军政首长在该报发表过许多重要指导性文章。1943年春，因八路军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合并，组成八路军山东军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战士》报遂停刊，改由滨海军区政治部出版《民兵》报，负责地方武装和民兵工作的宣传报道。

“民兵”为人民子弟兵之意，报头为罗荣桓题写，后为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题写。

《民兵》主要面对驻滨海军区的一一五师所属部队和滨海区地方武装，期发三四千份。该报的主要特点是“全军办报”。该报在部队发展通讯员1000多人，来自官兵基层的稿件占70%。因此该报扎根于连队士兵，成为官兵的良师益友。

在抗日战争期间，沂蒙山区还出现了多种进步力量办的报纸。《新山东报》是一张面向全省具有统战性质的报纸，它由中国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山东省会部和山东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办，1940年4月在沂南县匡石村创刊。它主要面对社会中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共山东分局、省参议会、省战工会、省动委会、抗协省会部以及各分会的负责人经常为报纸撰写评论，主要内容涵盖有关抗战形势、对敌斗争、统一战线、根据地建设、政府工作、农业生产、生产救灾、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文化教育等。其中，动委会和抗协领导人和一些社会知名人士撰写的专论和对国民党的评论占有较大比重。比如要求国民党按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要求真诚与共产党合作，揭露和批评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战、制造分裂的行径等。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东局书记刘少奇来山东视察，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认为抗协和动委会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中共山东分局与两会领导研究，一致同意两会停止活动，两会专职干部转向政府财经、文教等部门工作，《新山东报》也于1943年春停止出版。

另外，抗战时期其他较有影响的报纸还有：

各级地方党组织办的：中共蒙阴县委1940年创办的《人民报》，中共山东分局第七区党委第五地委1940年创办的《滨海时报》，鲁中区二地委1941年12月在沂南县马牧池区孙疙瘩子村创办的《反扫荡报》（后改为《沂蒙导报》）。

社会团体办的：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1938年创办的《动员日报》，郯城县码头动员委员会1939年创办的《动员报》，临郯抗日青年救国团1939年创办的《救国报》。

军队办的：鲁南军区1940年创办的《抱犊崮报》（后先后改为《战号》、《鲁南报》、《前进报》），八路军山东纵队1940年在沂南县孙祖创办的《前卫报》（1942年山东纵队改建为山东军区，该报成为山东军区的机关报）。

这些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诞生的报纸，在敌人的经济封锁下，办报所需的机器、纸张等物资极端缺乏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千方百计解决困难，顽强地生存、发展壮大，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 回忆丈夫张灵甫

王玉龄

2007年5月，孟良崮战役过去整整60年。我回到了他战死的地方。

天下着些小雨，山路有些滑。我已经79岁了，爬上那个山坡，感到非常吃力。回想60年前的情形，我就想到他当时瘸腿爬山的那样子，真是很难为他。

60年前的战役，我没有亲眼目睹，每每遇到电视、电影里有关的镜头，我总是一看再看。

我从来没有对他讲过、告诉过他我爱他。他对我来说很普通、很平常。他战死以后，我一直很后悔，责备自己说，你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吝啬啊，连这样一句话都没有讲。

60年过去了，我已经79岁了。我一直耿耿于怀的事情，就是在他最痛苦、最绝望、最无依无靠的时候，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抗战期间，张灵甫南征北战，恶仗无数，书写下自己最为风光的一页。

1925年，22岁的张灵甫从黄埔军校毕业，踏上北伐征程。三年后，屡立战功的张灵甫升为连长。也就在这一年，湖南长沙的名门望族王家新添了一个女婴，取名王玉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了躲避战火，9岁的王玉龄随家人迁出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此时的另一个地方，张灵甫随51师开赴上海，参加著名的“八一三”淞沪会战。张灵甫以勇猛果断，指挥有方赢得全团官兵的爱戴。嘉定作战的时候，面对武器装备远远优于国民党军的日寇蜂拥冲锋，杀红眼的张灵甫甩掉上身军服，抱着机枪跳出战壕，身先士卒带领100多名敢死队队员迎头痛击，杀得日寇丢盔卸甲，抱头鼠窜。

1938年，张灵甫奉命对驻守江西德安张古山的日寇进行反击。是役，张灵甫亲率一支突击队轻装出发，攀木挂树，穿过艰险的深山峡谷，老林恶水，配合正面部队进攻，飞夺张古山。而后日寇不甘失败，出动飞机与重炮狂轰滥炸，几乎将张古山夷为平地。张灵甫率部浴血死战，与日寇鏖战五天五夜，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反复拉锯。德安大捷之后，田汉受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委派，采访张灵甫等人，刊登在《中央日报》上，并编写话剧《德安大捷》，张灵甫以真名真姓在剧中出现，从此名震天下。

1939年3月，张灵甫率部参加南昌会战。张灵甫在前沿指挥所指挥战



张灵甫

斗，不幸右腿被日军机枪的两颗子弹扫中，受了重伤。军医检查后说：“腿要锯掉。”张灵甫对随从副官说：“如果我昏迷了，你要阻止医生锯腿！”说完，他给了副官一把手枪，厉声说：“谁锯我的腿，你就枪毙谁！”结果右腿一直未治愈。匆匆包扎伤口后他再度投入战斗。

综观张灵甫在八年抗战中的表现，自1937年参加淞沪抗战至1945年抗战胜利，屡立战功，被誉为“模范军人”、“常胜将军”、获得过“自由勋章”。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这一年，王玉龄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经过战火洗刷的家园早已没了当初的模样，而当初的小姑娘也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

## 抗战时期，携手张灵甫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为躲避战火，我随家人迁出老家长沙，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离家的时候父亲找来两部大卡车，把里面的座椅全部拆掉。车厢里放满背包、箱子和轻便值钱的家当。全家早已乱作一团，而对于我们这些在屋子里长大的小孩们来说，哪里懂得时局的紧张、也听不到慌乱的嘈杂声。女孩子们在一起，玩啊、笑啊、聊天啊。

进入中学读书后，为了躲避战火，不能再到教室上课。而将上课的地点临时迁到附近的山上。起初的时候，男孩、女孩们还很新鲜，觉得好像郊游一样。到了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才回来。回来的路上却看到日本人轰炸过的地方，满目疮痍，景象凄凉。炸断、炸飞的人体残肢，像手啊、腿啊，挂在电线杆上面，我们吓得大叫起来。

我对军事方面是一点不了解的。所以后来连张灵甫是个多么有名的将军，我都不知道，没听说过。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全家的心情也跟着好转。

周末，家里的几个女孩子约好出去理头发。在理发店，我们坐在椅子上，唧唧喳喳地说着话。

那天，他穿一身军装，带军帽。碰巧坐在我椅子的背后。我发现他透过理发的镜子，盯着镜子里面的我打量。我心说，这个人真是讨厌，怎么能这么看着人家，就差把头贴到镜子里面看，于是就瞪他一眼。

后来他对我讲，他说幸亏你瞪我一眼，不然的话，如果你要对我笑一笑，我就没兴趣了。不久后，他就托他的朋友张处长请我们全家吃饭。饭桌上，我自顾自，只管吃菜吃饭。他的朋友张处长就问我伯母多大年纪了，我伯母说她32岁。张处长就接过话，说张灵甫副军长你也有32岁啊，你们两个同年的，干一杯吧。

灵甫那年实际42岁还多。张处长继续说，我们副军长还没有结婚啊，王太太你在长沙，老长沙了，你认识好的小姐给我们副军长介绍。我伯母讲，那当然，有好的我一定给你介绍。张处长说，你们家那么多小姐，也可以介绍嘛。我伯母讲，大的呢，都名花有主了；小的呢，年纪又都太小了。张处长讲，那就找那个不大不小的嘛，眼睛就朝我看。

我坐在那里当然听得懂嘛，不大也不小的就剩我了。于是我生气了，就把脸一板。

我对他一无所知。

他老是穿军服，像是个军人吧。我心里猜测。

伯母告诉我，张军长可是抗日的名将。可别人越是这么说，我就越不把他当一回事、越不理他。而他呢，大概也是经历过太多事情了吧，可能就是觉得我傻傻地耍着小性子很让他喜欢。

那次以后，他就越发频繁地到我们家里来，几乎每天都要来。刚刚开始，我看见他也不讲话，有时候还故意出门避开他。慢慢地，跟他熟了。英俊？我不觉得，就觉得看着还顺眼。

有时候，他给我讲故事。他告诉我，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大读历史系。每一朝每一代的文化名人、野史传奇，他如数家珍。他喜欢讲，我也喜欢听。

而他自己抗战时打仗的故事，却从未讲过。

人家说他是跛子。一次战斗中，他负了伤。机关枪扫到了他，子弹留在他的脚里面。当时的医学不是很发达，打完石膏后，那个脚就不能弯了。可是从他走路的外表一点也看不出来，只是走得久了会很痛、很累。

他从来不讲他得意的事情，也从来不会告诉我他最痛苦的事情，可能他觉得我太单纯了吧，不想拿这些事情来烦恼我。我只觉得他很可靠，有时候就觉得他像我爸爸、有时候也像我的好朋友，所以对他很信赖。

很快，他就对我求婚了。我的母亲对此是很反对的。一方面，觉得我与他24岁的年龄差距始终很难逾越；另一方面，我的母亲守寡半生，她不喜欢自己的女儿嫁一个军人。她说军人的生命是不可靠的，她不想我也重复她的命运。

尽管母亲反对，这门亲事还是定了下来。就在两人决定结婚之际，张灵甫接到了升迁令，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于是，两人将婚礼地点定在了上海。因为时间紧迫，王玉龄穿着大一号的鞋子，张灵甫穿着借来的西装结了婚。婚礼结束的当晚，两人就坐上了前往南京的火车，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度过了他们的新婚之夜。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国共双方开始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在重庆签订了《双十协定》，两党矛盾暂时得以缓解。在南京，张灵甫与新婚妻子王玉龄度过了一段平静而快乐的时光。

### 短暂而快乐的时光

结婚后不久，他被提升为74军军长，即刻前往南京报到。我与他在南京度过了一段平静快乐的时光。

他教我骑马。那时候我刚刚开始学，还不太会骑。他驾着马在前面跑，我的马不知怎地也在后面跟着他跑，怎么拉缰绳都停不下来。我吓得死叫，大喊：“别跑那么快”。他就在马上回头冲我笑。

年龄的隔阂我从没感觉到。他也从来不讲什么很肉麻的话。但是他会说：我讨了一个好老婆，这比什么财富都重要，我要讨饭的话我老婆可以给我拿碗。他有时候讲些话，就会让我很感动。

有一次我与他闹矛盾闹得很严重，我说我要跟他离婚。这可把他吓坏了，他说假如我要真的离开他的话，

他宁可老死于山沟。他向我赔礼道歉，最后干脆在我面前立正，站得毕恭毕敬，向我敬礼、敬军礼。看到他这样，我是又好气又好笑，说我又不是你的上司，跟我敬什么礼啊，还不理他。他说你不原谅我，我手就不放下来。

他身边的人告诉我，张军长如今在南京地位显赫，是炙手可热的大红人。因为驻扎在南京郊外的七十四军充当着守卫南京的角色，身为七十四军军长的张灵甫，地位自然非同一般。

19岁的王玉龄没有想到，这会是她最后一次与丈夫见面。王玉龄生下一个男婴，她打电话给前方的丈夫通报了个喜讯。放下电话，王玉龄将儿子的照片寄给了丈夫。她不会想到，丈夫此生都无缘见到他的儿子。

### 最后一次见面

1946年8月，张灵甫接到命令，率部队出南京投入华东战场。

10月中下旬，他指挥部队和粟裕的野战军对垒。

期间，他时常给我写信，他也不讲他怎么想念我，就说家里养的鱼要死了，花也要浇水了，还有就什么时候回来，其他什么也没说。还给我画了一个图样，设计我们家的花园。在图里画了什么花要种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种什么花，他都写给我。

在我面前，他从来没有将战争当作一件很大的、很了不起的事情，他让我也没这种好像恐惧，也没这种感受。

1947年的春天，我去前线看他。当时我已经怀了9个月的身孕。怀孕让我一下子长了40磅，走路也很吃力。我说哎呀怎么得了，长得这么胖。他说忧愁就会瘦，就像哄孩子一样叫我睡在床上，闭着眼睛去找忧愁。你说我傻不傻，19岁不晓得什么叫忧愁。闭着眼睛找忧愁，忧愁没找到，结果我睡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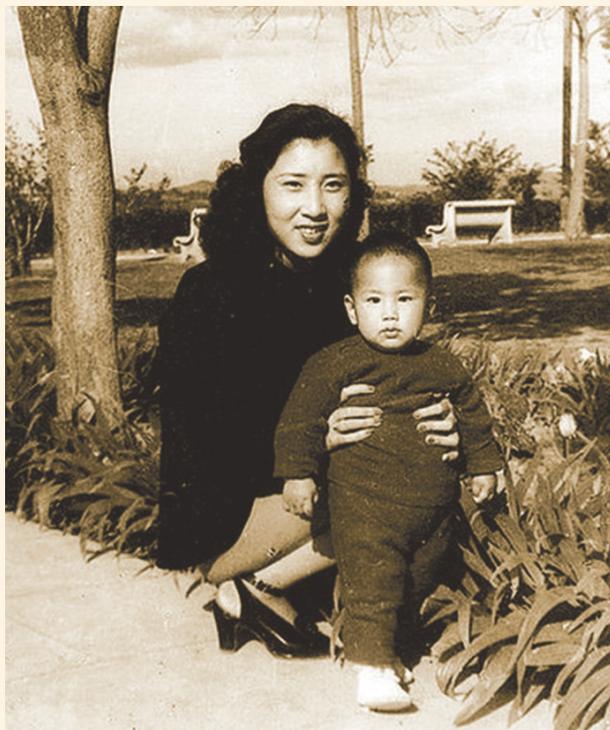
此刻的我并不知道，忧愁马上就要来了。来得太多，太快了。

家里突然派来了两个卫士在门口站岗，所有的报纸也都停掉不再递送。

十天前，我们的儿子出生了。他打电话来，跟我说话。听得出他很高兴。在听筒里乐得哈哈大笑，问我儿子声音响不响亮，还说我心地善，将来一定多子多孙，并让我赶紧把儿子的照片寄给他看。

此后，他再没有打过电话回来。

几个月后的一天，他的部下杨参谋突然来到家中，一进屋就一下子跪倒在我的面前。



王玉龄与儿子

我一下子就懵了。

杨参谋哭着告诉我，孟良崮一役十分惨烈。张军长打了一辈子的仗，知道是撑不下去了，友军根本不来。最后没有办法了，一死难逃，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将决战到最后，以报国家，请蒋介石照顾家人。

他把一封信交给参谋，说一定要交给太太手里，并说以后不管太太想做什么，你们都不要违反她的意志，一定要顺着她。

“余与仁杰决战至最后以一弹饮绝成仁，上报国家与领袖，下答部属与人民。老夫来京，未见痛极，望善待之，幼子望养育之。玉龄吾妻，今永诀矣。灵甫绝笔。5月16日，孟良崮。”

很长时间我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从来没有怨过他，有人讲，你不要想念他，他连你都不顾了，就去死掉，这算什么，我觉得这个话好像也是不对。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职责，他要吃了这碗饭，他就要做好他这一份事情。

1973年，我收到好友代为转达的信息，说周恩来想请我去北京看一看。

一番周折之后，我见到了周恩来。周总理说：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将才，我是他的老师，没有争取他过来，错误在我。在总理面前，我泣不成声。

2005年，我和儿子来到上海，颇为意外地接到当年华野指挥官粟裕大将之子粟刚兵的邀请。

他说他想请我吃饭，想见见我，怕我不会去，只有通过别人委婉转达。

我说那有什么关系呢，谁叫我的先生是职业军人呢。历史的事情，我不会计较，也没办法去计较。你说你能恨谁啊，对不对，这个问题太大了吧。战争就是残酷的。

2007年4月，我去了孟良崮。在我丈夫殒命的山洞里，放上了一束花环。

# 泰山南城羊氏 (下)

唐士文

## (八) 羊鉴

羊鉴，字景期。其父羊济，为匈奴中郎将；兄羊炜，历任太仆，兖徐二州刺史。羊鉴初任东阳太守，后迁太子左卫簿。时有徐龕反叛，司徒王导荐请让羊鉴率兵征讨。羊鉴因缺乏将帅之才，坚辞，王导不许，授其征讨都督之任，果然吃了败仗。晋元帝司马睿考虑羊鉴系羊徽瑜外属，免死，除名。后用为少府。羊鉴的外甥王敦叛乱，他受晋明帝猜忌。太宁四年（公元326年）成帝继位。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历阳内史苏峻联合豫州刺史祖约举兵反叛，羊鉴参加征伐，立下战功，被封为丰城县侯。后卒于光禄勋任上。

## (九) 羊曼

羊曼（274—328年），字祖廷。父羊暨，系景献皇后羊徽瑜之侄，任阳平太守。羊曼西晋末年避乱渡江后，被司马睿任为镇东参军，转丞相王导主簿，委以机密之任。历任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大将军王敦控制东晋朝廷后，羊曼为右长史。王敦死后，代阮孚为丹阳尹。

咸和二年（公元327年）十一月，历阳内史苏峻反叛，次年二月攻入京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羊曼受任以前将军率文武官员守云龙门，终被苏峻叛军杀害。苏峻叛乱平定后，追赠其为太常。其子羊贲嗣位，尚晋明帝女南郡悼公主，任秘书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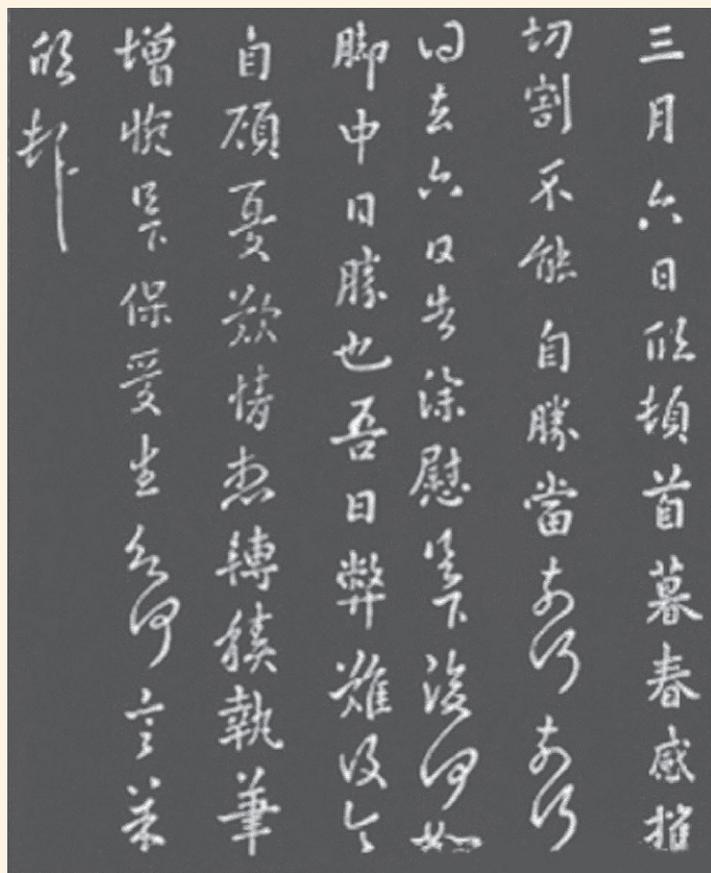
## (十) 羊昙

羊昙，东晋名士，系谢安外甥。羊昙少即聪敏，多才多艺，为人旷达。太元十年（公元385年）谢安去世，他极为悲痛，辍乐弥年。一次醉酒后到州西门，念及舅父谢安曾居西州路，悲不自胜，朗诵曹植“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的诗句，恸哭而去。后世以此比喻甥舅情深。唐代诗人温庭筠有诗云：“西州门外花千树，尽是羊昙醉后春。”羊昙是有名的歌唱家，史载“羊昙善歌唱，桓伊能挽歌，及（袁）山松《行路难》继之，时人谓之三绝”。

## (十一) 羊欣

羊欣（370—442年），字敬元，东晋、南朝宋著名书法家。曾祖羊忱为晋徐州刺史；祖父羊权为晋黄门侍郎；父羊不疑为晋桂阳太守。羊欣曾任辅国参军、会稽王后军府舍人、平西参军、主簿、楚台殿中郎等职。刘宋时，任新安太守凡17年，以“简惠著称”，受时人尊重。

羊欣从小爱好书法，其父任乌程令时，与吴兴太守王献之有深交。王献之对羊欣“甚知爱之”，亲自对他指导。南朝梁文坛领袖沈约称赞说：“敬元尤善于隶书，子敬（献之字）之后，可以独步。时人曰买王得羊，不负所望。今大令（指王献之）书中神怯者，往往是羊也。”唐代张怀之著《书断》赞羊欣书法“槭若严霜之林，婉若流风之雪，惊禽走兽，络绎飞驰。”其传世书迹有《暮春贴》等。羊欣著有书法理论《续笔阵图》、《采古来能书人名》等。他亦善医术，著有医方数十卷。羊欣有集7卷，已佚，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一篇。羊欣弟羊徽，南朝宋河东太守，有文采。《隋书·经籍志》著录9卷，并说明梁时有10卷、录1卷，已佚。《艺文类聚》引其《木槿赋》。



羊欣《暮春贴》

### (十二) 羊玄保

羊玄保（371—464年），南朝宋大臣。祖父羊楷为东晋尚书郎都官郎。父羊绥为中书侍郎。羊玄保初任高祖镇军参军，少帝景平二年（公元424年）迁司徒右长史，入为黄门侍郎。因善弈胜文帝，授宣城太守。他敢于革除弊政，刘式之任宣城太守时，实行吏民连坐法，即一人犯法逃亡，连坐五里，吏送州判罪；捕获犯法逃亡者，“赏位二阶”。羊玄保认为“亡叛之由皆出于穷逼”，毅然废此法。在职一年，民风大改，其离任后，群众“常见思”。羊玄保为官清正，“廉素寡欲”、“不营私利”，受到宋文帝的夸奖。宋孝武帝即位，为金紫光禄大夫。大明五年（公元461年）加散骑常侍、特进。大明八年去世，享年94岁，谥曰定子。其子羊戎，有才气而轻薄少行检，官通直郎。因与琅邪临沂人王僧达谤议时政，赐死。著有《羊戎集》10卷。

### (十三) 羊希

羊希（？—467年），字泰闻，系羊玄保侄。初任尚书左丞，大明末年（公元464年）任御史中丞。泰始三年（公元467年）为宁朔将军、广州刺史。大明末年，羊希针对东晋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发布的《壬辰诏书》中关于“禁止封山占水”违者以“强盗律论”等规定，认为“壬辰之制，其禁严刻，事既难遵，理与时驰”，向宋孝武帝上表实行占山法，提出“立制五条”。占山法的推定，对于恢复农业生产，保证国家税收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亦有利于老百姓。著有文集9卷，已佚。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文5篇。

### (十四) 羊祉

羊祉，字灵佑，泰山钜平人。系西晋太仆卿羊琇第六世孙（《北史·羊祉传》）。父羊规，原是南朝宋任城令。北魏太武帝南侵时降北魏，赐爵镇平子，任雁门太守。羊祉性刚愎，好刑名。景明初年（公元500年），为将作都将，加左军将军。景明四年，持节为梁州军司，讨叛氏。正始二年（公元505年）伐蜀，为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继任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虏将军。由于“天性酷忍，又不清洁”，被御史中尉王显弹劾免官。高肇执政时，启用为光禄大夫。后加平北将军，未拜而卒。

羊祉有子羊燮、羊深、羊默、羊侃、羊给、羊忱、羊元。羊燮为北魏将领，任镇东将军府司马；羊深，字文渊，早有风尚，学涉经典。自司空记室参军迁尚书驾部郎中。正光末年（公元524年）迁尚书左丞。因参与平叛有功，赐爵新泰县男。后任金紫光禄大夫。普泰初年（公元531年），加散骑常侍、卫将军、右光禄大夫，监修起居注。孝武帝初（公元523年），任中书令。永熙三年（公元534年）兼御史中尉、东道军司。及孝武帝入关，羊深与樊子鹄起兵于兖州反高欢。东魏天平二年（公元535年）正月，东魏军队讨破之，被斩于阵。其子羊肃，东魏武帝（543—550年）末任仪同、开府、东阁祭酒，以学尚知名。北齐乾明初年（公元560年），任冀州中从事。武平年（570—575年）中，入文林馆撰书，不久任武德郡守。

羊祉弟羊灵引，好法律，为书侍御史、三公郎，为尚书令高肇所重。京兆王元愉出镇冀州，高肇举羊灵引为元愉长史，是以相间伺，后被元愉杀。赠平东将军、兖州刺史。其子羊敦，字元礼，性尚闲素，学涉书史。父死后，除给事中。后为卫将军、广平太守，甚有能名。他治郡有惠政，曾将家人衣物换米以救济贫穷。东魏兴和初年（公元539年）卒，吏民莫不悲恸。羊敦子羊隐，东魏武帝末年任开府行参军。

### (十五) 羊烈

羊烈，字信卿，系北魏雁门太守羊规之孙、羊莹子。羊烈少聪敏，好读书，能言名理，以玄学知名。北魏孝昌末年，其从兄泰山太守羊侃据郡反魏，羊烈与从兄广平太守羊敦驰赴洛阳告难，深受朝廷嘉许。北齐天宝年（公元550—559年）中，累迁为尚书祠部、左右郎中，在官咸为称职。天宝九年（公元558年）迁阳平太守，治有能名。迁光禄少卿、兖州大中正。武平初（公元570年）任骠骑将军、义州刺史，以老还乡，于北周大象（公元579—581年）中卒于家。其弟羊修，有才干，卒于尚书左丞任上。羊修子羊玄正，北齐武平末年（公元480年）任将作丞。隋开皇（公元581—600年）中，任户部侍郎，卒于陇西郡赞务。

### (十六) 羊侃

羊侃（495—548年），字祖忻，系东汉南阳太守羊续后裔（《梁书·羊侃传》）。《梁书》本传称其为泰山梁甫人，然从《北史》称其父羊祉为泰山钜平人，可能是区划变动或者迁居所致。羊侃雅爱文史，博涉书记，尤好《左氏春秋》及《孙子兵法》。20岁随父在梁州立功，北魏正光中年（公元522年）为别将，以功迁使持节、征东大将军、东道行台，领泰山太守，进爵钜平侯。其父“每有南归之志，常谓诸子曰：人生安可久淹异域，汝等可归奉东朝。”（《梁书·羊侃传》）北魏孝昌末（公元528年），羊侃据郡起兵反魏，于南朝梁大道三年（公元529年）归梁抵京师，梁武帝诏授其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瑕丘征讨诸军事、安北将军、徐州刺史，其兄羊默及弟羊忱、羊给、羊元皆拜为刺史。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以安北将军、兖州刺史身份随太尉元法僧北讨魏国，入为侍中。次年封高昌县侯。中大通六年，出为云麾将军、晋安太守。大清元年（公元547年），征为侍中。次年侯景叛乱发生，羊侃奋力抗击，因疾病卒，时年54岁，由子羊球嗣爵。

羊侃长子羊鸞，共抗侯景叛军；第三子羊鸬，字子鹏，及侯景败，随其东走，以“密图之”。当船驶向京口，羊鸬抽刀斫之，侯景走入船中，他以稍入刺杀之。梁元帝萧绎以羊鸬为明威将军、青州刺史，封昌国县公，又领东阳太守。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军队围攻江陵，羊鸬赴援不及，随王僧愔征萧勃于岭表。闻大尉僧辩败，乃还，为侯瑱所破，于豫章（今江西南昌市）遇害，年仅28岁。

### (十七) 羊鸦仁

羊鸦仁（？—549年），字孝穆，泰山钜平人。少仕郡为主管。南朝梁普通（520—526年）中，率兄弟自北魏归梁，封广晋县侯。在征伐青、齐间有功，迁员外散骑常侍、历阳太守。中大通四年（公元532年）为持节、都督谯州诸军事、信威将军、谯州刺史。大同七年（541年），任太子左卫率，出为持节，都督南北司豫楚四州诸军事、轻车将军、北司州刺史。及侯景叛乱，羊鸦仁率所部入援。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他与南康王萧会理等共同攻侯景叛军于东府城，被叛军打败。台城（即宫城）陷落。侯景以其为五兵尚书，次年，羊鸦仁出奔江西，将赴江陵，至东莞，被故徐州刺史荀伯道子荀晷所害。临死以报效不终，因而泣下。后其兄子羊海珍知之，掘荀晷父并祖及所生母合五丧。

羊鸦仁子羊亮，侯景叛乱平定后，任吴州刺史，随王琳，以名将之子见礼甚隆。其为人多酒无赖，酒醉为阉竖所杀。

中国历史上产生的每一个望族，都给后人留下了诸多方面的宝贵文化遗产。区区万字以内的著文，述及一个望族的方方面面，难度甚大。囿于篇幅，本文仅是泰山南城羊氏的文化史纲而已。

# 姓氏百家漫谈——刘姓 (下)

赵丹峰

宋代，刘姓中出了一批名人：刘攽和刘恕皆为北宋著名史学家。刘攽系庆历进士，任地方官达20余年，后官至中书舍人。刘恕少时聪明过人，未及成年便举进士，官至秘书丞。他深好史学，遍览《史记》以下诸史，对中华上下数千年史事了如指掌。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司马光撰成自战国迄秦朝的八卷《通志》文稿上呈御览，英宗阅后甚喜，即命设局续修。书成后，神宗将此书赐名《资治通鉴》。这部历时19年撰成的宏大编年体通史，先秦部分系司马光单独编撰而成，秦代以后的部分则是在英宗下旨设修史局后，由司马光主持，由充任修史局僚的刘攽、刘恕、范祖禹等史家根据各人所长，先分时段各自撰成“长编”后，再由司马光总其成，修改定稿而成书的。其中，《通鉴》的汉代部分，即是由刘攽编撰的。刘恕被邀任修史局局僚后，便倾心协助司马光修史，凡遇史事纷杂难治者，司马光均委其考证解决。他对魏、晋后史事，考证尤为精详，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除《资治通鉴》外，二人皆有著作传世，其中刘攽著有《东汉刊误》，刘恕著有《通鉴外纪》和《五代十国纪年》等。与刘攽、刘恕同期的刘敞，系北宋著名经学家。他精于《春秋》，不拘传注，开宋儒批汉儒之先声。有《七经小传》《春秋权衡》等传世。

南宋时期，刘锜是抗金卫国的一代名将。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身为泾原经略使的刘锜随张浚参加富平之战。金帅兀术（完颜宗弼）率金兵用柴土填平沼泽，进逼宋军营寨。危急关头，刘锜等率军力战劲敌，双方激战竟日，使兀术一度被围。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刘锜被任为东京副留守，率王彦旧部八字军赴任。至顺昌（今安徽阜阳），闻金兵南下，遂以两万兵力守城御敌。开战后，刘锜采用以少击众，以攻为守，以逸待劳等战术，大破兀术十万大军。不久，奉命撤还江南。翌年，援淮西，与张浚、杨沂中等在位于泸州（今安徽合肥）东南的拓皋镇大破金军。旋为秦桧、张俊等主和派所排挤，被夺兵权后知荆南府（今湖北江陵）。刘锜主政荆南6年，并不消沉，率军民堵塞江陵黄潭决口，以除水患，为民拥戴。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金主完颜亮亲率60万大军南侵，朝廷任刘锜为江淮浙西制置使守淮东，他于皂角林（今江苏江都南）设伏击败金军。后因年高病重不能任事，退至镇江，未几忧愤而歿。

刘过和刘克庄系南宋著名诗人。刘过填词多以感慨国事、渴望统一为特色，词风悲壮激越，豪放峻拔。亦有婉丽纤秀之作，如他在《贺新郎》中吟哦的“人道秋来须酹酒，无奈愁深酒浅。但托意焦琴纨扇。莫鼓琵琶江上曲，怕荻花枫叶俱凄怨。”即属此类。刘克庄系江湖派重要诗人，多有感慨时事之

作，所填《贺新郎·送陈子华赴真州》词，即是一首表现爱国精神的名作。词中写道：“北望神州路。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记得太行山百万，曾入宗爷驾驭。……君去京东豪杰喜，想投戈下拜真吾父。谈笑里，定齐鲁。两河萧瑟唯狐兔，问当年祖生去后，有人来否？多少新亭挥泪客，谁梦中原块土？算事业、须由人做。”友人陈子华即将赴任的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是长江以北南宋的边防前线，因此作者在词中希望陈子华能借任职之机联络北方的抗金义军，努力恢复中原失地，重建宗泽那样的兵威和祖逖那样的事业。此词壮怀激烈，足以与辛弃疾、陈亮的词媲美。

元代，刘秉忠、刘因以诗歌成就显于文坛。《干荷叶》是刘秉忠的散曲名作：“干荷叶，色苍苍，老柄风摇荡。减清香，越添黄，都因昨夜一场霜。寂寞在秋江上。”寥寥数语，就将悲秋感叹人生易老的心绪写得精妙入微。刘因的诗作意多深沉，他在《人情》诗中，以犀利的笔触写出了人情的无常和世路的险恶：“人情云雨九疑山，世路风涛八节滩。共说长安如日近，岂知蜀道比天难。”凡历经世事艰辛者，在读此诗时，均能体会出作者所言及的个中滋味！



刘基

明代，刘姓中出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他就是朱明王朝开国重臣刘基。刘基，字伯温，民间多以其字称之。他系浙江青田人，元至顺进士。曾任江浙儒学副提举、浙东元帅府都事等职。为招安方国珍之事与朝廷政见不合而受处分，旋即辞官归田。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至应天（今南京）向朱元璋陈述时务十八款，劝其脱离韩林儿独树一帜自立。此后，刘基便倾心辅佐朱元璋，筹划用兵次第，参与机要，终夺取天下，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勋臣之一。太祖朱元璋对其赞之曰：“老卿一至，山越清宁。”明初刘基任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封诚意伯。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因遭左丞相胡惟庸馋陷，为太祖朱元璋猜忌，无奈辞归。“溪云不为从龙起，山石何须学燕飞。篱下旧存彭泽菊，林间新长首阳薇。”刘基在《和李子庚》一诗中所写的这些诗句，正是其在辞归前夕，思悔自己涉足官场终遭厄运这一悲凉心境的真实写照。

在政治上，刘基主张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儒家思想，将休养生息、加强武备作为明初立国安邦的两大要务。在治学属文方面，他博通经史，兼擅诗文，是元末明初著名的散文家、诗人，与宋濂一起被誉为明初文坛领袖。其诗风格多样，异彩纷呈，有的雄浑，有的婉约，有的奇崛，有的则质朴通俗颇似民歌，均不乏佳构名作。所写讽谕诗，真实地描写了元末的社会动乱和劳动人民饱受战祸、重赋、贪吏盘剥等诸多摧残的痛苦生活。《田家》即是刘基讽谕诗的代表作，诗中写道：“田家无所求，所求在衣食。……侵晨荷锄出，暮夜不遑息。饱暖匪天降，赖尔筋与力。租税所从来，官府宜爱惜。如何恣意剥，渗漉尽涓滴。……安得廉循吏，与国共欣感。清心罢苍苴，养民瘳国脉。”作为一位曾任元末官吏的知识分子，能够真实表现人民疾苦，敢于道出农人渴望温饱、减少重赋的心声，其怜民之心令人感佩！刘基的散文体裁多样，尤数寓言体散文形象生动，文笔犀利，脍炙人口。《卖柑者言》便是其中的代表者。这篇作于元末的散文，从卖柑这一平凡小事入手，通过卖柑者卖劣柑被发觉后的“笑曰”搪塞之词，揭示出当时社会中的诸多欺世盗名现象，指出那些“佩虎符、坐皋比”的武将和“峨大冠、拖长绅”的文臣，多为“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斲而不知理，坐糜廩而不知耻”的尸位素餐之辈，继而得出这些昏庸为官者多系“又何往而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哉”的结论。读后，发人深思。从后，“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便成为人们讥讽某些虽不学无术、但却以“学者”、“名士”招摇过

市之人的经典之语。由于此文讽刺昏庸之官入木三分，故被誉为明代寓言体散文之冠。

明代，刘姓名人还有明末哲学家刘宗周（倡“慎独”之说，强调诚敬）和散文家刘侗等。刘侗系竟陵派重要作家，先与于奕正合撰《帝京景物略》，记述了北京地区的风物人文和岁时风俗，后又与于奕正合撰《南京景物略》（未成）。其文笔峻奇，颇显竟陵派作家文风幽深孤峭的行文特色。清代，刘姓中所出名人颇多。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系清之盛世，刘统勋、刘墉父子是此期建树颇多的刘姓重臣。刘统勋系山东诸城人，雍正进士。乾隆时累官至东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他秉性忠直，颇能进谏，与刘纶同为乾隆皇帝所倚重，有时“南刘东刘”之称。他曾数次深入工地，察看黄河与运河河工，均能及时革除积弊，以保工期和工程质量。刘统勋在文化上的重要贡献是主编《四库全书》。虽然在此书编纂开始不久刘统勋即去世，但作为此书的正总裁，他在发凡起例、进行总体设计和先期收集文献资料等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为日后《四库全书》的顺利编纂及成书质量奠定了基础。此外，他一生四次担任会试正考官，主持科考，在当时实行以科举取士的特定制度框架内，以相对的“公平”、“公正”，为朝廷选拔治国人才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刘墉乃刘统勋之子，乾隆进士。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授内阁学士，入值南书房，得清高宗信任。旋任户部、吏部侍郎，后出京任湖南巡抚，倡学业，促农桑，为官清正，颇有政声。乾隆四十七年，迁左都御史，仍值南书房。期间，他与户部尚书和珅奉旨前往山东，查处山东巡抚国泰贪污案，经悉心勘察，获其罪证，使之伏法。该案涉及朝中与地方大员30余人，曾震惊朝野。《刘墉拿国泰》的故事曾被当时的艺人编为大鼓传诵。之后，刘墉任工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充上书房总师傅，教授皇族子孙。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晋为体仁阁大学士。刘墉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处于帖学碑学交替之际，被称为融汇历代诸家书法之集大成者。其书用墨厚重，貌丰骨劲，极受后世书论家推重。他与翁方纲、梁同书、王文治齐名，世有“浓墨宰相”（刘墉）“淡墨探花”（王文治）之誉。所书《小楷书》，内容为孙兴公游天台山赋，结构严谨，丰富耐看，系刘墉楷书中的精品。其书法理论《学书偶成》，系由其创作的30首言及书法心得的诗作组成，别具一格。刘纶也是乾隆朝的一位重臣。他曾参与编修《清世宗实录》，累迁内阁学士。乾隆十五年（公元1750年），他以工部侍郎兼军机大臣，前后入值军机处近20年。后累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与刘统勋同为清高宗所倚重的大臣。

晚清后，刘步蟾、刘铭传、刘永福以军功名传天下。刘步蟾系清末海军将领，曾于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回国后任管带。1885年由德国督带定远舰回国，并任该舰管带。三年后任北洋海军右翼总兵。北洋舰队编成、规制多出其手。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农历甲午年）7月下旬，日本突然袭击中国海陆军，中日甲午战争爆发。9月17日，中日海军激战于黄海，刘步蟾指挥定远舰冲锋在前，重创敌舰。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负伤后，他代为指挥督战。战后继续加强防备，主张抵抗。翌年2月，日军进犯山东威海卫，刘步蟾移舰抗击，定远舰不幸在威海港内被日军鱼雷击中，刘步蟾仍指挥受损军舰与敌苦战数日，在知事已不可为的情况下，遂于2月10日下令沉舰，自尽殉国。百余年来，刘步蟾和邓世昌等抗日民族英雄，一直受到国人的称颂与追念。刘铭传系清末将领。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奉命督办台湾军务，多次击败入侵法军。翌年10月，台湾设省，为台湾省首任巡抚。期间，他积极加强防务，整饬吏治，增置州县，兴建铁路，并创办新式学堂，为台湾的开发建设竭尽心劳，其功至大。刘永福乃抗法名将。太平天国失败后，他在桂、滇边境组织黑旗军，后赴越南驻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法军入侵河内，刘永福应越南政府之邀，率部与越南共同作战，一举收复河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又大败法军于河内城西，击毙法军司令李维业。翌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率部参战，大败法军。后受清廷收编，授记名提督。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取得临洮大捷。翌年任广东南澳镇总兵。光绪二十年，奉命帮办台湾防务。《马关条约》签订后，日军登陆台湾，刘永福率部联合台湾义军，

合力抗击侵台日军，相持近5个月。后因接济断绝，于台南将临时被迫撤回厦门。1911年11月，广东宣布独立，刘永福应邀担任广东民团总长，不久辞职归里。

此期，活跃在文坛上的刘姓名人有：训诂学家刘台拱（著作有《论语骈枝》《荀子补注》《国语补校》《淮南子补校》《仪礼传注》等，内容深刻，见解独到）；女戏曲学家刘淑曾（著《小蓬莱仙馆传奇》专集，内收《黄碧笠》《丹青剑》《镜中缘》等剧本10种）；小说家刘鹗（所著《老残游记》，系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他还是国内最早收藏甲骨文者之一）。

清末，有两位临沂籍名人值得一书：一位是鲁南幅军领袖刘淑愈，另一位是山东著名实业家刘恩柱。刘淑愈乃沂州府费县人，道光进士，曾任房山县令和泰安教谕。因其秉性耿直，不谙为官之道，用当今的话说，即不懂官场上的潜规则，所以为官不及一年即被劾去职。回乡后，他自书厅事联曰：“泰岱半年，一堂化雨；房山三月，两袖清风。”后于旗山寺设帐授徒，因其门生中多有中进士、举人者，一时名扬沂州，桃李遍及鲁南地区。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在鲁南、苏北一带，爆发了以失业漕运船工和灾民为主体的幅军起义。几年后，“千百为群，次第蜂起，夺攘矫虔，吏不能制”，声势日趋浩大。在此形势下，刘淑愈决计解散学馆，扯旗造反，成为耿家埠一带幅军首领。当地官衙为求自保，按清廷诏令组织地主团练武装，配合官军，镇压幅军起义。家住费县东埠村（今属兰山区）的退休官员王嘉麟（曾任江西瑞州知府）和其从弟王殿麟（曾在广西任知县）分别统领沂州府团练事务和督办费县团练事务。刘淑愈与王氏兄弟虽皆系去职归里的官员，但历来不睦。当初，王氏兄弟去官回故里后，曾建造了一所筑有亭台水榭的宅内花园，以作享受，竣工后，遂邀费县名流在园内聚饮。王家自撰一上联赞其私家园林曰：“美者轮，美者奂。”被邀赏景赴宴的刘淑愈对王家的张扬甚为厌恶，遂脱口接答了一幅下联：“民之膏，民之血。”使在场名流面面相觑，场面极为尴尬。至此，刘淑愈与王嘉麟等结下怨恨。待幅军起事后，二人便更成为势同水火的敌对阵营。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夏，刘淑愈、李宗堂等联合其他人马计2000余人，攻打屡犯幅军的土城子团练。王殿麟闻讯后即派其子带队驰援土城子，途中遭伏被杀。后耿家埠圩被官军及团练攻破，刘淑愈率部突围，与据于旗山的幅军孙化祥部会合，刘淑愈被孙化祥拜为军师。刘淑愈为旗山营门撰联：“东狩获麟，食其肉寝其皮；中原逐鹿，大者王小者侯。”此联矛头所向显见，可视作旗山幅军的行动纲领。此支幅军在孙、刘二人的领导下，北连淄川刘德培义军，西结白莲教军，南依捻军，力量迅速壮大，鼎盛时，号称有十万之众。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二月，清军总兵陈国端率精兵两千进逼鲁南幅军，激战半月，幅军失利。孙化祥为保旗山营寨，率本部主力主动出击，在仲村（今属苍山县）陷入清军重围。刘淑愈率老弱残兵留守旗山，挡不住官军与团练的重兵猛攻，山寨陷落后，刘淑愈被俘，坚贞不屈，后在兰山县狱中被虐杀。作为进士主动率农民造反者，在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刘淑愈实为数千年来背叛封建统治阶级最为彻底的知识分子典型。

刘恩柱是今沂南县人。1899年任山东机器局总办。1903年，他在济南院后街创建济南电灯房，供官府和院前、院后、西门一带商户照明用电，此为山东第一家民族资本电力企业，亦是济南市最早的发电厂。翌年，经清政府批准，他又从德国购进新式机器，制造七九子弹。1914年，山东举办首届物品展览会，他被聘为机器制造部评议员，因用5000元最高额购得第一名入场券而名噪一时。

现代以来，刘姓人才济济，遍及诸多领域，他们中有：刘少奇，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为工人运动和白区工作的开展，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军部的重组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党的自身建设与理论建设，《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持制定等，做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1945年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建国后，任中共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历任中央人



开国大典：左一刘少奇，左三刘伯承

民政府副主席、首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受毛泽东主席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为国家的各项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使山东和沂蒙人民不能忘怀的是，1942年春，当山东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领导人之间急需统一认识的关键时期，刘少奇根据中央指示，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于3月由苏北进入滨海地区（时为山东党政军首脑机关的驻地，山东及沂蒙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在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主持解决了阻碍和影响山东抗日工作进一步开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统一了领导层的思想认识，扭转了山东抗日工作的危局，受到了山东及沂蒙地区广大抗日军民的爱戴与支持。

“文革”中，他被作为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惨遭林彪、江青一伙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在生命垂危之际被驱逐出京，于1969年11月含冤去世。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他恢复了名誉，使共和国历史上的这一最大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刘伯承，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中英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1927年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土地革命战争中，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抗日战争中，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中历任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7年，与邓小平率12万大军南渡黄河，挺进中原，揭了解放战争的序幕。后又参与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西南战役，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殊勋。他戎马一生，征战无数，具有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在战争年代成为公认的常胜将军。建国后，又创办解放军军事学院，为人民军队培养了大批高、中级军事指挥人才。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刘志丹，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陕甘革命武装和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26年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翌年回陕北从事革命斗争。1928年与谢子长一起领导渭（南）华（县）起义，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1934年后，任中共甘陕边军事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率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十七军击败国民党军的“围剿”，使陕北、陕甘边根据地连为一片，在20余县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成为万里长征后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红军的落脚点。1935年任红十五军团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后在肃反中遭诬陷，备受折磨。毛泽东、周恩来到达陕北后，迅速纠正了陕甘党内的“左倾”错误，使刘志丹等得以获释。此后，历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

1936年3月，他在率部参加东征中不幸牺牲，年仅33岁。为纪念这位英年早逝的杰出的革命家和军事家，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其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在科教文化领域，有一批刘姓人士建树颇丰，他们中有：刘半农，系著名语言学家。创声调推断尺，提倡实验语音学。著有《中国语法通论》。刘大杰，系学贯中西的著名学者兼作家。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他擅修文学通史，著有《中国文学发展史》。其《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为中外学术界所重视。在外国文学研究方面，著有《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国文学简史》《欧洲近代文艺思潮》等专著。刘思职，系著名生物化学家，为定量研究免疫化学的创始人之一。先后主编了我国第一部英汉《生物化学名词草案》和国内首部中文生物化学教科书《生物化学大纲》。刘白羽，系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兼书记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等职。著有散文集《延安生活》《火炬与太阳》《红玛瑙集》《芳草集》等，《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为其小说代表作。刘绍棠，系著名作家。1952年他16岁时，因发表短篇小说《青枝绿叶》而成名。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是当时最年轻的专职作家。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长期在农村生活。改革开放后重返文坛，任北京作协副主席、《中国乡土小说》主编。著有《运河的桨声》《山楂树的歌声》《蒲柳人家》等中篇小说，《春草》《地火》等长篇小说。他致力于乡土文学的倡导与创作，作品文风质朴，描写从容自然，具有浓郁的地域色彩，被誉为当代乡土文学的创作“圣手”之一。刘心武，系当代著名作家。1977年发表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誉为新时期文学的发轫之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长篇小说《钟鼓楼》获全国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海粟，系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1912年创办中国第一所图画美术学院（上海美专的前身），率先在教学中实行人体模特写生和男女同校制度，成为中国现代美术和美术教育的开拓者。他兼擅国画、油画，作品气势雄阔，笔墨酣畅。他多次赴黄山体验生活，其以黄山为题材的画作泼彩豪放，极具神韵，是中国山水画的精品。刘开渠，系著名雕塑家。1934年创作了歌颂抗日将士的著名雕塑《一·二八淞沪抗战阵亡将士纪念碑》。1953年，任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处处长和雕塑组组长，并担任了主题浮雕《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及《支援前线》《欢迎解放军》的设计和创作。其作品融西方写实雕塑与中国传统技法于一体，具有独特的洗练传神的艺术风格。刘诗昆，系闻名中外的钢琴演奏家。演奏风格气势宏伟，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1958年，在首届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获第二名。其主要作品有《青年钢琴协奏曲》《战台风钢琴协奏曲》等。

近几年，自电视连续剧《潜伏》播出后，谍战片在国内走红。剧中主人公余则成先是在天津保密局从事地下情报工作、后又去台湾继续卧底的传奇故事，曾为众多观众津津乐道。但人们所不知的是，真正在台湾从事地下情报工作的人员，其境况和结局又是何等的危艰与悲壮，红色特工刘光典便是其中一个典型。刘光典曾是上世纪50年代台湾“中共间谍案”的重要成员，他与时任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中共地下交通员朱枫（化名朱谌之）一起被后人称为中共在台情报工作的“三杰”。1949年10月下旬，刘光典被组织上派往台湾开展工作。同年12月，组织上又派洪国式赴台负责情报组工作。年底，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被捕叛变，致使情报组成员全部被捕。此时，因刘光典正准备携带新搜集的情况返回香港，因而逃脱了抓捕。在台湾本地中共党员王耀东等人的掩护下，他逃至台南深山老林，掘地为穴，以野果、野菜充饥，长达4年。1954年2月，因叛徒出卖，刘光典与王耀东在山中被捕。刘光典在狱中坚贞不屈，而国民党特工当局则对外宣称刘光典已“弃暗投明，为党国效忠”，并派出一位与刘光典面目相像的特务潜回大陆活动，使外界误解其已叛变。刘光典在大陆的妻子儿女为此受到不公正的对待。1959年，刘光典被台湾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壮烈牺牲，年仅37岁。直至2008年，其悲壮经历方被彻底查明，蒙垢长达50年的刘光典被组织上追授为革命烈士。

现代以来，刘姓中亦有数位临沂籍人士名鉴丹青：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二人是临沂市

蒙阴县垛庄人，系上世纪20年代中共山东地区的党、团负责人，著名革命烈士。1927年，刘晓浦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1929年，中共山东省委遭破坏后，他和刘谦初受中共中央派遣，赴济南重建山东省委，任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后被叛徒出卖，与其爱人一起被捕。刘一梦在上海读书期间加入革命文化团体“太阳社”，所作小说集《失业之后》被鲁迅称为“优秀之作”。1928年秋，刘一梦奉命赴济南，任共青团山东省委书记。他以《晓风》周刊为阵地，撰文宣扬马列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1929年4月，由于叛徒出卖而遭逮捕。在狱中，叔侄二人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坚持斗争。1931年4月5日，刘晓浦、刘一梦和刘谦初等22人在济南英勇就义。刘氏叔侄出身于当地望族“燕翼堂”，其家拥有土地近6000亩、山林上千亩和诸多商铺。受刘晓浦、刘一梦影响，其家人思想进步，在当地颇负声望。抗战爆发后，“燕翼堂”卖地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倾心支援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权，家中有多人先后参加革命，成为闻名遐迩的抗日家庭。刘震东是沂南县人，著名复国将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第五军团指挥，率部转战辽宁、热河、察哈尔，顽强抗击日本侵略军。1933年5月，率部参加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为主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继续与日军作战。“西安事变”后，刘震东因积极追随张学良而被解除兵权，任陆军中将高参。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他被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任命为第二路抗日游击总队中将司令，与翌年2月奉命守卫莒县城，以阻击日军坂垣师团南犯临沂。他冒着炮火在城头上指挥作战，不幸中弹牺牲。重庆《新华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莒城我军奋勇杀敌，刘震东氏壮烈牺牲》的长篇报道。同年12月，在重庆为范筑先、刘震东等抗日烈士举行了追悼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为烈士送了挽联，挽辞为：“战事方酣忍看多士丧亡显其忠勇，吾侪尚在誓必长期抗战还我河山。”刘惠民系著名中医，沂水县人。战争年代，为适应战争环境，他将中药汤剂研制成片剂或药丸，先后研制出疟疾灵、金黄丸、救急散、牛黄丸等近百种中成药，为解放区医药事业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创办山东省中医院，先后任中医院长、山东中医学院院长、省卫生厅副厅长。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青岛视察期间患重感冒，虽多次治疗但效果不显。经他诊治后很快痊愈。毛泽东遂赞之曰：“近30年没吃中药了，这药很好。”1957年，毛泽东赴苏联访问，他被指定为随行医生。后多次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治病。他著述颇丰，主要有《伤科学读本》《中西混合解剖生理学概要》《中西药物学概要》《中西诊断学概要》及《刘惠民医案》等。

# 赣榆战役

1943年11月19日 - 20日



①



②



③

①11月19日晚滨海军区部队隐蔽进入赣榆城东北待机。

②滨海军区司令陈士榘（右二）、政委符竹庭（右一）指挥战役。

③此役俘伪军2000余人，缴枪1600余支，粮10万公斤，我军伤37人，牺牲3人。图为投降的伪军。

④司号员吹响冲锋号。



④

# 琅琊兵学文化初探

刘洪连 任建华

近几年，我们致力于《临沂市军事志》的撰写，当从军事理论与实践的角度对临沂进行考察时，深深感到，临沂不仅是鲁南军事重镇，而且具有深厚的军事文化底蕴。

早在四五十万年以前，人类的祖先就在这里创造了远古文明。蒙阴县发现的高山文化遗址证明，距今约6100至4600年前，这里的人类就能制作石铲、石斧、石凿、石镞等日用工具及狩猎武器。而在5000年以前，就开始使用文字符号。

临沂历史上曾为琅琊国都和琅琊郡治所。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琅琊兵学文化。在古代和近代历史上，这里孕育出鬼谷子、孙臆、蒙恬、诸葛亮、羊祜、左宝贵等一批军事英才。

—

兵法是人类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军事文化的精髓。琅琊兵学文化，以其兵法的广博与深邃著称于世。

1972年4月，临沂银雀山1号西汉墓出土兵书竹简7500多枚，内容有《孙子兵法》、《孙臆兵法》、《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政论兵等文章50余篇。2号墓出土竹简32枚，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些先秦古籍的发掘是20世纪学术史上最重大的考古发现，被列入“新中国30年十大考古发现”，“新中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尤其是《孙子兵法》和失传近两千



年的《孙臆兵法》竹简在1号墓同时发掘出土，结束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千古争论，证实了孙武、孙臆各有其人，各有兵法传世。而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是我国所见到的最早的《孙子兵法》版本，其陪葬年代在公元前140年（建元元年）至公元前118年（元狩五年）之间，存世年代比《史记》和《汉书》还早，是研究孙子思想最珍贵的版本。

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公元181年出生，琅邪（邪通琊，琅邪亦作琅琊）阳都（今沂南县砖埠乡）人。诸葛亮13岁随叔父诸葛玄去豫章，15岁时随叔父依附刘表，开始了在荆州“躬耕陇亩”的生活，历时12年。后辅佐刘备创建蜀汉政权，成为一代名相。清代张澍编有《诸葛忠武侯文集》。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校本《诸葛亮集》。1994年12月，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诸葛亮集》。诸葛亮的治军治将之道，诸葛亮率军征战的武功，都闪耀着其兵学智慧之光。

## 二

琅琊兵学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它的实践性。历史上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就是孙臆兵法的具体运用。

公元前342年，魏国大将庞涓率兵攻打韩国，韩国求助于齐国。齐国以田忌为主将、孙臆为军师，直攻魏国国都大梁。魏惠王急令庞涓从韩国回兵救魏，又派太子申为上将军，与庞涓合兵10万抵抗齐军。庞涓闻讯回兵，齐兵早以绕道东撤。庞涓率兵追赶，并想乘胜兼并莒地，孙臆采用减灶诱敌之计，将庞涓诱入以图“大胜并莒”的必经之地马陵古道，大破魏军。

马陵山北高南低的地形，符合《孙臆兵法·地葆》篇中所描述的“山胜陵，陵胜阜，阜胜陈丘，陈丘胜林平地”的“五地之胜”，并有“杀地”所具有的“天井、天宛、天离、天隙、天柢”的地形特征。独龙涧则是“覆军杀将”的理想之地。

马陵之战中，孙臆因势因地巧妙诱敌。在魏境因魏军气盛则退兵减灶，以达“避而骄之，引而劳之”（《孙臆兵法·威王问》）。在齐境马陵山南段，则依山傍水，筑垒排阵，“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孙臆兵法·八阵》），摆开决战之势，与魏军殊死拼杀。从孙塘、大尚庄、沭河及南部诸山头出土的兵器看，此战范围近30平方公里。在马陵山中段禹凿山口一带，地形有利防御。从老虎崖以东，沿沭河傍陵南至穆柯寨以南2公里处，沭河由东而西，南而北，北而南，折成一个S形，沿山西向南流去。河北岸的丘陵地带是一个良好的防御阵地，沭河乃天然屏障。孙臆在此以少量兵力设疑兵之阵，用冷箭阻滞魏军。而在庞涓谷外，齐军则以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之状，诱魏军入谷。

孙臆利用“隘塞死地”（《孙臆兵法·陈忌问垒》），伏设万余善射弓箭手，射杀魏军。魏军大乱，庞涓自知智穷兵败，乃自刭，曰：“遂成竖子之名！”齐军乘胜尽破魏军，俘虏其上将军太子申。

马陵之战，是孙臆兵法运用的光辉范例。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孙臆从此显名于天下，世传其兵法。”

## 三

琅琊兵学文化，不仅向世人展现出兵法谋略的精湛和成功实践，而且在沂蒙大地留下了众多的兵家胜迹。

**鬼谷子讲堂** 蒙山龟蒙顶东侧的大洼，深凹于龟蒙、云蒙、东蒙三大主峰之间，身处该地如壶中窥天，深奥莫测。大洼有鬼谷子讲堂，隐于密林之中，云飘幽谷，为鬼谷子教徒授艺之处。“鬼谷子”是战国时期楚国人王禅的称号，曾隐居蒙山之鬼谷子洞，长于纵横捭阖

之术，著有《鬼谷子》一卷，教授弟子百余人，苏秦、张仪、孙臆、庞涓等著名纵横家、军事家皆出自其门下。“鬼谷子讲堂”即当年讲学遗址，今已重建，红墙青瓦，竹篱相围，院内有一古槐，三人合抱方拢，遮地近半亩。讲堂内王禅塑像立于正堂，其五弟子端坐两侧，凝目恭听。

**马陵古战场** 马陵山位于郯城县城东10公里处。马陵古道，北起九道弯，南至嶂苍。九道弯旁，故垒遗迹，有点将台、校兵场，其西南3公里处有跑马岭。马陵道有许多与马陵之战有关的地名、村名及传说故事，沿线不断有古代兵器出土。孙塘曾出土铜箭，大尚庄出土“郤氏佐”铜戈，沭河及南部诸山头出土过箭头、兵器。其中有带铭文的“郤氏佐”铜戈，系孙庞作战时代魏国兵器。沭河南岸现有上、中、下古寨三村，据说魏军至此安营扎寨，未敢冒然进军。后经侦察判断，庞涓以一部兵力沿马陵道向穆柯寨方向攻击，自己亲率一部兵力迂回老虎崖对岸，由东向西攻击，结果遭冷箭射伤落马。故当地有“射子”村及“一次上马石”遗迹。独龙涧由9条冲沟汇合而成，围绕尖子山一周，状似葫芦，又称葫芦峪。现仍有庞涓二次中箭之地恨谷崖，庞涓中箭后第二次上马石和记载孙庞大战历史经过的“庞涓石”，以及庞涓死于此涧古桑树下的地名遗迹，后人称该涧为庞涓谷。独龙涧进口处之卸甲营，据说庞涓死后，因孙臆于此安营扎寨而得名。卸甲营村西南，为四周山和穆柯寨，地势险要。从卸甲营村向南约7公里，便是著名的“禹凿山口”。山口东南为古寨村。沿古寨向南，经大贤庄、官庄、芦窝、上河，直到苏鲁交界的嶂苍村，此段山岭，状如奔马，连绵起伏30余公里，山路平坦。

《郯城县志》载有明代李先芳的诗：“迥合长堤卫水秋，满怀黄叶获颿颿。居人近指马陵道，遗蹟遥传瓦屋头。昔日孙庞曾决胜，只今草木尚含愁。不知七国皆迷地，犹自停车吊古邱。”马陵古战场现已成为古代军事思想教研基地。

**齐长城、穆陵关** 齐国是中国兵学文化发展之地，对外征伐，对内守疆，修筑了以城墙、防门、关塞、烽火台等为主体的军事防御工程。齐国先民建造的齐长城，比秦长城修筑时间还要早。穆陵关位于沂水、临朐两县交界处，为战国时齐长城关隘。古址在东西横亘数百里的大岷山（即沂山）上，山谷峻狭，称“齐鲁天险”。《左传》记鲁僖公四年，管仲所云齐国疆界“南至于穆陵”即指此。沂水县关顶村有明嘉靖年间的“增穆陵碑”和清道光年间载穆陵关的碑各一块。穆陵关是齐国通往南方的咽喉关隘，当年由齐将率兵扼守。根据

志书记载和民间传说，孙臆当年在魏国受臆刑后逃往齐国及晚年从齐都到沂蒙山区隐居，都要经过齐长城。

**孙臆洞** 孙臆洞位于莒南、日照两县交界处的甲子山。据《莒州志》载：“孙臆洞在州东甲子山，洞旁有泉，下有饮牛汪。山水环绕，境极幽僻。”据《莒南县志》记载：“孙臆洞位于县城东北36公里，坐落在甲子山主峰‘迪鸡’的半山腰，长12米，宽6.1米，高2.2米，天然形成，洞口朝东偏南，石墙院落，清静幽雅。青砖修砌的洞门，洞内有天然石炕，东侧有滴水泉，滴水常年不息，汇成溪流，沿洞底流入洞前3米处的石砌水池中，池旁立一石碑，上书‘神泉’。洞内有用青砖砌成长方形屏墙，墙前塑孙臆坐像，高1.3米，形像逼真。两侧是孙臆的侍卫者袁达和李木的塑像。另有一个较小的塑像叫‘小谷达’，是孙臆的放牛娃，‘小谷达’的身旁是一头0.9米高的泥塑独角牛。这些古迹，于1943年被日本侵略军毁坏。1991年修复。”据传说，孙臆晚年曾在此隐居并修著兵法。

**诸葛亮故里** 诸葛亮故里位于沂南县砖埠乡的阳都故城。1992年，沂南县人民政府投资40万元在沂南县砖埠乡孙家黄疃修建了“诸葛亮故里纪念馆”。在沂南县城西山坡修建了“卧龙公园”，亦称“西山诸葛亮公园”，有全国重量最大的诸葛亮铜像一尊，用铜3.5吨，身高7米，总重7000公斤；并建有浮雕，总长50米，共计14幅，每幅5.25平方米。石雕均根据《三国演义》故事雕刻而成，记载着诸葛亮的辉煌战绩。该馆近几年进行了扩建。

**左宝贵衣冠冢** 左宝贵衣冠冢位于平邑县地方镇西约1公里处。左宝贵（1837~1894年），字冠廷，回族，清朝时费县地方镇（今属平邑县）人。幼时家贫，稍大从军，因作战勇敢，叠次提升，历任千总、游击、总兵、提督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左宝贵率军守平壤，与日军展开激战，身负重伤，仍坚持在城头指挥作战，直至壮烈牺牲。其遗体留在朝鲜。左宝贵牺牲后，人们在其家乡祖茔地掩埋了他生前穿过的一只靴子和一顶帽子，筑起一座方形圆顶坟，即今日遗迹尚存的衣冠冢。墓地占地近10亩，围以砖墙，植有松柏，立有牌坊、石狮和墓表。墓表为四楞形，周面皆有对联，其一云：“经百战，勇冠诸军，常开平天下奇男子；守孤城，心拼一死，张睢阳古之伟丈夫”，以此表达对这位爱国将领的崇敬之情。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 1981年2月在银雀山汉墓原址兴建。馆区面积1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000平方米，是我国第一座遗址性汉墓竹简博物馆。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集文物收藏保护、陈列展览、学术研究和社



会教育多功能于一体。主体建筑为银雀山汉墓厅和竹简陈列厅，室内陈列突出汉墓、竹简、兵法三大主题；收藏和展示了金雀山、银雀山百余座墓葬中出土的珍贵文物。

#### 四

银雀山汉简兵书的出土，推动了琅琊兵学文化的研究及军事文化产业的开发。临沂市先后成立了孙子兵法研究会、孙子兵法研究院、临沂兵圣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及诸葛亮研究会等科研机构。在对银雀山汉简兵书深入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兵学文化的学术交流。临沂市对于琅琊兵学文化的研究，结合有关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活动逐步展开。1992年，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研讨会在临沂召开。1998年，马来西亚孙子兵法研究会吕罗拔会长率30余名会员来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考察，就孙子文化的研究进行了学术交流。2002年，银雀山汉简兵书出土3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临沂市召开。自1994年起，先后在沂南县召开了全国第八次、第十四次等诸葛亮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对诸葛亮军事思想的研究和军事文化交流。

2001年以来，有多部研究银雀山汉简兵书的书籍问世。齐鲁书社出版了李兴斌、杨玲注释的《孙子兵法新译》及李兴斌、邵斌注释的《孙臆兵法新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了郭文铎、杜学民编著的《漫话银雀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杨玲编著的《〈孙臆兵法〉解读》。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宋开霞、邵鸿、徐勇注释的《六韬新译》及徐勇、宋开霞注释的《尉缭子新译》。临沂市孙子兵法研究院和军事科学院出版社，以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孙子兵法》作为版本依据，以中、英、日三种文字推出一部《孙子兵法珍藏本》。临沂市孙子兵法研究院精心设计研制了“孙子兵法竹简”，把现代高科技手段与古老的兵书设计相结合，用石英管在1730℃下封存，管内注入高纯度的保护气体，为人们长期收藏、观赏这些稀世珍宝提供了条件，并出版了《孙子兵法珍藏本纪念文献》。

# 郭晓冬—— 从沂蒙山走出来的明星

石头



家庭情感剧《一日夫妻百日恩》于2012年4月1日正式登陆央视八套，这部讲述现代都市人向“白头偕老”等传统情感回归剧汇集了郭晓冬、赵子琪、刘莉莉等优秀演员，继《誓言今生》的“暖意英雄”黄以轩后，郭晓冬走近现代都市寻常百姓家，演绎当代甜蜜好老公的典范。这位为了孩子坚决不演反派角色的特殊演员以自己独特的个性和魅力征服了众多的影迷，也越来越被海内外影视媒体所关注。

2003年，电影《暖》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金麒麟”最佳影片奖，主演郭晓冬也由此获第十六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提名。此后，郭晓冬的名字每年都频频出现在各种奖项面前：2006年第11届釜山电影节“亚洲十大最具潜力男艺人”大奖；2006第五十九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提名；2007首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新结婚时代》最佳电视剧奖；2007—2008年度“风尚男艺人”奖；2008年度“年度绅士风度奖”；2008年度“慈善明星行动奖”；2009参演电影《沂蒙六姐妹》获第13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第四届中国演艺界十大孝子；2010年领衔主演谍战电影《秋喜》荣获中美电影节最佳影片金天使奖；2012年《时尚生活》杂志授予郭晓冬“时尚好男人”奖，这位从沂蒙山里走出来的汉子一个华丽的转身，走到了最时尚的前沿。

出生在莒南县坊前镇大坊前村里的郭晓冬，上到初中二年级，面对34元的学费——对这个家庭来说是一笔巨大开销的时候，他主动辍了学。面对无语的父母，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反正也考不上大学，不上了。”他跟着村里人去潍坊市

里打工，挖下水道、清理淤泥和垃圾。干了一个月的活儿后没拿到一分钱，紧接着又被拉到崂山参加“引黄济青”工程。白天是挑战身体的极限，12个小时连轴干，挖一个直径二三十米、深百米的井。晚上住在帆布大棚里，热得透不过气，旁边就是垃圾桶。超负荷的体力活儿，天天吃的是茄子和冬瓜，见不到肉。“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给自己打气，只知道什么是生存，周而复始，没有太多的梦想，就这么生活。”和当时所有的农村孩子一样，如果家里没钱，他们只能义无反顾地走出校园，勇敢的担起养家的责任，往往几十元钱甚至几元钱的学费就决定了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然而，郭晓冬却从清洁工、建筑工、雕刻工、邮递员、服务员、跑龙套、当主持、唱过火锅城、走穴……一直走到了北京电影学院。

1992年，郭晓冬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则北京电影学院举办夏令营的消息，学费500元，来回路费自理。他动心了。然而他当时一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块钱，不可能再向家里要钱。他突然想起当初进印刷厂时，跟亲戚东借西借凑了1100元的风险抵押金，便背着父母从厂里把这个钱取出来去了北京。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花的最大的一笔“巨款”。夏令营半个月时间，在电影学院学习表演，到北影厂参观，他很新奇，第二年就辞职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初试没过，就呆在北京流浪，跑龙套、当群众演员。与之前辗转各个城市打零工干体力活儿相比，这个时候的郭晓冬开始觉得苦了。

“因为人开始有理想了，开始感觉到这个东西与现实生活有落差了。我想挣钱找老师学习，钱挣不到，老师也不可能找到，那时痛苦、迷惘、惆怅，但是必须得生存下去，没有退路了。”最苦的时候，郭晓冬3天吃一袋方便面。1996年，在北京实在混累了，他给自己最后一次机会报考电影学院，如果能进三试，说明还有能力，如果不行，就回老家该干嘛干嘛。没想到，这一年给考上了。付出怎样的心血和努力不能量化，他只觉得不可思议：“我一直觉得我跟幸福有很远的距离，跟那些特别好的事情有距离感，但没想到幸福就来了。”

在导演霍建起看来，郭晓冬简直是个奇迹：农村的孩子考上清华北大也许并不出乎意料，考到电影学院去学表演就有些稀奇了。至于怎么就创造了这奇迹，恐怕郭晓冬本人也说不大明白。际遇到了，一切便就顺理成章。当不少人总说他幸运而不提他的努力的时候，他也从不拿自己曾经吃苦的经历来示人，他觉得自己就是挺幸运的一个演员。“经历这么多之后，属于你的就是你的，也变得越来越坦然了，机会也就随之而来了。”也许是成名来得太晚，他把一切早已经看得豁达。他身



上最大的优点就是朴实、真诚、细腻。在王海鸰同名小说改编的《大校的女儿》中，他饰演一位从17岁到50岁的军人。当王海鸰接到了制片方没有声音和过多后期处理的小样片，看后的第一感觉是“震撼”！“演一个年龄跨度如此大的角色很不容易，郭晓冬是一个偶像加演技派的好演员，他非常有潜质。”于是《新结婚时代》她力邀郭晓冬出演男主角何建国，因为拍过几个农村题材的戏，郭晓冬不愿意再重复角色。但看过剧本后，他觉得仿佛是在写自己，他在整部剧里几乎就是本色演出，角色非常靠近自己，他很容易就把自己对婚姻生活的理解融进这个角色中。王海鸰对郭晓冬《新结婚时代》中的表演评价甚高：“他将一个男人、一个丈夫、一个儿子演绎得如此细腻又如此大气、如此深情又如此理性。”

当年参加东京电影节时，郭晓冬在一篇日记里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方夜谭，这次我是从自己的天方夜谭的男主人公走到了生活中来，走到了东京电影节的红地毯。”回想人生最关键的几步，从老家到县城——考上大学——《暖》——国际电影节……每个人的人生轨迹恐怕都是事先命定的，但是你得努力，同时相信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副市长赵爱华到市史志办公室检查指导工作。**3月16日，副市长赵爱华在市政府副秘书长秦鸿伟等陪同下到史志办公室检查指导工作。赵爱华听取了市志办公室主任朱海涛关于全市史志工作情况的汇报，对我市史志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指出：史志办队伍虽然不大，但很精干，素质高、成果多、质量优，这支队伍耐得住寂寞，甘于奉献、乐于奉献，为“大临沂、新临沂”建设做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有个好班长，有个团结的好班子，有一支好队伍，有好的作风，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在今后的工作中，一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乐于奉献的精神。二要加强团结，维护大局，爱护集体形象。三要把好的思路具体化到项目上去，通过立项争取更多的支持。

赵爱华还视察了临沂方志馆。

**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召开理事会议。**3月15日，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望族文化研究第二届理事会理事、副会长、会长、顾问等共32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市史志办公室主任、市望族文化研究会顾问朱海涛主持。会议听取了王志刚关于望族文化研究会换届以来的工作情况报告，增选了11名理事、3名副会长，聘任了5名顾问，同意王志刚因年龄原因辞去市望族文化研究会会长职务，选举市史志办公室总编辑王瑞柱为会长。与会同志听取并讨论了关于《临沂市望族文化研究会“十二五”期间工作思路》的报告，对报告中提出的“整合力量，完善机构，打造一流的望族文化研究团队；拓广掘深，立足研究，打造临沂望族文化系列精工产品；完善规章制度，筹集研究经费，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积极参与有关活动，推动望族遗迹及其文物的保护工作；加强联络，广泛宣传，为祖国统一和招商引资服务”的工作思路给予了高度评价。

**焦作市史志办来我市考察。**4月27日—28日，河南省焦作市政府副秘书长卜庆正，史志办副主任王浩文、原应战一行4人来临沂考察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工作，临沂市政府副秘书长、调研室主任安丰和，市史志办主任朱海涛，市史志办总编辑王瑞柱陪同考察。

**沂水县史志办包村工作组走访慰问困难群众。**3月7日，沂水县史志办包村工作组到包扶村——圈里乡柿子园村走访慰问困难群众，并送去了慰问品。工作组详细了解所帮扶的5户困难家庭情况、主要收入来源及今后的打算，分析存在困难的主要原因。目前，包村工作组正计划采取发展林果、养殖獭兔等帮带措施，帮助困难群众尽快脱贫致富。

**沂水县政府副县长徐爱铎到沂水县史志办指导工**

作。4月7日上午，沂水县政府副县长徐爱铎到县史志办公室检查指导工作，徐爱铎听取了县史志办主任于化凤的工作汇报，对县志办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要求史志办全体人员要再接再厉，充分利用自身优势，深度挖掘沂水县历史文化资源，不断开拓史志工作发展的新渠道。

**《临沂年鉴》荣获2011年度全省史志系统“八个一优秀”奖。**3月30日，全省史志系统“八个一优秀”评选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在济南召开，会议以无记名投票形式评选出2011年度全省史志系统“八个一优秀”评选获奖单位和成果。《临沂年鉴》（2011）获优秀综合年鉴奖，《兰山年鉴》（2009）获优秀综合年鉴入围奖，沂水县方志馆获优秀方志馆入围奖。

**河东区史志办做好区情网建设。**河东区史志办高度重视区情网建设，今年以来，通过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加大资金投入，强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提升网站建设，较好地发挥了区情网站的作用。一是多次召开会议，认真研究，反复论证，加强区情网的建设和维护。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对网站的重新建设和功能提升进行投入，并申请了专门的域名。三是对全体干部职工进行业务培训和指导。

**沂水县史志办加强史志信息调研工作。**为充分发挥信息调研对史志工作的推动作用，加强与上级业务主管部门和兄弟县区史志办工作的交流与沟通，沂水县史志办在继续实行史志信息调研工作奖励的基础上，加强了信息调研工作的调度和领导：一是制定信息调研工作计划，确保全年的信息调研工作任务如期完成。二是对发稿情况实行每周一次汇总调度。三是加强与上级业务具体负责部门的沟通与联系，以便更好的掌握信息调研工作的侧重点。

**《莒南县地震志》出版发行。**近日，由莒南县地震局编纂的《莒南县地震志》出版发行，该志书记述了1975年自莒南县地震局成立以来至2010年的地震活动，全书设十二章，卷首设序、凡例、概述、大事记，后设附录、后记，共45万余字。

**《临沂市志》编修工作简报（六）。**2012年3月7日，市史志办召开市志业务工作会议，全面总结2011年修志工作，通报市志编修进度，安排部署2012年主要工作任务。会议要求各责任人员要继续加强对市志供稿单位的业务指导，提高初稿质量，确保年内全面完成组稿工作；及时对志稿进行审核，严把质量关；市志编辑人员要加强志稿编纂工作，年内初编志稿要达到四分之一以上。